

最後的秘密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

THE LAST SECRET

The Final Documents from the June Fourth Crackdown



黎安友 導言

Introduction by Andrew J. Nathan

最後的秘密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

THE LAST SECRET

The Final Documents from the June Fourth Crackdown

黎安友 導言

Introduction by Andrew J. Nathan

新世紀出版社
NEW CENTURY PRESS

書名： 最後的秘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
導言： 黎安友
吳禹論
特約編輯： 蔡詠梅
封面排版及製作： Renee Chiang
出版社： 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 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 978-988-13296-4-6
定價： 港幣 158 圓

香港出版，2019年5月。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全部照片版權歸屬：靠邊

English Title: The Last Secret: The Final Documents from the June Fourth Crackdown
Introductions: Andrew J. Nathan
Wu Yulun
Contributing Editor: Tsoi Wing-Mui
Cover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13296-4-6
Price: HK \$158

First published in Hong Kong, May 2019.

Copyright ©2019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photographs in this book, including cover photograph: Kao Bian.

目錄

導言	黎安友	1
揭開中共的終極秘密	吳禹論	15
關於文件的來源考證及說明		47
Introduction	Andrew J. Nathan	51
How the Party Decided to Shoot Its People	Wu Yulun	70
Editor's Notes on the Documents		97

北京市委六屆六次會議

The 6th Meeting of the 6th Beijing Committee

文件之一：鄧小平 6 月 9 日講話	June 9th Speech by Deng Xiaoping	105
鄧小平 5 月 31 日談話	May 31st Talk by Deng Xiaoping	113
鄧小平 6 月 16 日談話	June 16th Talk by Deng Xiaoping	120
文件之二：李鵬報告	Report by Li Peng	129
文件之三：李錫銘發言	Comments by Li Ximing	149
文件之四：陳希同 - 李錫銘發言	Comments by Chen Xitong, Li Ximing	165
文件之五：王芳書面發言	Comments by Wang Fang	177

十三屆四中全會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Central Committee

文件之六：陳雲書面發言	Written Comments by Chen Yun	187
文件之七：李先念發言	Comments by Li Xiannian	189
文件之八：彭真發言	Comments by Peng Zhen	199
文件之九：鄧穎超發言	Comments by Deng Yingchao	211
文件之十：徐向前書面發言	Written Comments by Xu Xiangqian	213
文件之十一：聶榮臻發言	Comments by Nie Rongzhen	217
文件之十二：王震發言	Comments by Wang Zhen	223
文件之十三：薄一波發言	Comments by Bo Yibo	225
文件之十四：宋任窮發言	Comments by Song Renqiong	231
文件之十七：楊尚昆書面發言	Written Comments by Yang Shangkun	241
文件之十八：萬里發言	Comments by Wan Li	243
文件之十九：江澤民發言	Comments by Jiang Zemin	251
文件之二十：宋平書面發言	Written Comments by Song Ping	257
文件之二十一：李瑞環發言	Comments by Li Ruihuan	267
文件之二十二：胡啟立發言	Comments by Hu Qili	275
文件之二十三：芮杏文書面發言	Written Comments by Rui Xingwen	281
文件之二十四：閻明復發言	Comments by Yan Mingfu	291
文件之二十八：王震書面發言	Written Comments by Wang Zhen	299
江澤民講話	Speech by Jiang Zemin	317

附錄

Appendix

附錄一：趙紫陽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	Comments by Zhao Ziyang	331
附錄二：趙紫陽親述參加 1989 年 6 月 19-21 日政治局擴大會	Description of the June 19-21 Meeting by Zhao Ziyang	346
附錄三：第十三屆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Communiqué of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Central Committee	351
人名錄		355
Who Was Who		360

導言

黎安友

1989年6月3日至4日晚，中共血腥鎮壓了要求民主的示威者。20天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召開了高層精英參加的中央委員會會議。這次會議在中共歷史上被稱為「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的目的是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兩項意志統一全黨：第一，在北京周圍和天安門廣場部署數萬武裝部隊對付和平抗議者；第二，撤銷趙紫陽的中共黨總書記職務。長達數週的時間，中共對學生運動束手無策，在學生運動波瀾起伏，黨內領導人爭執不下的情況下，鄧小平最後作出了這個使用武力鎮壓和平示威的決定，結果導致數百人，也許更多的人死亡，不過至今確切死亡人數不詳，而且還因此引發整個中國社會對中共政權的普遍反感以及西方七國集團對華實施制裁。

6月23日至24日，489位最高級別的中共黨官聚集在北京西郊一個專門為中共高層會議設置的場所京西賓館，學習黨內資深望重的退休元老和一些經歷六四危機而保住了職位的關鍵部門高級領導人在6月19日至21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以及書面發言。這些發言以文件形式分發給京西賓館的與會者，以讓他們輪流表態支持鄧小平的決定。當這個稱之為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會議結束時，文件被收回，以確保會議對外保密。但是，那次會議上分發的一部分文件已經外洩，最終得以在本書中發表。

無論每位發言者在面臨六四這場危機時是什麼觀點，無論他對鎮壓持何種樣的想法，在6月19日至2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們都必須承認鄧小平的鎮壓決定是正確的，並以正式表態贊同這兩份文件的內容以作準。這兩份文件，即鄧小平6月9日慰問戒嚴部隊的講話，以及趙紫陽的強硬派對手總理李鵬《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也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分發給與會者，現列入本書的第一部份。「我完全同意」或「我完全支持」這一類話在文件中反復出現，像是讓每個發言人在全會眾目睽睽之下隆重發誓自己將採取相同立場。幾乎每個發言者還必須加上個人化的評論，以表白其發誓的誠意。這種儀式了結了已過的事件，消除了黨內任何細微的不同意見，使執政黨能夠統一思想後重新統治中國社會。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沒有安排被廢黜的領導人趙紫陽發言，但他無論如何都堅持要求在會上講話，為自己在解決危機期間的行動辯護。自辯結束以後，趙紫陽被軟禁終生，直到2015年去世。然而所有發言者在譴責趙紫陽之時，都稱他為「同志」，因為趙未被開除出共產黨。事實上，他至死也沒有被開除。

大會還向參加四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們提供了五份文件的副本，以便統一他們的思想。其中兩份是鄧小平近期與高級領導人的談話記錄，其中鄧小平強調了鎮壓的正確性，中國繼續走經濟改革道路的必要性，以及要求新一屆黨領導避免趙紫陽任期內領導層分裂而癱瘓的局面。其他三份報告分別是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和公安部長王芳關於北京鎮壓的報告。這五個文件就是本書文件中的1-5號文檔。

我們不知道四中全會向與會者總共下發了多少份文件。除了前述七個文件外，本書還有政治局擴大會議17人的發言，發言者包括幾位參與危機解決介入很深的中共要員和一些最資深的退休元老。退休領導人王震一人佔了兩份文件，一份是他的口頭發言，另一份是書面講話，因此加起來共有18篇檢討天安門事件的講話。本書還有江澤民在全會第二天的發言，表示他願意取代趙紫陽，接受黨總書記之位。

總的來說，本書所刊載的文件闡述了中共官方對鄧小平 10 年改革，1989 年危機以及之後黨的方針的看法。這一立場在其後三十年基本上保持不變，並是現今習近平領導的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些黨內學習材料對了解和研究中共黨內高層政治規則、1980 年代高層嚴重政策分歧導致幾近崩潰的困境、以及今天中國仍然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機會。這些文件也為了解習近平治下當今共產黨領導心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在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者一個接一個地重複一個共同的敘述模式。學生示威開始僅僅稱之為「動亂」。6 月 2 日當示威者開始抵抗進入北京的軍隊後，事件必須被重新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因此必須武力鎮壓。

發言者首先分析為什麼會出現動亂，以及為什麼會演變為暴亂，顯示這些發言者對所謂的國內外敵人有一種很深的偏執妄想。87 歲的退休元帥徐向前表示：

事實已經證明，近一個多月來的動亂，最後發展成為反革命暴亂，是國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的結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汎濫的結果。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其規模之大，來勢之猛，都是罕見的。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213-214 頁)

87 歲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認為，

一個時期以來，極少數頑固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同國外敵對勢力內外呼應，鼓噪修改憲法，妄圖搞掉四項基本原則，毀掉我們立國的基石；妄圖改變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行美國式的三權鼎立的制度，妄圖把我們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變成一個全盤西化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206 頁)

發言人都同意，在趙紫陽前任胡耀邦的領導下，中共意識形態衰敗已經開始。1982 年至 1987 年，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引進

對外貿易和投資，允許私營企業和由市場供求來確定物價這個時期，是胡耀邦擔任黨的總書記。隨著這些改革的推行，出現了記者、作家、學者、學生、新生企業家，乃至普通大眾中都受到西方影響的潮流，但胡耀邦未能阻止這種趨勢，為此於 1987 年被免職。保守派領導人認為趙紫陽在接替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應該糾正胡耀邦的錯誤。但相反，他們指控說，因為趙沒有注意意識形態的掌控，黨已經斷然失去了對輿論的控制。

81 歲的前軍人國家副主席王震說：

但很大一部分輿論宣傳陣地，被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掌握了或受到他們的嚴重影響。新聞界、理論界、文藝界邪氣壓倒正氣。(313 頁)

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宋任窮抱怨說：

杜勒斯在四十年前講過，把中國復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現在，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政治狀況令人擔憂，我們決不能讓杜勒斯的話應驗。(238 頁)

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和政治局委員宋平認為，六四危機表明「我們黨脫離群眾的問題相當嚴重」(264 頁)。

發言人認為參加示威活動的大多數「青年學生和群眾」是被誤導，他們對政權並不敵視，是被「一小撮壞人」操縱了。(207 頁) 計委主任宋平指出，1988 年 9 月，在危機爆發前幾個月，當政府採取措施控制通貨膨脹時，新成立的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將這些說成是改革「走回頭路了」。宋稱這種鼓噪是政治陰謀的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趙紫陽涉嫌用此陰謀來消弱試圖阻礙趙達到邪惡「政治目的」的人的權力。(259-260 頁)

一些發言者以聳人聽聞的詞彙描述趙紫陽的政治目的。80 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主席李先念認為：

事情之所以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其根源也在趙紫陽同志，在於他明裏暗裏鼓動和支持動亂，在於他在黨內製造分裂，把矛頭引向

鄧小平和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多數人，企圖造成只有他才能出來收拾局面的形勢，通過動亂達到他想要達到的目的。(189-190 頁)

90 歲的聶榮臻元帥聲稱：「趙紫陽同志不僅是投降，還殺了回馬槍，暴露出他的政治陰謀和野心，這就更令人憤慨！」(218 頁)。

另一名元帥，87 歲的徐向前表示，趙「我看他是想當中國『民主運動』的領袖。」(214 頁)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萬里問道：「他（趙）對小平同志是個什麼樣的態度？是不是自己有領袖慾？是不是真心擁護小平同志？」(248 頁)

除了趙紫陽和自由知識份子這些內部的敵人，發言者還指出，外國敵人也對六四這場危機推波助瀾。根據宋平的說法：

這次中國學潮中，美國多方插手，「美國之音」每天造謠、煽動，唯恐中國不亂。(261 頁)

81 歲的前軍人和國家副主席王震表達了對美國戰略妄想性的恐懼：

十月革命後，十四個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一九四一年希特勒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國主義支援蔣介石打內戰，繼爾有侵朝戰爭、侵越戰爭。討不到便宜，就著重採取「和平演變」的一手。今年一月，我看到一個材料，印象很深。最近查了查，是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則消息，說美國外交專家要求政府採取「大膽的、富有遠見的政策」，把「蘇聯集團國家」「併入西方」，使歐洲「恢復到一九一八年以前的狀態」。那時布什正在競選總統，他也宣布，東歐對他來說是「充滿機會的地區。」對待中國，他們也照此辦理。近幾年來，國外、海外敵對勢力，採用「和平演變」手法越搞越兇：金錢收買，思想文化滲透，派遣特務，盜竊情報，製造謠言，挑起動亂，扶植我國內部的敵對勢力等等，除了直接出兵，什麼都用上了。(301-302 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瑞環驚呼：

要明確，我們這樣的國家如果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能當其他國家的附庸。(273 頁)

在妖魔化國內的批評聲音和誇大外國勢力作用的同時，勝利的保守派之發言顯示出他們對真正影響其政權的問題視而不見。這些問題包括通貨膨脹和腐敗，特別是學生、知識分子和崛起的中產階級對中共陳舊政治控制方法的抵觸。

然而，發言者們並不認為六四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在解釋他們何以認為本來是可以避免之時，發言者也透露了他們對共產制度中領袖所起作用的想法。根據他們的共識（或至少對那些不相信趙是有意加劇危機的人來說），如果不是因為趙在抗議活動出現之前或期間犯下「嚴重錯誤」，局勢本可以受到控制。在民主運動爆發前兩年，由於趙紫陽專注於經濟改革而忽視了「黨的建設」，也就是忽視在黨內不斷強化意識形態，因此使得共產黨變得脆弱，難以應對挑戰。正如王震所指出的那樣：

要接受處理胡耀邦同志問題的教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缺乏一貫性，耀邦留在政治局，病故後還要國葬，搞自由化的人鬧「平反」，成為動亂的導火綫。爆發一場階級鬥爭。趙的問題性質比胡嚴重得多。（223 頁）

在危機期間趙的兩個具體錯誤被認為特別嚴重：5月4日在北京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的講話以及5月16日與來訪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晤時的談話。他們認為趙發表公開言論，向公眾披露了黨內中央領導層出現分裂，從而鼓勵學生堅持強硬立場（235-236 頁）。但較為普遍的是，大多數與會者批評了所謂趙的不民主工作方式，也就是指責趙不接受那些不同意他的政策之人的意見。

87歲的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以傳統的中國共產黨模式這樣提出要求：

在黨內，在人民內部，應該也必須實行充分的、真實的、高度的民主。討論問題時，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誰對聽誰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報喜不報憂，不聽不同意見。討論的結果，如果意見還不完全一致，怎麼辦？少數服從多數。只有這樣，四項基本原則才能堅持，全黨才能一致，人民才能一致。（208 頁）

天津市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李瑞環在發言中闡述了這在實踐中的意義：

我記得，先念同志從天津路過，我到車站看他。我說……參加政治局工作以後，紫陽同志根本不讓人講話。我實在地講，兩年來，政治局會議正經八北地讓大家講講意見有幾次？每次來京一般都是開半天的會，老江我們都有感覺，一開會，一大摞文件，一大篇講話，講完了十一點多，還討論什麼？5月10號政治局開會，有的同志認為應該討論平息動亂問題，這是面臨的最迫切的重大政治問題。但是，議題只安排了中蘇關係問題。會前大家議論紛紛，我說會上也不會不提。我猜，會上可能先談別的，談得差不多，到十一點，紫陽同志該開講學生問題，講完到點，你說沒討論嗎也討論了，說討論了，你也沒有時間說話就走人。我猜的時間不太準，十一點十分紫陽同志開講。他先講，我向同志們通報一下8號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情況，講了所謂後來傳的那幾條意見，一二三四五六，六個問題。李鵬同志說，你這個話常委並沒有討論，我們還沒發表意見，這是你的意見。我才想到，原來開常委會趙紫陽同志是這樣。紫陽同志很難聽取意見，哪怕是正確的意見。（270-271頁）

趙被批評無視批評他的人，而更喜歡一群他信任的顧問的建議。宋平指責：

紫陽同志做工作，不大依靠黨的組織。這次學潮，主要發生在北京，北京市委處在第一線，工作非常艱苦。聽錫銘同志說，紫陽同志從朝鮮回來，根本不找不問他們。他只找自己熟悉的一些智囊人物……作為領導者，智囊是需要的，但要慎重選擇，要選那些忠誠黨的事業，有實踐經驗，有真才實學的人，也要能聽得進不同意見。……不能輕信那些馬克思主義修養很差，專業知識不堅實，又不甚了解中國國情的人套用西方理論提出的淺薄主張。（263頁）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使用特別尖銳的攻擊性語言，批評趙以鄧小平的名義壓制反對派：

去年十二月，紫陽同志召開政治局生活會。開始我以為他可能接受了過去的教訓，所以及時召開一次生活會。既然是生活會，當然主

要應該對紫陽同志這一段工作提出建議，提出意見，提出批評。不料他講了一篇開場白，根本不是要求大家如何對他進行批評。後來李鵬同志很委婉地把幾個重大問題都提出來了。提出來以後，江澤民同志講了一下，田紀云同志講了一下。原來我也準備講一講，尚昆同志大概也要講一講，因為時間不夠，就散會了。……但我沒估計到，李鵬同志和其他同志提了意見之後，紫陽同志卻一句話不吭，連一句歡迎的話都沒有。他不光不吭，更坏的是，他接著就向小平同志彙報了李鵬同志和其他同志對他的意見。彙報之後，他一回來就接著又召開所有參加政治局生活會的人，大講一通小平同志怎麼支持他。……還不是用小平同志來壓制民主嗎？（246-247 頁）

中共一個特設機構「中央顧問委員會」（簡稱中顧委）的高級退休領導人對趙紫陽提出特別的指控。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稱，中顧委的老人經常想引起趙的注意，但卻遭到忽視。

自從紫陽同志任總書記以後，我們感到他有變化，或者說有很大變化。中顧委不少同志對他有意見，其中有些意見比較尖銳，如作為黨的總書記很少過問黨的建設，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領域的工作，並涉及到他重用哪些人的問題等。我們通過正常渠道向他反映，但他不大聽得進去。有時顯得不耐煩。（232 頁）

宋指控趙紫陽拒絕邀請中顧委委員按照黨章第 22 條的規定審計政治局會議，趙還忽略顧問委員會在 1988 年中期至 5 月下旬提交的 39 份「送閱件」，其中三份是根據針對當前動亂形勢的發言而整理的。（232-235 頁）

楊尚昆總結了趙的工作作風問題。他是鄧小平最信任的下級和代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正式職務，有權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楊說：

回想起來，趙紫陽同志擔任總書記之後，常委從未形成核心。趙紫陽同志是知道常委有許多意見的，他只召開了一次生活會，對大家提的意見，他聽不進去，也不作認真的自我批評。反而對其他同志遠而處之，自己獨斷專行，使中央常委工作，實際處於只有具體分工，

而沒有集體領導的狀態，嚴重地違反了黨的集體領導的最高組織原則。(242 頁)

楊的批評證明了為什麼中國領導人為了統治必須將獨裁權力集中在自己個人身上。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將無法拍板作出決策以解決問題，而亦難擺平反對他政策的元老和黨內對手。唯一可行之法就是清除所有對手，將願意追隨的人聚集在自己身邊，而這正是習近平近年來所走的道路。

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有幾位與會者不僅需要批評趙紫陽，還必須自我批評。他們是支持趙反對戒嚴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以及兩名在危機期間執行了趙紫陽指示的高級黨員，即分管媒體的芮杏文和搞統戰工作的閻明復。由於他們與趙的親密關係，這三個人發表了措辭強烈的懺悔聲明。

胡啟立承認，他曾擔心過面對如此大規模的群眾示威調集軍隊進入城市會導致災難；他希望政府承認學生示威是愛國的；並且在 5 月 17 日上午鄧小平住所進行的會議上隨著大多數人同意實施戒嚴，但並非真心。但是：

現在，通過學習小平同志 6 月 9 日的重要講話，對照自己當時的思想，深感自己的認識差距很大。我對這場動亂的性質、原因、鬥爭的嚴重性認識不清，被表面現象所迷惑……這表明我的政治水平很低，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面前頭腦不清楚，沒有經受住考驗。作為黨的幹部，我要繼續學習小平同志講話，繼續提高覺悟，提高認識。(277 頁)

作為負責管理媒體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承認，他遵循趙的命令讓媒體公開報導了學生運動，導致「輿論嚴重失控」。(283 頁)然而，他說自己只是遵守命令，甚至指出他和胡啟立在危機初期就已經警告過趙形勢會很危險，但是趙忽視了他們的建議。(286 頁)芮杏文表示，之前他未能很好地理解鄧小平賦予藝術家和作家創作自由的政策以及趙利用這個政策全面放鬆輿論管制的錯誤這兩者之間的區別；(288 頁)他現

在認識到保守派領導人提出需要堅持長期不懈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必要性。

黨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批評自己帶著趙紫陽的口信給楊尚昆，試圖請楊出面說服鄧小平軟化其立場；並且自己對學生運動抱有困惑的看法，因而與學生代表的四次對話中採取了過於溫和的立場。

經過這場反革命暴亂，我深深感到，如果沒有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特別是小平同志，及時決定採取果斷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亂，沒有楊主席、沒有李鵬等常委多數同志堅持小平同志的正確判斷和決策並堅決予以貫徹，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幾千萬先烈的犧牲換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將毀於一旦。小平同志又一次挽救了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一定遵循小平同志關於冷靜地考慮過去、考慮未來的教導，認真地總結經驗，認真地檢查和反思。（297-298 頁）

這些由衷的自我批評並沒有挽回胡啓立、芮杏文和閻明復的黨內高位。但是三人沒有一個被開除出黨，兩年後各自獲安排了新的職位，但比他們 1989 年已經達到的職位要低得多。

正如編者註釋所指出的那樣，這些文件中沒有任何內容涉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喬石曾在 5 月 17 日關鍵會議上就是否宣布戒嚴態度曖昧。但喬作為中國無所不在的安全機構的負責人，在這次會議上沒有被降級，直到 1997 年退休，他一直擁有政治局常委之職位。

在宣誓效忠鄧小平並將全部責任歸咎於趙紫陽的同時，許多春風得意的保守派人士對鄧小平所授意的由趙紫陽在改革開放十年中所實施的政策表示深深的不滿。例如，李先念長期以來對鄧小平的政策不滿，現在以批評趙的方式表達了他的疑慮：

他不注意重大比例關係的協調，他不注意農業和基礎工業的發展，讚賞和鼓勵「赤字無害論」、「通貨膨脹有益論」，使宏觀失控，造成長期的經濟過熱，總供給與總需求嚴重失衡。

他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產事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生產上，而過分熱心地提倡私營經濟的盲目發展，又不作必要的管理，結果扶植了一大批「大倒」、「小倒」，讓一批投機倒把、行賄受賄、坑蒙拐騙、

偷稅漏稅的人大發橫財。從北京的情況看，這些人中不少是這次動亂的積極參與者或支持者。(190-191 頁)

同樣，宋任窮還提到，一些最高級別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在一份關於國有企業改革政策的文件中反對趙的「改造」這一用語，(234 頁) 因為這個詞意味著偏離了他們認為的社會主義核心原則。但他們肯定知道這個詞實際上反映了鄧小平的政策意圖。

王震表示擔心鄧小平授權的經濟改革正在引領中國與西方融合。王震說：

我們應當認識到，小平同志所講的改革開放，與趙紫陽同志所講的改革開放，有本質不同。小平同志講的改革開放，是要堅持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繼續保護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投資方向是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趙紫陽同志的改革開放，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提倡消費，滋生浪費和腐敗現象。趙紫陽同志絕對不是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執行者，而是歪曲和破壞者。(311 頁)

彭真表達了另一個針對鄧小平政策的抱怨：

這些年來，階級鬥爭的意識淡薄了。實際上，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一天也沒有停止對我們的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顛覆我們國家的活動。……多年以來，我們黨沒有系統地、深入地、全面地整頓思想、組織和作風了。(199-200 頁)

退役元帥聶榮臻重點關注恢復軍隊名譽，這顯然是鄧小平的責任，因為這事完全超出了趙紫陽作為總書記的職權範圍：

但近年來，在國際形勢緩和下，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下，專政意識淡薄了，思想政治工作放鬆了，許多同志誤認為軍隊不重要了，所以打罵軍人、軍地關係緊張的事件屢有發生。同時，我們軍隊有些同志也不安心部隊工作，想解甲歸田，到地方去顯身手。這是非常錯誤的。我想經過這次血的教訓，這些同志的頭腦大概清醒了，槍桿子不能丟！(220 頁)

四中全會上發表的這些講話透露了中共高級領導人對如何解決中國經濟和政治問題其應對之策是非常之貧乏。對於彭真來說，答案是：

增強黨性，消除派性。派性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危害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嚴重腐蝕黨的肌體。拉幫結夥的人必然營私，必然任人唯親，必然破壞黨的原則和紀律。(203 頁)

對於聶榮臻來說，答案在於回歸 1950 年代的精神：

現在就是要總結五十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驗，發揮黨的優良傳統，徹底整頓黨風，團結群眾，重振民族精神，宣揚愛國主義思想…… (219 頁)

雖然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四中全會的目的是為天安門鎮壓後的中共領導層今後的政策路向達成共識，但共識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爆發說明，希望更激進深入改革的人們已否定了鄧小平的改革模式。而四中全會文件則說明認為改革已經走得太遠的保守派也不滿意鄧小平的改革。因此加大深化改革已經不可能，而鄧小平支持的舊改革模式則仍然面臨障礙重重。

即將上任的黨總書記江澤民試圖通過含糊鄧小平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來取得平衡。他宣稱鄧小平從未想過放鬆黨的思想紀律：

從七九年到八九年，小平同志多次提到要展開堅持支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和鬥爭。但是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意見事實上沒有得到貫徹落實。(254 頁)

他承諾以趙紫陽未曾做到的方式統一全黨：

小平同志的幾次講話都表示了對新的中央領導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後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黨內充分發揚民主，依靠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黨同志和廣大群眾的支持和監督。

同時有一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鄧小平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日常的工作，我們絕不打擾他們，但是遇到重大問題，我們

還是可以隨時向小平同志請教，聽取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意見。(319頁)

儘管有這些承諾，81歲的前政治局委員薄一波表示他擔心新領導層將繼續面臨反對的力量：

我想，這次全會產生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一定能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支持。但可能不會一下子就全部做到，還要繼續做很多艱苦細緻的工作。……中央常委一定要按民主集中制辦事，中央常委也要樹立起核心。……在胡耀邦同志的問題上檢討過一次，今天在趙紫陽同志的問題上又檢討了一次，難道還能再來一次嗎？我覺得，歷史不會在允許這麼做了，一定要接受歷史的教訓，把工作做好，也請同志們深思。(228-229頁)

事實上，江澤民從1989年至2002年擔任總書記長達13年，一直無法加冕成為「核心」。其實趙紫陽之後的繼任者無一人能夠做到，直到習近平的崛起。六四之後反改革保守派的優勢持續了三年，直到1992年，年邁的鄧小平做了一次「南巡」，迫使共產黨恢復改革開放的進程。這是他最後的政治行動，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快速經濟增長，但也阻絕了政治自由的任何復甦。

十三屆四中全會與會者面臨的核心困境仍繼續影響著當今的中國：越是通過科技現代化和參與全球經濟來取得權力和繁榮，學生、知識分子和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就越不願意接受1950年代的思想統治模式。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三十年後的今天，正如1989年的鎮壓是對1980年代改革所釋放的自由化力量的反撲，習近平對黨和社會的壓制，同樣也是對其自身現代化進程中釋放的自由化力量的反撲，當年聶榮臻的擔心不無道理：

現在，反革命暴亂平息了，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遠未肅清，今後思想戰線上的爭奪戰還很艱苦。我們要下決心打一場持久戰，準備幾代人打它幾十年！（218-219頁）

對於李瑞環來說，以及對於為四中全會提供發言或書面發言文件的所有領導人來說，解決所有中國問題的答案都靠強化黨紀：

有的同志給我講過這樣的話，過去說有些人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總覺得沒有那麼容易，現在眼看黨組織一天一天散下來，政治工作一天一天弱下來。真是用那個「淡化」，淡來淡去淡得快沒有影了。……現在社會上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比如說各種各樣的腐敗現象，各種各樣的不良風氣，一切向錢看，不講理想、不講道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承認，是這幾年削弱黨的領導、忽視思想政治工作所造成的惡果。(269-270 頁)

這就是中共領導人從 1989 年的民主運動中汲取的教訓，是一個他們不敢或忘的教訓。時至今日，習近平絕不允許對中共黨紀的任何削弱。自稱「核心」之後，他得到了領導層的支持。習近平和他的智囊們已經很好地繼承了當年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精神。

黎安友，英文《天安門文件》編者之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人權研究所指導委員會主席；前政治學系主任（2003-2006）和東亞研究所主任（1991-1995）；黎安友教授是英文《民主期刊》和《當代中國期刊》編委會成員；2013 年在柏林的美國學院曾獲柏林獎學金。

揭開中共的終極秘密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件分析

吳禹論

1989年4月15日，被指責姑息資產階級自由化而遭罷黜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病逝，北京學生和市民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悼念活動最後發展為一場聲勢浩大的和平示威。6月3至4日，中共派軍隊進入北京城區武力鎮壓，屠殺了數百學生以及平民。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事件震動了共產黨的核心，改變了人們對中國執政黨的看法，其結果奠定了當今中國的政治以及社會基礎。本書中提供的這套文件是中共黨內對「六四」事件作出最後結論時形成的，是中共黨內高層政治運作的化石記錄。

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後的30年裏，關於「六四」事件，已經出版了大量書籍、文章、照片和紀錄片。其中絕大多數都集中在當年51天之中令人眼花繚亂的公眾示威活動上。許多出版物傳達出參與或見證和平示威的數百萬人對自由的感受。

然而，回顧這一事件的時候，透過鐵幕去觀察中共高層幕後操作也很重要。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了解一夜之間就能摧毀數百萬人的夢想希望和生活的強權之本質。

本文根據迄今為止最可信的材料^[1]，嘗試探討 1989 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中共四巨頭鄧小平、趙紫陽、李鵬和楊尚昆之間的互動。本文認為，當時這四個中國最有權勢的人，手裏掌握著中國共產黨的全部力量，正是他們之間互動的最後結果，最終導致「六四」事件以血腥的方式結束。

當年，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是舉世公認的中國最高領導人；趙紫陽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一職是表面上中國最高的官位；李鵬是國務院總理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楊尚昆是中央軍委唯一的常務副主席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決策機構。1989 年 6 月 4 日前夕，其成員是趙紫陽、李鵬、喬石、姚依林和胡啟立。

歷史背景

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期，世界各地共產黨國家普遍經濟停滯，這些列寧主義政權的領導人嘗試了各種方法，試圖阻止國家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趨勢。

中國也不例外。1976 年毛澤東的去世為變革提供了條件。中共在 1980 年代改變毛澤東時代政治路線的行為被正式稱為「改革開放」，得到了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支持，並得到胡耀邦總書記和趙紫陽總理的推動和執行。

「改革開放」實質上是放棄了毛澤東「繼續革命」路線，即放棄了把政治參與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中心這樣一種統治方式。1980 年代，政治在人們的思想、文化活動和日常生活的退出，使公眾對未來的希望普遍高漲。

[1] 除非文中註明來源，本文中陳述的全部事實以及引文均來自：《改革歷程》（趙紫陽著）；網載《李鵬「六四」日記》；《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著）；《中國 80 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吳偉著）；《八九中國民運紀實》（吳牟人等編）

胡耀邦被迫下臺——1989 學生運動的根源

1989 年 4 月 15 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作去世。事件本身純屬突發事件。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卻立刻引起了公眾的強烈反響，北京爆發了大學生開始的抗議活動。

為什麼公眾會以這種方式對胡的離世作出反應？原因是他們對兩年前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一事記憶猶深。

1980 年代中期，共產黨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實際控制已經開始退潮，即使沒有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推波助瀾，學生自發示威的時候甚至不會感到特別的危險。1986 年 12 月 1 日，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舉行了一場要求「更大的民主」的示威活動。那些經歷過毛澤東時代「反右」以及其他政治運動的中年知識分子也覺得此舉可行。當年 53 歲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對示威學生給予了支持，他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

大學生示威活動迅速蔓延到全國 28 個城市，各種口號，從「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到「要求新聞自由」應有盡有。示威活動立刻遭到黨和政府的有效抵制，學校領導和當地警察紛紛出動勸阻學生不再舉行進一步的抗議活動。1986 年從安徽開始的全國性學生示威的最後一次實際上發生在北京，時間是 1987 年 1 月 1 日。全國學生運動結束，沒有發生什麼暴力或逮捕事件。

然而，1987 年 1 月 16 日，官方的新華社突然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與會者一致同意胡耀邦辭去總書記的職務。隨後一些知識分子，包括方勵之，遭到毛澤東時代常見的政治清洗。

誰又有權力將最高級別的中共領導人立即撤職？根據中共黨章的明確規則，沒有人可以這樣做。正式而言，撤銷總書記只能通過中央委員會全會投票並取得三分之二通過才能成立。但很諷刺的是，被毛澤東時代棄之如敝屣的制度規則正是鄧小平予以重新建立的。而體現尊重規則的「結束領導人終身制」據說是鄧小平在毛澤東身後所建樹的的最高政治成就之一。

在公眾眼中，胡耀邦成了學生運動的替罪羊，他的撤職違反了黨自己的規則。即使如此，胡被撤職的當時，既沒有任何黨內投訴，也沒有發生公眾或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而胡耀邦被迫下臺的原因和細節需要數年才能逐漸透露出來。

接替胡的總書記位置的趙紫陽後來解釋道：

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面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最後對胡不信任了。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後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問題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

事實上，早在1986年8月中共高層夏天到北戴河辦公時，鄧小平就已經告訴一些黨內元老，說他「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並明確表示胡耀邦在1987年舉行的十三大以後將不再任黨的總書記。

胡即將「下臺」消息改變了元老們對胡的態度。此前他們對胡的不滿，不會公開表露，僅僅會用委婉的方式間接表示。胡耀邦則一如既往地繼續工作，絲毫沒有注意到某些人對他態度的改變。

1986年12月學生運動爆發以後，鄧小平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贏得黨內元老們的支持。12月27日，在鄧小平住所，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余秋里、鄧力群、胡喬木等人參加的會上，與會者一致認為：學生運動是胡耀邦姑息「資產階級自由化」且領導不力的結果。

鄧小平一旦公開批評，一切對胡耀邦來說都已經無法挽回，只能坐等下臺的命運。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要求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與何東昌等到他家見面。在這次會議上，鄧講了一通關於共產黨的領導人應如何對付學生運動。他的講話不久之後廣為流傳，其中包括以下段落：

波蘭領導人當時頭腦是清醒的，態度是堅決的。面對團結工會與教會勢力勾結，並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勢，他們採取了軍事管制，

控制了局勢。這說明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鄧指的是波蘭共產黨（聯合工人黨）對團結工會運動的鎮壓。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波蘭實施戒嚴。然而，1987年中國公眾完全無法獲得這種信息。也許是因為下令鎮壓的波蘭聯合工人黨在1989年後已不復存在，講話這一段落後來在199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中被刪除。

1987年1月4日，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再次被叫到鄧家的住所時，他也感到驚訝：

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裏開會，我大約10點鐘到達，那時陳雲、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經到了。等到齊後，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這封信是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大意是說，幾年來主持工作不够謹慎，辦了許多糊塗事，內事外事都有。主要講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旗幟不鮮明，所以助長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做了一些壞傢伙的保護傘。鑒於錯誤嚴重，請求讓他下來，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待。

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以後，鄧就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會上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2】

1月4日在鄧小平的住所舉行的會議，意味著胡耀邦擔任黨總書記的正式結束。鄧小平任命了一個「五人小組」取代政治局常委，在九個月後才召開的十三大之前，執行黨的日常事務。鄧然後宣布兩件事情。首先，將以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名義舉行黨內「生活會」。據鄧小平說，目的是「批評和幫助」胡耀邦；然後，胡耀邦的辭職將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正式被接受，而不是通過中央全會。

這樣的安排顯然違反了黨的規章制度。儘管如此，陳雲仍宣稱是合法的，沒有人反對，包括趙紫陽，他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承認了這一點：

陳雲在這個會上說話較多，比較活躍。他在這次會上非常鄭重其事地宣佈，今天這個會議的決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看來陳雲是

【2】 其他與會者還有陳雲、楊尚昆、薄一波、萬里、王震及彭真。

很注意這些事的，注意組織原則、組織手續的。他大概怕人家說政治局會議就能接受總書記辭職會引起國內外議論，所以特別宣佈，這樣做是合法的，合乎手續的。鄧就沒有考慮，不大在意，也不在乎這樣的事。

當然，後來對耀邦這樣的處理，特別是顧委會生活會對耀邦的批評，在國內外引起一些議論，認為對耀邦的處理是不正常的，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撤換領導人。所以後來對我的問題上也算是接受了這個教訓。

鄧小平如何獲得胡耀邦的辭職信的細節尚不清楚。據信，鄧事先派遣了使者與胡耀邦面對面交涉。前《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指出：

鄧小平指定薄一波、楊尚昆、趙紫陽、胡啟立、萬里（一說是宋任窮）同胡耀邦談話。這些人得到什麼授意，他們同胡耀邦談什麼內容，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測：胡耀邦辭職，並作深刻檢查，大概是他們談話的結果。

其中趙紫陽的使命顯然是告訴胡耀邦關於在黨內「生活會」的情況，並且讓其有所準備：

我還說，你的辭職公開以後，可能會有人打着擁戴你的旗號鬧事（因為我當時確實估計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事先和他打個招呼，以便有所準備）。他說，他會堅決站在黨一邊。

「五人小組」的第一個任務是組織黨內「生活會」。該會於1987年1月10日開始，開了五個上午和一個全天。

根據所謂的「黨的歷來慣例」（趙紫陽語），「生活會」上發表的每篇講話都應該重復對胡耀邦的標準化批評，比如沒有尊重和執行小平同志的指示；處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疏忽或者軟弱等等。

但是黨內本來就對胡耀邦不滿的人，利用講話的機會發洩憤怒，推進自己的議程。例如，鄧立群的講話持續了五個小時。其他一些人，特別是那些以前與胡耀邦關係比較密切的人則利用會議的機會，同下臺的總書記劃清界限，拉開距離。趙紫陽的印象是：

這次會上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里的發言。……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比較親密。但在這次生活會上，余秋里卻作了一個極其尖銳的批評責問耀邦的發言。他收集了那個時期耀邦在不同場合有關十三大鄧及其他老人們退留的問題的講話和答記者提問，然後當面責問耀邦：你動機何在？爲什麼這樣說？所以余秋里這個人平時貌似耿直，在關鍵時刻反戈一擊，保護自己，也是他面目的一次暴露。

最後，胡耀邦在會議上發表了自我批評，承認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講到後面聲淚俱下。

楊繼繩寫道：「胡耀邦這樣檢查是違心的。」胡本意是「爲了顧全大局，爲了保護一批幹部。」

許多中國人顯然都讚同楊繼繩的觀點。當人們獲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時，這些仍然記憶猶新，人們想要有所表達。

1989 年學生運動

「不應該死的，死去了，該死的卻沒死。」

1989年4月15日，這個說法隨著胡耀邦的死訊傳播開來。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句話來自於女作家冰心，更少有人知道最早登載這句話的是官方的中新社。

雖然89歲的女作家在在她痛悼胡耀邦的這篇文章中，這句話後面又寫了一句「該死的就是我自己！」前兩行卻深深扣住了公眾的想像力，像野火一樣傳播開來。似乎那個時刻，大多數人的心里都有一個誰該死誰不該死的願望。這兩句話在整個1989年天安門抗議活動中成爲最廣泛使用的口號之一。

胡耀邦是一位深受人民愛戴的總書記，他平反了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被清洗打壓的黨員，並爲推進改革開放做了很多實事。他去世後，哀悼者自發地在天安門廣場中間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堆放祭奠的花圈。4月16日，北京控制的香港《文匯報》報導，胡耀邦的家人要求黨就胡耀邦1987年的辭職作出「結論」。可是對黨來說白紙黑字的結論是難以作出的：真實的描述會留下非法的證據，公開撒謊則會成爲舉世笑柄。



但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立即呼應，並支持這一要求。同時這個呼籲很快影響了大學生們。

4月17日北京哀悼胡耀邦的情緒中有潛在的政治因素並不是秘密。《紐約時報》的駐京記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

用中文口語說「小平」與「小瓶」同音。雖然鄧小平名字中「平」的字符不同於「瓶子」中的「瓶」，但人們抓住了其象徵意義。十年前，鄧小平正在努力奪取權力，表達了放棄革命而使國家繁榮的希望。當時，普通民眾通過在顯眼的地方留下小瓶子來表達對鄧小平先生的支持。如今，有些人通過砸碎小瓶子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十年前，言談很多而不是行動，現在也是更多人談論砸瓶子而不是真的去行動。「有什麼意義呢？」北京的一位年輕人解釋道。「如果在公共場合砸瓶子，你可能會被抓起來，如果你在家裏砸，你還得自己掃地。」

.....

總而言之，甚至中共官員也已承認，大眾對鄧氏已日感厭倦。

4月18日上午，政治局開常委會討論學生的悼念活動。由於胡耀邦是黨的前總書記，他去世時仍然是政治局的一員，因此制止公共紀念活動明顯不符合情理。與會者預計在官方追悼會之後事情會恢復正常。

然而，國務院總理李鵬對學生的活動最為不安，他與元老楊尚昆商量。楊對李的建議是至少在官方追悼會結束之前，要容忍學生的活動。

4月18日晚，發生了自發哀悼轉變成公眾示威活動的第一個跡象。北京的大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前，這是中共中央總部所在地中南海的象徵性正門。學生們當場草擬了內有七項條款的要求：包括對胡耀邦的重新評價；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重新評估；公佈高級黨官收入；增加教育經費提高教師工資；新聞自由以及取消對遊行示威的限制，等等。官方新華社公開報導了這些要求。在整個1989年學生運動期間，類似的要求被不斷提出，範圍大致如此。

4月19日晚，李鵬打電話給趙紫陽，問為什麼沒有採取措施驅散新華門外的學生。這是政治局常委中第一次出現意見不同。趙將李的投訴轉交給負責安全機構並且值班的常委喬石。凌晨3點左右，警方採取了行動：學生們被塞進公共汽車，新華門前的區域被清理乾淨。警察的一些粗暴動作立即被學生示威者將事件稱之為「4-20慘案」，但這個標籤很快就被遺忘，因為隨後發生的事件一件比一件更具戲劇性。目前尚不清楚，4月20日凌晨3點警方採取行動是否與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電話通話有直接關聯。

胡耀邦的官方追悼會定於1989年4月22日上午舉行。前一天晚上，北京數萬名大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外天安門廣場西面。因為官方舉行追悼會，根據新華門清場的經驗，學生們預計安全部隊會採取行動對付學生，這是一個漫長的等待之夜。就是在此等待期間，學生們成立了一個新組織——北京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參與者來自北京幾十所大學。名義上的「自治」是有意同共產黨控制的官方學生會拉開距離，以



示區別。新的組織採用了兩天前新華門前草擬的非常相似的七項要求，並且通過揚聲器向聚集在廣場的大學生們宣布。

就在他們組織行動的當天，4月21日，47名著名知識分子，包括社會科學家和文化工作者北島、戴晴、嚴家其等共同簽署了一封支持學生的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

當學生們自發地組織起來，並且正在全面形成一個社會運動時，中共並沒有袖手旁觀。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從北京西南150公里處的保定調集了38軍的兩個步兵師，約1500名士兵進京。在4月21日午夜之前，軍隊的士兵已經在北京市中心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以及關鍵設施上崗。身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是否知道到這次部隊調動，至今尚不清楚。

第二天上午，官方追悼會即將結束，三名學生代表被允許穿過一堵武警士兵組城的人牆，上到人民大會堂東門的臺階。他們要求會見總理李鵬。這一要求喚起了人們對周恩來總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與中南海前聚集的紅衛兵面對面談判的回憶。當學生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三位代表乾脆在台階上恭敬下跪40分鐘，但當局仍然置之不理。坐在武裝警察隊伍另一邊的廣場上的大學生們目睹下跪場面，頓時群情激奮。

官方追悼會結束後，趙紫陽制定了一個三點行動方案來處理學生示威活動。第一、社會生活恢復常態，勸阻學生停止遊行讓他們回校復課；第二、對學生採取疏導，開展多層次的對話，在學生教師知識分子中徵求意見；第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對打砸搶燒依法懲處。4月23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前往朝鮮，這是他作為總書記的第一次出國訪問。這次為期七天的訪問成為轉折點，使趙紫陽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據趙紫陽回憶，臨行之前沒有跡象表明領導層中有任何人，包括鄧小平，不同意他的三點行動。而且還得到政治局常委批准並已形成文件。4月22日，陝西西安的示威活動導致一些汽車被推翻和少數建築物

被焚。中共立即調動 4000 步兵趕往西安，示威活動在 4 月 23 日之前就被徹底控制。趙紫陽離開以後，由總理李鵬補缺主持政治局常委會。

4 月 23 日下午 4 點 20 分，李鵬到火車站送趙離京去朝鮮。臨行前趙再次重申了他的三點行動方針。趙走以後，李鵬對趙把處理學運的負擔交給他感到不舒服。李鵬在 4 月 23 日日記中寫道：

匯報會結束後，我和喬石同志商量，以趙紫陽剛走時說的三條原則為內容，發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並由中央向各地發一電報通知，提出處理當前學潮的三條原則，強調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做好學生工作，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堅決制止一切打砸搶不法行為。

下午 4 時 20 分，我到北京火車站去歡送趙紫陽出訪。看來，他並不歡迎我的到來。他說，不是簡化禮賓規格嗎，你這一來就破格了。我說，破一次格也值得，現在社會上傳聞多得很，不少人說中央內部不團結嗎，今天我來送你，可以顯示中央的團結。他聽後也未置可否。

形勢在不斷變化，紫陽一走，這副擔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對目前發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學生不上課，整整亂了十年，人民吃盡了苦頭，國家遭受災難，不能讓這種悲劇重演。**但我對如何處理當前的混亂，也苦於沒有辦法。在這時，尚昆同志建議我主動找小平同志請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 12 時，錫銘同志報來北京市政府發言人關於澄清「總理拒見遞交請願書的學生代表」謠傳的談話稿。……

已過深夜 12 時。我靜靜地陷入沉思，不禁向自己提出兩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趙紫陽說他最敬重鄧小平同志，對鄧的指示從來不折不扣加以執行，為什麼在這次學潮中，卻反其道而行之。……第二個問題，學生為什麼非要向我遞交請願書，而不是向趙紫陽遞交？

日記非常清楚地表明，即使李鵬對於承受處理學運的重擔感到不安，但是因為「也苦於沒有辦法」，在午夜之前，他還是在忠實執行趙紫陽確定的三點行動方案的。然而在午夜之前，李鵬雖仍然為自己的前

途而擔心，懷疑學生們故意將矛頭指向他，有些事情已經讓李鵬清醒地認識到鄧小平並不支持趙紫陽的方針。

無論如何，第二天李鵬的態度與行爲已經徹底改變。4月24日晚間，李鵬主持了一場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這個名稱，有意給人以毫無預先安排的非正式的印象。但正是這次會議逆轉了整個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命運。李鵬自己並不掩飾是「關鍵的一次會議」。與會者不僅包括四位仍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還有楊尚昆、萬里、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等，另有其他政治局委員，如田紀雲、李錫銘、宋平、丁關根以及其他相關部門領導人。從參與「碰頭」的名單上看，與其說是政治局常委會，不如說是黨內高層領導針對學生運動的動員大會，因為宣傳部門、教育部門和北京市政府的負責人都在邀請之列。

4月24日的李鵬日記記載如下：

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當前局勢嚴峻。首先在北京繼而波及到全國的學潮，實際上背後有人操縱，煽動鬧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針是首先穩住北京，進而穩住全國。李錫銘在會上表示，只要中央態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眾發動起來，挽回局勢。在討論中，我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一是《人民日報》發一篇有份量的社論，傳達今天常委碰頭會議的精神；二是由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全國各省市發一通知；三是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傳達今天會議精神。經過討論，大家認為可先發一篇有份量的社論。會議還通過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位同志組成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負責在第一線處理學潮。散會時已是晚上11時半。

然而，李鵬突然生出的信心和辦法，做出了這樣的決策令人困惑。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者吳國光教授在對李鵬日記的分析中指出了這一點：

這裏有一個重大的疑點，那就是：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四點多鐘，趙紫陽離開北京出訪北韓，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李鵬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碰頭會，確認當前學潮「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

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予以制止」。根據李鵬此書的敘述，這次碰頭會「是一次關鍵的會議」，出席會議的人員「大家意見空前的一致」。會議作出三個具體決定，即決定《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有份量的社論」，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並成立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人組成的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這就是說，在二十五日上午去見鄧小平之前的頭一天晚上，尚未等鄧表示意見，李鵬已經不僅把他自己對於學潮的負面看法上升為指學潮為「打倒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體看法，而且迅速地、全方位地展開了貫徹基於這種看法的強硬應對方針，從政治局常委到黨中央機關報，都在他的調動下行動了起來。

疑點就在這裏：李鵬為什麼不等到第二天上午鄧小平發話之後再來行動？李鵬有什麼根據，確定鄧小平一定會全盤接受他李鵬的看法？李鵬有什麼力量，能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一夜之間轉向，從半數人讚成趙紫陽的看法轉變為「一致」接受李鵬的觀點，並迅速跟隨李鵬行動起來？……

帶著這個疑團，細讀李鵬此書，我們可以發現一條重要線索：李鵬記載，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時半，楊尚昆「鼓勵」李鵬去見鄧小平，並答應同去。但是，是當晚就去了呢，還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鵬沒有明確交待。

吳教授的分析指明了李鵬是根據鄧小平的命令行事的可能性。由鄧小平直接，或是通過楊尚昆間接，傳達給李鵬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無論如何，從另一方面，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李鵬在召開4月24日晚常委「碰頭會」之前就知道，他自己前一天還在跟進執行的趙紫陽的三點行動方針會被推翻。根據在北京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學者吳偉的記錄：

但是李鵬卻特意囑咐中辦，不讓通知按規定從來都列席常委會的中央常委政治秘書鮑彤到會。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作了一篇早已準備好的大講形勢如何嚴峻的彙報。這個彙報認為，學生已經被少數壞人操縱，矛頭是對著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是對著小平等老同志的。

1980年至1986年，鮑彤曾擔任趙紫陽秘書兼總理辦公室主任。在1989年的常委會上被視為趙紫陽信任的人。故意排除鮑彤，表明李鵬在「碰頭會」之前就已經在內心裏與趙紫陽展開對抗。4月16日的《紐約時報》早已報導說「大眾對鄧氏已日感厭倦」，但北京市委李錫銘24日的彙報說，常委才發現學運有「對著小平老同志」的成分，這純粹是個低劣的謊言。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像是公開而符合議事規則。李鵬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在4月25日上午10點，在鄧小平的住所報告了他們的決定。鄧立即表示給予支持並講了一番話。鄧小平的的確切用語在場的與會者用筆記的方式記錄下來，下午3點左右，李鵬已經將鄧的講話內容以印刷內部文件的形式在黨內和政府部門廣為分發。鄧的講話成為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的主要基礎。

即使沒有李鵬下發的鄧小平講話，鄧小平掌握最高權力，掌握最後拍板權的事實從來都不是什麼秘密。用晚清宮廷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來比喻鄧小平的幕後操縱是路人皆知。

4月26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將學生運動稱之為「動亂」，並說制止動亂是「擺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肅的政治鬥爭。」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對毛澤東時代的殘酷政治運動，如反右，如文化大革命，仍然記憶猶新。這種強硬的措辭只能意味著一件事：執政黨強大的專政力量將直接壓向參與學運的人（當時已經擴散到中國各地的300多個城市）。在隨之而來的政治運動中，這些人將面臨難以想象的後果，幾百萬人的生活將會受到負面衝擊。

社論沒有留下任何迴旋的餘地。由於轉載鄧小平4月25日講話內容的黨內文件廣泛流傳，以至內容立即在香港《明報》被報道出來。426社論的內容來自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已是公開秘密。

對於全國各地的官員來說，社論要表達的信息更是明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迅速行動，派人全面控制了不顧市黨委阻撓而刊登了紀念胡

耀邦專版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江澤民的快速反應成爲他政治生涯的最大機遇，使他即將取代趙紫陽，獲得共產黨總書記的地位。

然而，面對嚴峻的形勢，民衆的反應也並不在如共產黨所習慣的那樣因恐懼而逆來順受了。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毛澤東一言九鼎，每一個願望都會立即轉化爲現實中的行動及響應。但在 1989 年，面對來自領袖的威脅，學運參與者在刺激之下，立刻行動起來，反而以更爲聲勢浩大的遊行做出回應。4 月 27 日，成千上萬的學生從西北方向的大學區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沿途幾十萬北京市民支持者加入他們的隊伍。示威者途中衝開幾道警方障礙，歡呼著進入天安門廣場。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絕無前例的事件。共產黨統治下，明知違背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意願，人民依然敢於抗命自發採取行動，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如果這樣的行動得以持續，正如推翻柏林牆事件一樣，那將意味著中國政治板塊的重大轉變。

有跡象表明，4 月 27 日遊行之後，甚至鄧小平也一時不知所措。趙紫陽的回憶中寫道：

李鵬決定 4 月 25 和 26 日在北京及各地大範圍地傳達鄧 4 月 25 日講話，也引起了對鄧的不少議論和批評。鄧和他的家人對這件事很有意見。鄧家人說，李鵬等人一下子把鄧拋到了第一綫，自己去做好人。……

當時因爲廣泛傳達了鄧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像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加上鄧歷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

在沒有來自鄧小平的進一步指示之前，李鵬處於失措狀態。4 月 27 日，李鵬搬到中南海 202 號居住，以保安全。預料到「五四」青年節會有更多的學生抗議活動，李鵬提出一個行動計劃——由政府組織一次反遊行示威「把主動權拿到黨的手裏」，後來政府組織的遊行示威真的發生了，即刻在天安門廣場上成爲笑料，很快就被人遺忘。



對於李鵬來說這一切可絕對不是開玩笑，在他整個政治生涯裏，此刻他冒了極大的風險。趙回憶說：

李鵬曾向閻明復說過（閻明復在我從朝鮮回來後告訴我），如果趙回來不支持 426 社論，他只有下臺。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

4 月 30 日從朝鮮回來以後，趙紫陽並沒有急於支持李鵬和 426 社論。趙紫陽有他的理由：

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 426 社論鬆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賬，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着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歷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

趙紫陽知道，任何方針計劃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5 月 1 日，他打電話到鄧小平的住所，希望同鄧見面。不想鄧小平的秘書電話中說，鄧的身體不太好，擔心不能及時康復參加 5 月 16 日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會晤。

對於趙紫陽，這是非常不祥的跡象。5 月 2 日，香港《明報》就已經報導說，北京有謠言說學運背後的「黑手」是指趙紫陽，趙紫陽最終會因為這次學運而下臺。5 月 3 日，趙紫陽再次嘗試通過楊尚昆去接觸鄧小平，但是楊禮貌地拒絕了，說目前不可能勸動鄧小平。

5 月 1 日，趙紫陽打電話求見時，鄧小平在想什麼幹什麼是歷史上的一個謎。從 4 月 26 日到 5 月 10 日，鄧小平的下落公眾至今一無所知。這一期間內，伊朗總統哈梅內伊的來京進行國事訪問。由於見不到鄧小平，哈梅內伊決定取消所有會議，5 月 9 日讓李鵬在人民大會堂等了兩個小時，中國與伊朗的關係處於危險之中。而鄧小平終於再次出現，是在 5 月 11 日與哈梅內伊正式會面。

在沒有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指令的情況下，趙紫陽和李鵬在政治局常委討論中，就如何結束學運問題，在任何一件事上都無法達成一致。兩人都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5月4日，趙紫陽利用亞洲開發銀行年會（ADB）發表講話的機會，試圖為學潮降溫。在演講中，他承認學生的動機是愛國的，並承認他們支持共產黨的改革開放。同殺氣騰騰的426日社論相比，趙的講話調子明顯相當溫和。但對於在天安門廣場已經嚐到自由的學生來說，遠遠不夠。學生示威抗議活動仍然繼續。

李鵬對4月26日社論問題感到極度壓力。如果黨從社論的強硬立場退下來，他的職業生涯就會結束。因為在這個關鍵點上他與總書記的對立已經公開。事後二者不會繼續共事，只有一人可以留下來。從學運開始到5月8日晚上去游泳池之時，李鵬的體重已從75公斤下降到70.5公斤。



5月11日，鄧小平重新露面，李鵬首先鬆了一口氣。李鵬日記當天記載：

上午，鄧小平同志的秘書王瑞林給我來電話，傳達小平同志的意見。小平同志說：沒有4月26日社論，就沒有今天形勢的緩和，要李鵬堅決頂住來自內外的壓力。

5月13日出現了新的行動方案——數百名學生運動者發動絕食抗議，希望迫使共產黨接受他們的要求。年輕人寧願為國家而死的形象，即刻感染了全國的各行各業，贏得了公眾的廣泛支持。成千上萬的人參加了示威遊行，社會各界公開支持學運的橫幅遍佈天安門廣場。

與此同時，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的海德公園。實際上示威抗議者也很焦慮，只是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一起享受言論和表達的自由。

廣場上的抗議者也面臨著自己的問題。長期僵局使參與者和老百姓均感到疲憊。結局將會是什麼？要等多久才能看到最終的結果？卻是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的。

對於共產黨來說籌碼再一次被提升。然而，這次鄧小平絕對不會讓步。5月13日那天，趙紫陽在楊尚昆的陪同下終於與鄧小平見了面。趙提出了同社會各界對話、全國人大會議和提高政府透明度以緩解抗議活動。趙並沒有全部透露鄧小平的反應，但李鵬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今天，楊尚昆同志向我通報了上午10時趙紫陽約他一起去小平同志處談話的主要情況。趙紫陽向小平同志提出，他主張對學生採取對話，通過人大常委會討論，增加透明度來解決學潮問題。小平同志講：懲治腐敗，說了不少的話，但沒有認真貫徹。提高「透明度」，怎樣「透法」要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學生組織不能承認。小平對趙紫陽說，我現在感到很疲勞，腦子不夠用，耳鳴得厲害，你講的話我也聽不清楚。實際上小平同志用很清楚的語言否定了趙紫陽要在新聞上搞「透明度」的做法。對鄧這次重要的講話，趙紫陽始終沒有透露出來，也沒有向常委傳達。







此時趙紫陽一定已經意識到他的政治生涯正處於低谷。鄧小平不僅不支持他，還主動站到反對他的立場上。沒有鄧小平的支持，黨領導的全部國家機器都不會支持趙紫陽。形勢在繼續惡化。但是趙紫陽還有一件必須做的事情——中蘇峰會上會見戈爾巴喬夫。這是自中蘇在冷戰期間分裂以來，蘇聯共產黨首腦的首次訪華。

5月16日，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的會晤中表示，儘管鄧小平在1987年的第十三次黨代會上正式退休，但鄧小平仍然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後來說，他的意圖是強調鄧小平和戈爾巴喬夫之間的會晤才是兩個共產黨關係正常化的象徵。令他驚訝的是，公眾對他的言論有不同的解釋，那就是鄧小平要為學生運動而負責。趙紫陽的說法引發了外界對共產黨的瀕臨崩潰的猜測，使廣場上的示威活動再創新高。

5月17日，戈爾巴喬夫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鄧小平立即在他的住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實行戒嚴，最終於結廣場上的示威行動。趙紫陽被擱置。李鵬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楊尚昆調集軍隊實施戒嚴。5月19日，現場直播黨政軍戒嚴的動員大會，趙紫陽拒絕參加。到那時，鄧小平已經向黨的元老們和政治局常委宣布江澤民將接任總書記。鄧小平與趙紫陽公開決裂。李鵬日記5月19日援引鄧小平的話說：

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指鄧小平）和趙紫陽。

戒嚴令於5月20日實施後北京民眾的反應，對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說又是一個極大的意外震撼。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北京居民和示威者自發出動，在北京全城各個方向用身體攔截了進京的戒嚴部隊。

一時間形勢看起來又發生了變化，其實共產黨權力機構正在全力而有效地運作。楊尚昆下令軍隊整修三天，進行思想動員，同時又向北京調集了更多軍隊。

儘管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表態支持鄧小平，黨仍然需要新一輪重新宣誓效忠。截至5月21日，來自22個省份的領導人發電文表示支



持。政治局常委們與關鍵位置的官員展開私人談話，確保他們的態度記錄在案。

據李鵬日記，針對軍隊進城受阻，中央軍委批准了北京軍區提出戒嚴部隊以隱蔽方式進入天安門的方案。

截至 2 日凌晨 3 時，已有 25000 人進入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東側的公安部大院、北側天安門與午門之間，在南面，北京東站也有先期從沙河到達的 3000 兵力，已形成四面對天安門包圍之勢。

部隊偷運武器的軍車被市民和示威者發現截獲，然後公開向民眾展示出來。6 月 3 日開始，在部隊企圖搶回被截獲的武器的時候，軍民之間發生了衝突。官方宣傳中所稱「動亂」立即升級為反革命「暴亂」，企圖證明動武的正當性。

6 月 3 日晚和 6 月 4 日凌晨，全副武裝的步兵集團軍在坦克、裝甲車的掩護下，從四面八方圍攻天安門廣場。行軍途中遭遇留守街頭的



近百万抗議者和支持者，部隊開火，造成數百或至千名手無寸鐵的平民死亡。準確傷死亡人數至今未知。

這便是被稱為「六四」事件的天安門大屠殺。該事件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分為前後兩部分。與不久後在蘇聯和東歐發生的類似事件的結果相反，中國共產黨保住了對權力的絕對控制，但永遠改變了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鄧小平在支持趙紫陽十年改革開放後，會突然拋棄趙紫陽？這個問題在歷史上仍然是個謎。5月11日「要李鵬堅決頂住來自內外的壓力」的表態之前到底發生過什麼？或者是在5月1日，趙紫陽剛從朝鮮回來要求見面之前甚至更早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些問題至今也無確切的答案。

江澤民代替趙紫陽繼任總書記，可以看出是個事前毫無準備的匆忙的人選。甚至江澤民也擔心自己的權力過渡是否是通過合法程序進行的。據李鵬日記：

江澤民同志多次向我表示，他絕不能接受 1987 年初通過批胡耀邦同志，讓趙紫陽上台的那種做法，總書記上台、下台都沒有按照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免職和產生。

由於事件中鄧小平的確切角色尚不完全清楚，李鵬則一直被外界稱為「北京屠夫」。但從其日記中可以看出，李鵬希望表白自己是一個忠於黨的幹部，一向遵循鄧小平的指示。他熱情支持鄧小平的決定，顯然並不想貪天之功為己有。





1989年4月23日的日記中，李鵬暗示在主持常委「碰頭會」前得到鄧小平的指示。15年後，在鄧小平誕辰一百週年之際，李鵬是唯一的在官媒中重提「天安門舊事」之人，他說：

由於黨的個別領導人放鬆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使自由化思潮得以氾濫。小平同志及時發出了警告。…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鄧小平同志以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氣魄，和其他老同志一道堅決有力地及時支持黨和政府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那場政治風波，保證了國家的長期穩定，為以後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事後多年，仔細分析當年的紀錄，看來「六四」事件是因一系列不幸的時間點和黨內高層的誤判，最終使得複雜形勢很快陷入難以收拾的局面。

首先，趙紫陽希望在官方紀念胡耀邦追悼大會之後，再去制止公眾活動的想法已無法實現，因為學生們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經組織起來。趙然後去朝鮮訪問，失去了七個關鍵的日子，事後證明他回來以後就再也無法控制局面了。

其次，鄧小平與陳雲等其他有影響力的元老們之間的分歧在黨內形成了派系。1989年抗議活動的起源在於兩年前非法逼迫胡耀邦下臺。當胡耀邦的死亡哀悼變成自發示威時，黨的回應是猶豫不決，部分原因是鄧小平本人曾支持平反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這個發生在十三年前的事件與「六四」事件很相似，也是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一位逝世的中共領導人（當年是周恩來總理），悼念隨即轉化為一場自發的和平示威，最後遭到鎮壓。但鄧小平推翻了這個鎮壓的決定。

悼念共產黨自己的領導人而遭到共產黨的暴力鎮壓是極為荒謬的。而鄧小平隱瞞他在中共領導結構中「垂簾聽政」的角色則更為荒謬。當時鄧小平的真實想法以及黨內存在的派系鴻溝，甚至絕大多數黨員都不知道。



第三，由於不明原因，在支持趙紫陽十年之後，鄧在 1989 年春天做出了罷黜趙紫陽起用江澤民的倉促決定。然而，鄧小平還先要處理一個當時他自己關注的重大問題，即經過 30 年的分裂後與蘇聯共產黨的關係正常化。在 5 月 16 日接見戈爾巴喬夫這一重要事件之前，他無法替換總書記。在這個拖延期間，看不到到來自黨和政府的明確回應，學生運動再次大規模升級。

結論

本書中提供的文件是中共領導層關於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最後記錄。首先，這是中共內部會議的文件，是黨在分裂之後，「統一思想」的過程中形成的文件。

這個「統一思想」的過程與 1987 年初胡耀邦下臺時的黨內「生活會」具有同樣的性質。但在 1989 年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這種差異告訴我們什麼？黨的最高領袖的決定顯然早已經做出，還有什麼必要召開這個大會並產生這樣的文件？

在胡耀邦下臺的一案中，至少在那些同情胡耀邦的人中間，黨內「生活會」被視為逼迫胡耀邦下臺「非法性」的證據，為 1989 年的爆發抗議活動埋下了種子。鄧小平在 1989 年撤銷趙紫陽總書記職務時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因此，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召開，目的是要合法化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鎮壓，以及合法化對趙紫陽總書記職位的罷免。

這兩次會議，1987 年的黨內「生活會」和 1989 年的四中全會，對共產黨都是必須的，共產黨以此尋求高層黨員幹部的忠誠保證，並在最高層出現分歧後用灌輸的方式「統一思想」鞏固權力。

必須承認，在 1989 年整個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中國共產黨內確保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掌握權力的機制始終運轉，經受了考驗。時至今日，這一斯大林主義政黨掌握權力的關鍵機制，仍然運行良好。

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正是這種機制完全無視任何事實、意識形態、一切法律或規章制度，確保獨一無二的最高領袖掌握權力。由於這個原因，這種機制的運作細節一向被認為是黨的最高機密。

這些文件不僅是黨內形成的文件中關於 1989 年「六四」事件的「最後秘密」，而且還揭示了共產黨始終掌握絕對權力的機制上的終極秘密。

吳禹論是「六四」事件親歷者以及旅美作家。

關於文件的來源考證及說明

本書的全部文件來自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舉行的兩次中共高層會議，即中共北京市委第六屆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和 6 月 23 日及 24 日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共中央第十三屆四中全會。據了解文件為中共黨內姓名不詳的某高級官員複製並保存了多年。

這套文件由 27 份文件組成，共 209 頁。編號前五號 1-5，來自北京市委會議，編號 6-28 來自四中全會。編號 15、16、25、26 以及 27 的文件不在其中。

北京市委會議文件之二的李鵬報告一開始寫道「我們這次黨的第十三屆四中全會……」可見很有可能，北京市委會議 5 個文件與中央全會前 5 份文件是同樣文件。

這些文件是通過中介人提供給本社的，沒有附加或口頭傳達任何解釋或說明。身份未知的中間人向本社的編輯提供了 USB 數字存儲裝置，在將存儲裝置上包含的所有文件複製到編輯的電腦之後，該存儲媒體即交回這位中間人。

本社以數字圖像格式（jpg）接收了這些文件並按原樣予以呈現，也就是沒有對文本進行任何選擇、刪除或更改。

在出版過程中，編輯部只對原始圖像文件進行了盡可能少的數字處理。包括調整背景色塊使其比較均衡，以及裁剪圖像大小或重新調直了頁面的邊框等等。在掃描複印過程中隨機出現的斑點也被刪除。

原始圖像文件中文字的一些缺陷沒有加以修復。一些頁面裏，左右邊文本被裁剪，編輯部沒有去填寫缺失或補充裁斷的文字，均以原樣顯示。

所獲文件中有兩頁明顯缺失：李錫銘發言的第9頁和李錫銘、陳希同發言的第8頁。這兩頁在本書排版中保持空頁。

編輯添加了本書的頁眉和頁碼以將文檔組織成書籍格式。文件每頁下部原文件的頁碼保留。文件本身為中文簡體字印刷，但是本書的其他內容則全部使用繁體字。

對文件的進一步考查以及真實性研究

仔細檢查所獲數字掃描件發現，在本出版社獲得之前，文件已有過一些數字處理。這些處理是：一、文件的編號和絕密標記被刪除。雖然從每個文檔首頁上的這些信息，已經用數字方式刪除，但因打印原始文檔的印刷紙張較薄，有時會在下一頁（背面）上隱約看到痕跡。為了保護消息來源，編輯以數字方式刪除了留下的痕跡。

據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報導，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於6月23日和24日在北京舉行。參與者包括：

- 中央委員會委員 170 名
- 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106 名
- 中央顧問委員會成員 184 名
- 有關單位負責人 29 名

對這些文件中發言或書面發言的人員的進一步審查表明，原始文件與官方公告中指明的日期以及參與者的成分組成一致。

在這些文件中，有四份文件後來官方媒體和出版社曾公開發表過，經對比與後來發布的版本基本一致。如下：

江澤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見於2006年6月正式發布的《江澤明文選》第一卷，比較顯示與本社獲得的江澤民講話文字是相同的。

鄧小平五月十六日，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九日的三次講話被列入1993年10月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雖然本書中的鄧小平講話文件與《鄧選》公佈的版本基本一致，沒有內容方面的刪除，但是可以找到少數句子和段落的重新排列，說明《鄧小平文選》出版之前對鄧小平講話重新做過文字編輯，也表明本書文檔形成的時間應該在《鄧小平文選》出版之前。

除了官方後來發布的四個文件外，李鵬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在十三屆四中全會議結束後，很快就洩露給了學生運動的支持者。這一講話最早於1989年7月16日在香港的中文《東方日報》上首先發表，並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外國廣播信息服務中心（FBIS）翻譯成英文。1989年8月在紐約，由中國記者及活動家吳牟人等人編輯印刷的《八九中國民運紀實》收錄了全文。該出版物並未公開發行，當時傳播量有限。然而，在互聯網時代到來之後，全文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由紀念「六四」的活動家上傳到網上，得以傳播。

此外，《華盛頓郵報》於1989年8月8日報道過公安部部長王芳的發言內容。《華盛頓郵報》記者Marianne Yen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政府試圖將被清洗的總書記趙紫陽與紐約金融家索羅斯以及他的中國基金會聯繫起來的文章。提到了以下內容：

... 消息人士稱，對中國基金會的指控載於公安部主任王芳的機密報告中。該報告已在中國省軍級流傳.....

值得注意觀察的是，王芳的報告中提及一個關於1990年的時間，由於對句子存在多個解釋的可能，因此必須與歷史事實進一步核對：

匈黨中央領導意見分歧，節節退讓，終于被迫決定實行多黨制，在1990年多黨參加的大選後組成聯合政府。

這一提法完全符合匈牙利共產黨於1989年2月宣布黨的領導層支持多黨制並且選舉將於1990年舉行大選的事實。

再者，這些文件中的關於會議的細節與趙紫陽本人的回憶完全一致。趙紫陽回憶《改革歷程》於2009年出版。證實這些文件的細節包括趙提到：「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由於趙紫陽關於這次會議的陳述和回憶同本書發表的這些文件高度相關，本社編輯已將其《改革歷程》中「寧願下臺也必須堅持自己的主張」一節選入本書附錄中，供讀者自己揣摩內中細節。

必須提到的是，文件編號中最後一個28號以前，缺5個編號文件，其中重要的缺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以及姚依林的發言。可以確定，本書文件並非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的全部。

根據上述考證，本社確信本書提供的文件是真實的。

Introduction

Andrew J. Nathan

Twenty days after the bloody crackdown o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Beijing on the night of June 3-4, 1989,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vened a meeting of its elite Central Committee. This meeting is known in CCP history as the Fourth Plenum of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The meeting's purpose was to unify the Party around two decisions made by senior leader Deng Xiaoping: to deploy armed troops against tens of thousands of peaceful protestors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around Beijing, and to cashier the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Zhao Ziyang. Deng had made these decisions only after the demonstrations had continued for seven weeks without resolution – sometimes flagging and sometimes intensifying as the Party leaders struggled among themselves over how to deal with them. Deng's decision to use force led to hundreds of deaths, if not more – the full death toll is not known to this day – as well as to widespread revulsion throughout Chinese society and to the imposition of sanctions by the G-7 democracies.

Now, on June 23-24, the 489 highest-ranking members of the Party gathered at the Jingxi Hotel in western Beijing, a venue reserved for high-level Party meetings, to study prepared statements from the Party's most prestigious retired elders and from some of the key senior leaders who had survived in office. These statements had been delivered at an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Politburo) a few days before, on June 19-21. (An enlarged meeting is one attended not only by the body's members but by other invited senior officials.) They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plenum participants so that they, in their turn, could endorse Deng's decisions. When the plenum ended, the documents were taken back, to preserve the secrecy of the proceedings. But one partial set of the documents distributed at that meeting has made its way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re published in this book.

Whatever an official's views during the crisis, and whatever his feelings about the crackdown, each speaker at the June 19-21 Politburo meeting had been required to affirm the correctness of Deng Xiaoping's decisions. This was done by formally expressing agreement with two documents, which were also distributed at the plenum and are included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book: Deng Xiaoping's June 9 speech of gratitude to the martial law troops, and a report prepared by Zhao Ziyang's hardline rival, Premier Li Peng, on Zhao's errors in handling the crisis. Variants of the phrase "I completely agree" or "I completely support" (*wo wanquan tongyi, yonghu, zancheng*) appear repeatedly in the documents, serving like a solemn oath to commit each speaker individually before the others to the same position. Each speaker was expected as well to add personal remarks that demonstrated the sincerity of his commitment. This ritual closed the books on the past, squeezed out any nuance of dissent, and re-united the ruling party in its domination of society.

The fallen leader Zhao Ziyang had not been scheduled to speak at the enlarged Politburo meeting, but he inserted himself anyway, demanding a chance to defend his actions during the crisis. At the end of his self-defense, Zhao was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and was kept there until his death in 2015. However, in denouncing him, all the other speakers referred to Zhao as "Comrade," because he had not been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in fact, he never was.

The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were also provided with copies of five other documents around which to unify their thinking. Two were transcripts of meetings that Deng Xiaoping had recently held with senior leaders, in which Deng emphasiz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rackdown, the necessity for China to continue on the path of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the new Party leadership avoid the kind of split that had paralyzed the leadership under Zhao. The other three were reports on the Beijing crackdown from the Party Secretary and Mayor of Beijing, respectively Chen Xitong and Li Ximing, and the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Wang Fang. These five documents are also provided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book.

We do not know how many document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Fourth Plenum participants. Besides the seven documents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is book, the book contains remarks offered by 17 people, including several officials closely involved in the crisis and some of the most senior retired officials. One retired leader, Wang Zhen, gave both oral and written remarks, generating two separate documents, for a total of 18 reflections on the Tiananmen events. The book also includes a speech given by Jiang Zemin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plenum, in which he accepted his election to the post of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to replace Zhao Ziyang.

Taken together, the documents reproduced in this book set down the Party's official view of the ten years of reform under Deng Xiaoping, the 1989 crisis, and the Party's path ahead, a view that has remained unchanged in its essence for thirty years and which guides the Party under Xi Jinping today. These inner-Party study materials provide extraordinary insight into the rules of politics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severe policy differences that divided the leadership in the 1980s, the policy dilemmas that led to the near-collapse of the system, and the problems that still confront China today. They provide a uniqu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ntality of today's Party leadership under Xi Jinping.

One after another, the speakers endorsed a common narrative.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started as a mere “disturbance” (often translated “turmoil,” *dongluan*). But when the demonstrators resisted the entry of troops into Beijing on June 2, the event had to be reclassified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 (*fan’geming baoluan*), requiring to be put down by force.

The speakers’ analysis of why a disturbance occurred in the first place, and why it evolved into a riot, revealed a profound paranoia about domestic and foreign enemies. Eighty-seven year old retired Marshall Xu Xiangqian stated:

The facts prove that the turmoil of the past month and more, which finally developed into a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 was the result of the link-up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unter-revolutionary forces, the result of the longterm flourishing of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zichanjieji ziyouhua*, a term for pro-Western, pro-democratic thinking]. This was completely planned, schemed out in advance. It was of a scale and force rarely seen. Their basic goal was a wild plan to overtur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opple the socialis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establish a bourgeois republic that would be anti-communist, anti-socialist, and in complete vassalage to the Western powers (p.213-214).

In the view of 87-year old Peng Zhen, former chair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For some time, an extremely small of people who stubbornly promoted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cooperated with foreign hostile forces to call for revising our constitution, schemed to destroy [Deng Xiaoping’s] Four Basic Principles [to uphold socialism and CCP rule] and to tear down the foundation stones of our country; they schemed to change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which is our country’s basic political system, and to promote in its place an American style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they schemed to change our People’s Republic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led by the working class and based on the worker-peasant alliance into a totally Westernized state of capitalist dictatorship (p.206).

The ideological rot had started under Zhao's predecessor, Hu Yaobang, the speakers agreed. Hu had served as Party Secretary from 1982 to 1987, when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began to introduce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lements of market pricing. Along with these reforms, China had seen an influx of pro-Western ideas among journalists, writers, academics, students, the new entrepreneurs, and even the general public. Hu had failed to stem this trend, and was therefore removed from office in 1987. The conservative leaders believed that Zhao Ziyang, in following Hu as General Secretary, should have rectified Hu's mistakes. But instead, they charged, because Zhao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ideological discipline, the Party had decisively lost control over public opinion.

The 81-year-old ex-soldier and PRC vice president Wang Zhen put it this way: "A large part of the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battlefield was controlled or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elements. Heterodoxy dominated over orthodoxy in the news media, ideological circles, and in literature and art" (p.313). The vice chair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Song Renqiong, complained, "Forty years ago, [U.S.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said the hope for the restoration [of capitalism] in China rested on the third or fourth [post-communist] generation. Now the state of political ideology among a portion of the youth is worrisome. We must not let Dulles' prediction come true" (p.238). Economic planner and Politburo member Song Ping argued that the crisis showed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Party becoming divorced from the masses is severe" (p.264).

The speakers believed that most of the "young students and masses" (*qingnian xuesheng he qunzhong*) who joined in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misguided, but not hostile to the regime. But they had been manipulated by "an extremely small number of bad people" (*yixiaocuo huairen*) (p.207). Song Ping pointed out that in September, 1988, some months before the crisis, when the government had put in place measures to control inflation, liberal

intellectuals like Yan Jiaqi, the director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had labeled these measures a “reverse course” on reform. Song claimed such agitation was part of a political plot, involving liberal intellectuals and Zhao, to undermine the power of those who stood in the way of Zhao’s nefarious “political purposes” (p.259-260).

These purposes were described in alarming terms by some speakers. Eighty-year-old former PRC president Li Xiannian argued, “The reason the affair was able to develop to such a serious point was rooted in Comrade Zhao Ziyang, in his openly and secretly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the turmoil, in his promoting the split within the Party, pointing the spearpoint at Comrade Deng Xiaoping and at the majority of people within the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in his scheme to create a situation that only he himself could resolve, and through the turmoil to achieve the goal he was aiming at” (p.189-190). Ninety-year-old Marshal Nie Rongzhen claimed that Zhao “not merely capitulated [to the attack of the bourgeoisie] but even turned against his own side, revealing his political plot and ambition” (p.218). Another marshal, 87-year-old Xu Xiangqian, stated that Zhao “wanted to become the leader of China’s ‘democratic movement’” (p.214). A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airman Wan Li, asked, “What was [Zhao’s] attitude toward Comrade Xiaoping? Did he want to be the top leader himself? Did he really support Comrade Xiaoping?” (p.248)

Besides internal enemies, the speakers saw foreign enemies pushing the crisis. According to Song Ping, “During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 United States stuck its hands in in many ways. The Voice of America spread rumors and incitement every day,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would stay in chaos” (p.261). Eighty-one year old former soldier and PRC vice president Wang Zhen expressed an obsessive fear of 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14 imperialist countries intervened militarily in the newborn Soviet regime, and Hitler attacked in 1941;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merican imperialism supported Chiang Kai-shek in the civil war, and then invaded Korea and Vietnam. Now they'd like to achieve their goal the easy way, by using "peaceful evolution." I saw some materials in January that made a great impact on me. I checked, and it was a report from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that said that U.S. foreign policy experts were pressing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a "bold, farsighted policy" to "integrate the Soviet bloc countries with the West" in order to "restore" Europe to the "situation before 1918." At that time Bush was running for president and he announced that he saw Eastern Europe as "a region of opportunity." Their approach to China is the same. In recent years foreign hostile forces have used "peaceful evolution" methods more and more: buying people with money,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subversion, sending spies, stealing intelligence, producing rumors, stimulating turmoil, supporting our internal hostile forces, everything short of direct invasion (p.301-2) .

Politburo member Li Ruihuan exclaimed, "Let's be clear, if a country like ours doesn't take the socialist road, we can only be other countries' vassal" (p.273).

In demonizing domestic critics and exaggerating the role of foreign forces, the victorious conservatives revealed their blindness to the real problems affecting their regime. These included inflation and corruption, and especially the alienation of stude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ing middle class from the Party's atavistic methods of political control.

Yet the speakers did not regard the crisis as inevitable. In explaining how they thought i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they revealed their views on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the communis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onsensus – at least among those who did not believe that Zhao had exacerbated the crisis on purpose – the situation could have been managed successfully if not for "serious errors" (*yanzhong cuowu*) committed by Zhao both before and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For two years before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broke out, Zhao had allowed the Party to become vulnerable to challenge, because he

focused exclusively on economic reform and did not attend to the importance of “party-building” (*dang de jianshe*) (158), that is, the enforcement of ideological conformity within the Party. As Wang Zhen pointed out:

The struggle against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was not carried out consistently, [Hu] Yaobang was allowed to retain a seat in the Politburo, and after he passed away [Zhao] wanted to give him a state funeral, while the liberals called for his reputation to be cleared (*pingfan*). All this became the fuse for the turmoil, and allowed class struggle to break out (p.223).

Two specific errors of Zhao during the crisis were view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When speaking to a meeting in Beijing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n May 4, and again when meeting with visiting Soviet leader Mikhail Gorbachev on May 16, Zhao made public remarks that alerted the public to the fact that the central Party leadership was split, and thereby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harden their position (p.235-6). But more generally,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criticized Zhao for what they called an undemocratic work style, meaning that he did not accept advice from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his policies.

Using conventional CCP formulas, 87 year old Peng Zhen, former chair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put the requirement this way:

In the Party, and among the people [as distinct from enemies of the people], we should and must implement complete, true, high level democracy. In discussing issues, every opinion can be voiced, whoever is correct should be obeyed, everyone is equal before the truth. It is forbidden to report only good news and not bad news, to refuse to listen to differing opinions. If a discussion does not lead to full unanimity, what to do? – the minority must follow the major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be upheld, the entire Party unified, the people unified (p.208).

What this meant in practice was illustrated in remarks by Tianjian Party secretary and Politburo member Li Ruihuan:

I remember telling Comrade [Li] Xiannian, ... Comrade Ziyang doesn't let members speak at Politburo meetings. I told [Li], truly, in the past two years, how many times was there a real discussion at Politburo meetings? Every time I came to Beijing, the meeting would last half a day, and old Jiang [Zemin] and the rest of us felt that we'd be presented with a pile of documents, we'd listen to a long speech, and this would take until after 11, and then there was nothing to discuss. At the May 10 meeting some of the comrades felt that we should discuss how to calm the turmoil, which was the most pressing and important political question, but the agenda included only China-Soviet relations. Many of us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 the meeting, and I said that the issue would surely come up at the meeting. I figured that we would discuss other things first, and when those items were finished, around 11, Comrade Ziyang would start discussing the student problem, and by the time he finished it would be time to end the meeting, so you couldn't say we had not discussed the issue, yet the meeting would have ended before people had a chance to speak. Sure enough, at 11:10 Comrade Ziyang started discussing it. He said, let me report to the comrades what happened at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on May 8, and he summarized what he said were six "opinions" that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had issued after that meeting. When he was done, Comrade Li Peng said that what Zhao had described were not things agreed to by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were his own opinions. This made me realize that even in chairing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s Comrade Ziyang was the same way. Comrade Ziyang has a hard time accepting other people's opinions, even if they are correct opinions (p.270-271).

Zhao was criticized for ignoring his critics and preferring advice from a small circle of trusted advisors. Song Ping charged:

Comrade Ziyang does not rely much o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he student movement was located chiefly in Beijing, which means th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is on the front line and its work is extremely difficult. But according to [Beijing Mayor] Comrade [Li] Ximing, after Comrade Ziyang returned from North Korea, he basically never contacted

them. He took advice only from his own familiar group of advisors. . . . As a leader, one does need one's own think tanks, but the advisors need to be carefully selected, they should be those loyal to the Party's enterprise,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real talent and knowledge, and who are able to take other opinions into consideration. . . . [We should not] lightly trust ill-considered advice to make wholesale use of Western theories put forward by people whose Marxist training is superficial, whose expertise is infirm, and who don'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guoqing*) (p.263).

In a particularly sharp attack,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Wan Li criticized Zhao for using the name of Deng Xiaoping to stifle opposition.

Last December, Comrade Ziyang convened a Party life meeting (*shenghuohui*) for the Politburo [a party life meeting is a meeting of a Party cell devoted to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rather than to practical work]. At first I thought he probably had accepted the lessons of the past and was therefore holding the meeting on a timely basis. As a party life meeting, it would of course chiefly be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bring up suggestions, opinions, and criticisms about Comrade Ziyang's work during the recent period. To my surprise, after making some opening remarks, he did not invite people to give criticisms. After Zhao spoke, Comrade Li Peng very gently brought up some important questions. Then Comrade Jiang Zemin spoke, and Comrade Tian Jiyun spoke. I was prepared to speak, Comrade [Yang] Shangkun probably also intended to speak, but time ran out and the meeting ended. . . . What I did not expect was that after Comrade Li Peng and other comrades presented their opinions, Comrade Ziyang made no statement in reply, not even to welcome their views. Not only did he not respond, but worse, he went and reported to Comrade Xiaoping what Comrade Li Peng and other comrades had said, and then called a meeting of all the people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party life meeting and bragged about how Comrade Xiaoping supported him. . . . Isn't this using Comrade Xiaoping to suppress democracy? (p.246-7)

A particular complaint came from senior retired leaders who had been appointed to an ad hoc body called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According to one member, the commission vice chair Song Renqiong, the elders frequently attempted to get Zhao's attention and were regularly ignored.

After Comrade Ziyang became General Secretary, we felt that he changed – he changed a lot. Quite a few of the advisory commission comrade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him, some of them sharply so, dissatisfied with his lack of attention to party building, his failure to emphasize work in the sphere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kind of people he was employing. We expressed our views through the normal channels, but he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and sometimes even showed impatience (p.232).

Song charged that Zhao refused to invite advisory commission members to audit Politburo meetings, as provided in Article 22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that he ignored 39 formal demarches (*songyuejian*) submitted by the advisory commission between mid-1988 and late May, of which the last three expressed the commission's views on how to handle the demonstrations (p.232-5).

The problem of Zhao's work style was summarized by Yang Shangkun, who, as Deng Xiaoping's most trusted lieutenant and representative, occupied the formal post of PRC president and had the right to sit in on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s. Yang said:

As I think back on it, after Comrade Zhao Ziyang became general secretar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never formed a core [meaning a top leader supported by a working consensus]. Comrade Zhao Ziyang was aware that some of the other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had other opinions, but he called a party life meeting only once and did not accept the opinions raised by others, nor did he do a serious self-criticism. On the contrary, he kept the other members at a distance and did things by himself, which pushed the work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into a situation where there was only a practic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not a collective leadership.

This was a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suprem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p.242).

Yang's criticism demonstrates why a Chinese leader has to concentrate dictatorial power in himself in order to govern. If he fails to do so, he is placed in the impossible position of having to solve problems decisively while also maintaining solidarity with dissenting elders and rivals who fundamentally challenge his policies. The only way to square such a circle is to purge all rivals and surround oneself with those willing to follow – the path taken in recent years by Xi Jinping.

There were several participants in the expanded Politburo meeting who were required not only to criticize Zhao, but to criticize themselves. These were Hu Qili,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ho had sided with Zhao against the decision to declare martial law, and two senior Party officials who followed Zhao's orders during the crisis in handling respectively the media (Rui Xingwen) and non-party influentials (Yan Mingfu). Because of their close affiliation with Zhao, these three made strong statements of repentance.

Hu Qili acknowledged that he had been concerned that bringing the troops into the city when there was such a huge mass demonstration would lead to disaster; that he wanted the government to acknowledge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s patriotic; and that he gone along with the majority at a meeting at Deng Xiaoping's residence on the morning of May 17 when they decided to impose martial law without really agreeing with the decision. But:

... now, by studying Comrade Xiaoping's important talk of June 9 and comparing it to my thinking at the time of the events, I deeply realize how inadequate was my comprehension of the truth.... This shows that my political level is low, that my thinking was not clear in the face of great issues of right and wrong affecting the Party's and the state's future and fate, and that I did not withstand the test. As a cadre of this Party, I must

continue to study Comrade Xiaoping's [June 9] talk, continue to raise my consciousness, and increase my level of understanding (p.277).

Rui Xingwen, who was the member of the Party Secretariat responsible for directing the media, acknowledged that he followed Zhao's orders to let the media report openly on the events, which led to a "severe loss of control over public opinion" (p.283). He claimed, however, that he was just following orders, and even pointed out that he and Hu Qili had warned Zhao early in the crisis that matters could get serious, but that Zhao ignored their advice (p.286). Rui stated that he had previously not understood well enoug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ng Xiaoping's policy to give freedom to artists and writers and the erroneous way that Zhao applied this concept by relaxing all supervision; (p.288) he now understood the need articulated by the conservative leaders to pursue the battle against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with a consistent and longterm strategy.

Yan Mingfu, director of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criticized himself for carrying messages from Zhao Ziyang to Yang Shangkun in which Zhao tried to enlist Yang to persuade Deng to soften his stance; for holding confused views about the student movement; and for taking too soft a line in his four dialogues with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Yan concluded: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this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 I deeply realize that without Comrade Xiaoping and the other revolutionarie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without Comrade Xiaoping's timely decision to take decisive measures to pacify the riot, without President Yang [Shangkun]'s and without Li Peng's and the other majority comrades on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s firm support of Comrade Xiaoping's correct judgment and decision and their firmly carrying it through to the end, our Party, our People's Republic, the socialist system that was acquired through the sacrifice of tens of millions of martyrs, would all disappear overnight. Comrade Xiaoping has once again saved our Party and our state. I surely respect Comrade Xiaoping's

instruction to coolly asses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o seriously sum up experiences, to seriously examine oneself and to reflect (p.297-8).

These heartfelt self-criticisms did not save Hu, Rui, and Yan from losing their high posts. But none of them was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and two years later each was brought back to official position, although positions much junior to those they had reached in 1989. As noted in the Editor's Notes, there is nothing in this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Qiao Shi,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who had abstained at the crucial May 17 meeting from the vote on whether to declare martial law. But Qiao, as head of the country's far-flung security apparatus, was not demoted at this meeting and continued 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97.

While swearing loyalty to Deng and placing all blame on Zhao, many in the ascendant conservative grouping revealed their deep dissatisfaction with policies that Deng had designed and Zhao had onl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ten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Li Xiannian, for example, had long been uneasy with Deng's policies and now expressed his doubts in the form of a criticism of Zhao.

[Zhao]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adjustment of major economic ratios, he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frastructure, he supported and promoted the idea that "deficits do no harm" and "inflation has advantages," leading to a loss of macroeconomic control, longterm economic overheating, and a severe loss of balance between gross supply and gross demand. He did not place his main energy on productive enterprises, especially production by large and medium enterpris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ly managed economy with excessive enthusiasm, and failed to exercise necessary management,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many large and small speculators, to bribery and corruption, to swindling and cheating, to tax cheats and evaders, to get-rich schemes. Based on the situation in Beijing, it looks like quite a few of these people were active participants and supporters of this turmoil (p.190-1).

Similarly, Song Renqiong recounted that several of the most senior Advisory Commission members had objected to Zhao's including the term "transform" (*gaizao*) in a policy document about the reform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p.234) because it signaled a deviation from what they saw as a core principle of socialism. Yet they must have known that the term reflected Deng Xiaoping's actual policy intention.

And Wang Zhen expressed his concern that the economic reforms Deng had authorized were leading China into convergence with the West. As Wang put it:

We need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at Comrade Xiaoping talked about was different in its essence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at Comrade Zhao Ziyang talked about. Comrade Xiaoping's reform and opening aimed to uphold national sovereignty, ethnic (*minzu*) respect, uphold the socialist road, uphold the combination of planned economy and market regulation, continue to protect the creative spirit of bitter struggle, and direct investment toward basic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Comrade Zhao Ziyang's reform and opening was to take the capitalist road, increase consumption, generate waste and corruption. Comrade Zhao Ziyang was definitely not the implementer of Comrade Xiaoping's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but was the distorter and destroyer of it (p.311).

Yet another complaint about Deng's policies was expressed by Peng Zhen:

In these past years, we have weakened our awareness of class struggle. In reality, the enemy forces at home and abroad who hated and wanted to destroy our socialist system have not ceased for one day their struggle against us, have not ceased for one day their activities to overthrow our state... For many years our party has not engaged in a systematic, thorough-going, all round rectification of thinking, organization, and work styles (p.199-200).

Retired Marshal Nie Rongzhen focused on the need to restore respect for the military, a policy area that was clearly Deng Xiaoping's responsibility, as it was entirely outside Zhao Ziyang's remit as General Secretar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elax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bourgeois liberal thought trends, our awareness of the need for dictatorship [that is, armed force as a guarantee of regime stability] weakened, political thought work became lax, and some comrades mistakenly thought that the military was not important and lashed out at military personnel; there were some conflicts between military units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places where they were stationed. At the same time, some of our comrades in the military were not at ease in their work and wanted to be demobilized and return home, where they thought they had better prospects. All this is extremely wrong. I think these comrades' thinking is clear now, thanks to the blood lesson we have just had, that the barrel of the gun [from which power grows] cannot be thrown down! (p.220).

The speeches distributed at the Fourth Plenum betray the poverty of solutions that the senior leaders were able to offer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For Peng Zhen, the answer was to "strengthe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 (*dangxing*) and wipe out factionalism. Factionalism destroys the party's unity, damages the basic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severely deteriorate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People who form cliques and gangs inevitably pursue their private interests, oppress others to benefit themselves, destroy the party's principles and discipline" (p.203). For Nie Rongzhen, the answer was to go back to the spirit of the 1950s: "We should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work of the 1950s, carry forward the Party's outstanding traditions, thoroughly rectify the atmosphere inside the Party, unify the masses, revitalize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promote patriotic thought..." (p.219).

Although the purpose of the enlarged Politburo meeting and the Fourth Plenum was to forge a consensus on the path forward for the post-Tiananmen leadership, the consensus was fragile from the star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had given its negative judgment on Deng Xiaoping's reforms from the side of those who wanted more dramatic reforms. The Fourth Plenum documents articulated the negative judgment from those who thought the reforms had gone too far. More progressive reform was now off the table, but the path of continued reform favored by Deng still faced opposition.

The incoming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Jiang Zemin, tried to strike a balance by fudg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eng and the conservatives. He claimed that Deng had never wanted to loosen ideological discipline:

From 1979 to 1989, Comrade Xiaoping has repeatedly insisted on the need to lay forth the education and the struggle to firmly support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oppose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But these important views of Comrade Xiaoping were not thoroughly implemented (p.254).

Jiang promised to unify the Party in the way that Zhao had been unable to do:

Comrade Xiaoping's several talks have expressed his intense expectations for our new central leadership. We know that to do our work well, we must above all fully develop intra-party democracy, rely on the collectiv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rely on the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of all Party comrades and the popular masses.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 favorable condition, which is that Comrade Deng Xiaoping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old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are still with us. We will not bother them with everyday work, but when we encounter major issues we can still ask Comrade Xiaoping's instructions and hear the views of the other old revolutionaries (p.319).

Despite these promises, 81-year-old former Politburo member Bo Yibo voiced his concern that the new leadership would continue to face opposition.

I believe that the new central leadership collective that we will elect at this meeting will definitely gain the support of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whole people. But this may not be completely achieved all at once. We will need to do a great deal of difficult and detailed work....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ust manage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must also establish a core [*hexin*, a top leader who commands the respect of the others in 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We formerly conducted self-examination over the issue of Comrade Hu Yaobang, today we have again conducted self-examination over the question of Comrade Zhao Ziyang. We cannot afford another occurrence. In my view, history will not allow us to go through this [a leadership purge] again....We must learn history's lesson, do our work well. Comrades, please ponder this deeply (p.228-9).

In fact, however, throughout his long service as General Secretary from 1989 to 2002, Jiang was never able to claim the mantle of "core." Indeed, no successor of Zhao Ziyang was able to do so until the rise of Xi Jinping.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 continued for three years, until in 1992 the aging Deng made an attention-getting "trip to the South" to force the Party to resume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his was his last political act, and it led to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and 2000s, but not to any resumption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core dilemma that faced participants in the Fourth Plenum continues to shadow Chinese policy today: the more China pursues power and prosperi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the more unwilling are stude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ing middle class to adhere to a 1950s-style ideological conformity. Thirty years after the Fourth Plenum, Xi Jinping's crackdown on both the Party and society is just as much a reaction to the liberalizing forces unleashed by Xi's own modernizing programs as the 1989 crackdown was a reaction to the liberalizing forces unleashed by the reforms of the 1980s. Nie Rongzhen was right when he worried:

Now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 has been pacified, but the thought trend of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is far from being eliminated. The battle to occupy the ideological front will remain a bitter one. We must resolve to fight a protracted battle, we must prepare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to battle for several decades! (p.218-9).

For Li Ruihuan, as for all the other leaders who prepared documents for the Fourth Plenum, the answer to all China's problems was more party discipline.

Some people have told me that in the past, those who tried to oppose the leadership and oppose socialism found it difficult to do so, but now we se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getting more and more lax by the day, political work getting weaker and weaker. [They] are really using a method of gradually lightening (*danhua*), where [party discipline] gets lighter and lighter until it disappears.... A variety of problems are emerging in society, such as corruption, bad social customs, "look to money in all things," a lack of interest in ideals, a lack of interest in moralit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but we have to recognize the bad consequences of having weakened party leadership and ignored political thought work over these past few years (p.269-70).

This was the lesson the Party leaders drew from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and it is a lesson that stuck. Today, Xi Jinping does not intend to allow any lightening of party discipline. And having made himself "core," he is backed in his determination by the rest of the leadership. Xi and his team have learned the Fourth Plenum's lessons all too well.

Andrew J. Nathan, co-editor of *The Tiananmen Papers*, is Class of 1919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chai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former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3–2006), and former chair of the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1991–1995). Professor Nathan is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He was awarded a 2013 Berlin Prize Fellowship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

How the Party Decided to Shoot Its People^[1]

Understanding the Documents from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CCP Central Committee

Wu Yulun

The documents presented in this book are the fossil records of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known as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Highlighted by the bloody crackdown on June 4th, when the Party sent in tens of thousands of troops who killed hundreds of students and civilians, the event shook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its core and altered the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ruling Party. The outcome lai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current day China.

In the 30 years since, numerous books, articles, photographs and documentaries have been published on the topic,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m focused on the dazzling public demonstrations that took place over 51 days. Many express the sense of freedom experienced by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or bore witness to the demonstrations.

However, as we look back,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eek through the iron curtain at the powerful forces behind the scenes. Only then can we hope to understand how the dreams, hopes and live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ere suddenly changed.

[1] This essay was written in English by Wu Yulun; it is not a direct translation of his essay in Chinese.

What follows is a simple narrative, based on the most credible materials to date, of the dynamics between Deng Xiaoping, Zhao Ziyang, Li Peng and Yang Shangku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1989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They were then the four most powerful men in China, wielding the full mi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t is the outcome of their interactions that ultimately lead the Party to bloodshed.

Deng Xiaoping held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but was known by all as the paramount leader.

Zhao Ziyang w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the highest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country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Li Peng,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was second to Zhao.

Yang Shangkun was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also played a critical role as Deng Xiaoping's emissary.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PSB)** was the top decision-making bo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89 before June 4th, its members were Zhao Ziyang, Li Peng, Qiao Shi, Hu Qili, and Yao Yilin.

The context: China in the 1980's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Communist Party-rul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xperienced economic stagnation. The leaders of these Leninist regimes experimented with various methods in an attempt to stop the trend of communist countries falling behind capitalist countries.

China was no exception. Mao Zedong's death in 1976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for a break from the past. China's attempt was officially called "reform and opening," backed by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and facilita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Hu Yaobang and Premier Zhao Ziyang.

“Reform and opening” was essentially the abandonment of Mao Zedong’s “continuous revolution” which had pu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t the center of every Chinese lif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tate’s relaxation of controls over people’s thoughts,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daily lives throughout the 1980’s, public hopes ran high.

The origins: Hu Yaobang’s removal

On 15 April 1989, the death by heart attack of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P Hu Yaobang caught the Party unprepared. The news of Hu’s death immediately aroused public emotions and spontaneous student protests erupted in Beijing.

Why did the public react to Hu’s death in this way?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was seething in their memories: the secret process by which Hu Yaobang had been removed from his position as General Secretary two years earlier.

The Party’s grip on people’s lives had been so loosened by the mid-1980s, that it no longer felt dangerous to initiate a student demonstration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paramount Party leader. On December 1, 1986,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ld a demonstration demanding “greater democracy.” Even some old enough to remember the “anti-rightist” purges and other political cleansings of the Mao years were emboldened.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Fang Lizhi, gave his support and guidance to the demonstrating students. “Democracy is not bestowed by the heavens; you must obtain it through your efforts,” he said.

Student demonstrations quickly spread to 28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with a large variety of slogans, from condemnatio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to demands for “press freedom.”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met with effective resistance by the Party, which mobilized school officials and local police to dissuade students from further protests. The last of this wave of student demonstrations was held on January 1, 1987, in Beijing. No violence or arrests were reported in relation to these demonstrations before they came to an end.

Yet, on January 16,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reported that an expanded meeting of the Politburo had been held, at which participants had unanimously agreed that Hu Yaobang would resign from his post as General Secretary.

But who had the power to instantaneously remove the highest ranking CCP leader from office? According to the CCP Constitution, the rule is clear: no one does. Officially, it can only be done through a full Central Committee vote. Deng himself had re-established the institutional rules that Mao had brushed aside. The respect for rules that was embodied by “ending the system of lifelong leadership” had been a crowning achievement for Deng Xiaoping.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Hu had been made the scapegoat for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nd his removal was a violation of the Party’s own rules. However, no internal complaint or public protest was ever reported, perhaps because the details of Hu’s dismissal took years to gradually leak out to the public.

Zhao Ziyang later explained the removal of his predecessor Hu Yaobang:

The reason that Deng Xiaoping abandoned Hu Yaobang was not that he was misled or that he had to compromise under outside pressure. Rather, Deng’s attitude toward Hu gradually changed until he finally lost trust in Hu.

From 1980 to 1986, Deng grew to feel that Yaobang was increasingly at odds with him concerning the liberalizing trend among intellectu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grew wider over time.^[2]

Indeed, it has since emerged that in August of 1986 at Beidaihe, the Party’s summer retreat, Deng Xiaoping told some Party elders that he had “misjudged” Hu, and made it clear that Hu would no longer be General Secretary by the 13th Party Congress, to take place in 1987.

[2] Quotations from Zhao in this essay are from 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9).

Advance knowledge of Hu's imminent "stepping down" altered the behavior of the elders towards him. Previously mild expressions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Hu burst out into open opposition and direct challenges. Hu continued on as before with his work, oblivious to the change in attitude towards him.

When the student protests broke out in December, the first action taken by Deng was to win the support of Party elders. At a gathering of seven Party elders at Deng's residence on December 27, a consensus was reached: the student protests were the result of "weakness in dealing with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and Hu Yaobang was to be held responsible.

Once Deng made his criticisms public, on December 30, there was nothing Hu Yaobang could do but wait for his inevitable purge. Deng called for another meeting at his residence with Hu Yaobang, Zhao Ziyang, Wan Li, Hu Qili, Li Peng and He Dongchang. At this meeting, Deng launched into a speech about how a party leader ought to deal with student protests. His speech, widely circulated soon after, included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The leadership of Poland was clear-minded and showed resolve. In a situation where the Polish Solidarity movement conspired with Christian churches and gained support from the West, the leaders imposed martial law across Poland. It proves (the Party) can't do without measures of dictatorial control. These measures are not just for talking about; they should be used when necessary.

Deng was referring to the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crackdown on the Solidarity movement. Martial law was imposed in Poland from December 1981 to July 1983. However,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was completely unavailable to the Chinese public in 1987. When this speech was later included i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published in 1993, the reference to the Polish communists was deleted, perhaps because the 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had ceased to exist in 1989.

It was a surprise to Hu's successor Zhao Ziyang when he was called again to Deng's residence on January 4, 1987:^[3]

After everyone had arrived, Deng pulled out a letter to show us. It was Yaobang's letter of resignation, addressed to Deng.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letter was that he [Hu Yaobang] had not been cautious enough in his leadership, that he had done a lot of foolish things concern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But mainly he said that he had been weak in upholding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and the Anti-Liberalization Campaign, had been ambivalent in his attitude, and had therefore caused a flood of liberalization and become a protective shield for some villains. Since the mistakes he made were grave, he was asking permission to step down in order to review his thoughts and give a proper accounting to the Party.

After everyone in the meeting had read the letter, Deng said that the resignation should be accepted. Nobody expressed disagreement.

The meeting at Deng's residence on January 4 marked the official end of Hu's term as the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A "five-person group" was appointed by Deng to replace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in running the Party's daily affairs until the 13th Party Congress, nine months away. Deng then announced that two things were to happen consecutively. First, a "Party life meeting" (*dangnei shenghuo hui*) would be held in the name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The purpose, according to Deng, was to "criticize and help" Hu Yaobang. Afterwards, Hu Yaobang's resignation would be formally accepted in an expanded Politburo meeting instead of a full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

Such an arrangement clearly violated the Party's own rules. Nonetheless, Chen Yun pronounced it legal and no objections were made, including by Zhao Ziyang, as he himself admitted later in his memoir.

[3] Other participants include Chen Yun, Wan Li, Yang Shangkun, Bo Yibo, Wang Zhen, and Peng Zhen.

Chen Yun was more active than the others at this meeting. He seemed very attentive to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and proper procedure. He was afraid there would be comment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bout the acceptance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resignation at a Politburo meeting, so he made it a point to announce that it was legal and in line with proper procedures.

Deng himself never took such matters seriously. Of course, the way Yaobang's case was handled, especially the criticism of him in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s Party life meeting, did trigger som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that the change of leadership had involved illegitimate means.

The details of how Deng obtained Hu's resignation letter is unknown. It is believed that Deng sent emissaries to meet with Hu face-to-face. As journalist Yang Jisheng noted in his book *Political Struggles during China's Age of Reform*^[4]:

Deng Xiaoping had designated Bo Yibo, Yang Shangkun, Zhao Ziyang, Hu Qili and Wan Li (some claim also Song Renqiong) to have talks with Hu Yaobang. We don't know what instructions those emissaries carried with them or what they spoke about. However, we can surmise that Hu's resignation and his self-criticism are the result of these talks.

Zhao Ziyang's memoir confirms Yang's speculation. He himself was one of Deng's emissaries, sent on January 9.

The night before the Party life meeting, I went to Yaobang's home to tell him how the meeting would be conducted. I also told him how the discussion went at Deng's house and that his membership in the Politburo would be retained.

Zhao's mission was apparently to inform and prepare Hu for his criticism at the "Party life meeting," and therefore to manage his response.

[4] 楊繼繩 Yang Jisheng,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Political Struggles During China's Age of Reform*)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Hong Kong, 2004.

I also said, “After your resignation is made public,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people will make trouble in the name of supporting you.” I truly anticipated that such things could happen, so I wanted him to be aware of this and be prepared for it. He replied that he would resolutely stand by the Party.

The first task of the “five-person group” was to organize the “Party life meeting”, which started on January 10 and took place over five morning sessions plus one all-day session.

According to the Party’s “tradition throughout time” (a term used by Zhao Ziyang), each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Party life meeting should voice standard criticisms against Hu, such as that he had failed to carry out Deng Xiaoping’s directives faithfully or was weak in dealing with 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But opponents of Hu used their speeches to vent their anger and advance their agendas. Deng Liqun’s speech, for example, went on for five hours. Some others, particularly people who were known to have been close to Hu, also took more time, but in their cases, it was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fallen leader.

Yaobang and Yu Qiuli had been very close in those years... Yu Qiuli unexpectedly delivered a harsh speech against Yaobang. He had collected Yaobang’s remarks on whether Deng and Party elders would retire, and asked Yaobang in an accusatory tone, “What was your motive? Why did you say that?” Yu Qiuli thus revealed himself to be a man who ordinarily appeared to be honest, but at the critical moment engaged in backstabbing to protect himself. It was a singular exposure of his true nature.

Finally, Hu delivered a self-criticism in the meeting, admitting to serious political mistakes. Upon finishing, he wept aloud, tears streaming down his face.

“Hu made a self-criticism against his will,” Yang Jisheng wrote. Hu’s motive was “to look after the long term interests of the Party and to protect [from being purged] a whole bunch of cadres [who were loyal to him].”

Many people in China apparently shared Yang's view. These were the memories, still fresh, that fed into the sentiments expressed by people when they received the news of Hu Yaobang's death.

The 1989 demonstrations

“He who shouldn't have died, died; he who should have died, lives.”

On April 15, 1989, this catchphrase spread along with the news of Hu's death. Most people didn't know that these lines originated from the poet Bing Xin, and even fewer people knew it was first carried by the official *China News Service*.

Never mind that in the eulogy to Hu penned by the 89-year-old poet, those lines were followed by “I am the one who should have died.” The public's imagination was captured by the first two lines, and it spread like wild fire, with most people understanding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hrase to refer to the elderly Deng Xiaoping. This catchphrase would turn out to be the most widely used slogan of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Hu Yaobang was a much-loved liberal General Secretary, who had rehabilitated almost all the Party officials purged during the Mao years and had done much to push forward reforms. Upon his death, mourners spontaneously turned out to pile flowers at the foot of the People's Monument in the middle of Tiananmen Square. Meanwhile, on April 16, the Beijing-controlled Hong Kong newspaper *Wen Wei Po* reported that Hu's family had requested the Party to “give a conclusion” – meaning acknowledge its mistake – regarding Hu's 1987 resignation. A few intellectuals in the mainland echoed the request. The idea soon sprea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at there was a political edge to the mood of the mourners in Beijing on April 17 was no secret. The Beijing correspondent of *The New York Times* noticed it:

“Xiaoping” in spoken Chinese can mean “small bottle” - although the written character for “ping” in Mr. Deng’s name is not the one used for “bottle” - and people seized on the symbolism a decade ago, when Mr. Deng was struggling to power and embodied the nation’s hope for non-revolutionary prosperity. At that time, ordinary people registered their support for Mr. Deng by leaving small bottles in conspicuous places. These days, some people are expressing their feelings by smashing small bottles.

A decade ago, it was more talk than action, and these days, too, more people speak of breaking bottles than actually smash them. “What’s the point?” explained a young man in Beijing. “If you smash it in public, you might get arrested, and if you smash it at home, you just have to sweep it up.”^[5]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18,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met to discuss the students’ expressions of mourning. Since Hu was a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Party and remaine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it seemed unreasonable to put a brake on public commemorations. They expected things would return to normal after the official memorial service.

Premier Li Peng, however, was most uneasy about the student activities, and consulted with elder Yang Shangkun. Yang’s advice to Li was to tolerate the student activities, at least until official memorial services were over.

The first sign that the spontaneous mourning had turned into public demonstrations happened that night, April 18. Students gathered in front of Xinhua Gate, a symbolic gate to Zhongnanhai, the compound containing the central headquarters of the CCP, with a hastily written note containing seven demands. These were a re-evaluation of Hu Yaobang, re-assessment of the anti-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campaign, publication of the incomes of high party

[5] Nicholas D. Kristof, “Privately, More and More Chinese Say It’s Past Time for Deng to Go”,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89, <https://www.nytimes.com/1989/04/17/world/privately-more-and-more-chinese-say-it-s-past-time-for-deng-to-go.html>.

officials, increased salaries for teachers throughout the education system, press freedom, and removal of restrictions on public protests. The demands were publicly reported by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Similar demands were made by demonstrators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On the night of April 19, Li Peng phoned Zhao Ziyang to ask why measures had not been taken to disperse the students gathering outside Xinhua Gate. It was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ensions among PSB members. Zhao passed Li's complaint to Qiao Shi,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security apparatus. At around 3 a.m., police action was taken: students were put on buses, and the area in front of Xinhua Gate was cleared. Some manhandling by the police quickly had student demonstrators calling the event "the 4-20 tragedy," but the label was just as quickly forgotten as a string of more dramatic events followed. It is not known if the police action taken at 3 a.m. on April 20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hone calls between PSB members.

The official memorial service for Hu Yaobang was to be held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22, 1989. During the preceding night, tens of thousands of college students gathered o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Tiananmen Square, outside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where services were to be held. Anticipating action by security forces, the students found the wait to be excruciating. That night, they established a new organization, the Beijing Students' Autonomous Federation, with participants from over 30 Beijing universities. The "Autonomous" in their name ma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ir organization and the official student unions controlled by the Party. Demands similar to the seven points that had surfaced two days earlier were adopted by the new group and announced via loudspeaker to the gathered students.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had joined in by issuing a letter to the CCP in support of the students, signed on April 21 by 47 well known social scientists and literary figures, including Bei Dao, Dai Qing, and Yan Jiaqi.

The CCP had not been standing idly by while the students were organizing and a full-scale spontaneous social movement was taking form. Yang Shangkun,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rdered 1500 soldiers from two infantry divisions of the 38th Corps to Beijing from Baoding, 150 km southwest of the capital. They were able to slip quietly into position at key CCP leadership installations in central Beijing before midnight. It is unknown whether Zhao Ziyang was ever made aware of this troop movement, though he was First Vice Chairman of the CMC.

The next morning, as the official memorial service was coming to a close, thre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were allowed through a wall of soldiers to approach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They demanded to meet with Premier Li Peng, the move invoking memories of when Premier Zhou Enlai first met Red Guards face-to-fa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ir demand was not met, even after 40 minutes of kneeling respectfully on the steps of the Great Hall, strong emotions stirred among the students sitting on the squa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nes of armed police.

Up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official memorial service, Zhao Ziyang set up a three-point action plan to deal with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1. Restore “normality” by persuading students to stop their demonstrations and return to classes; 2. Reduce tension by opening channels of dialogue at multiple levels with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and 3. Punish acts of violence, looting or burning according to the law, while avoiding bloodshed. Deng Xiaoping agreed to the action plan when Zhao met with him personally on April 19. Zhao and Deng also discussed Zhao’s forthcoming trip to North Korea for a previously scheduled state visit.

On April 23, Zhao left Beijing for North Korea, his first foreign trip as General Secretary. This seven-day trip would cost Zhao the crucial opportunity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and consequently his entire political career. So, why did he go?

According to Zhao, there had been no sign that anyone in the leadership disagreed with his three-point action plan, which had been approved by the PSC. Demonstrations in the city of Xi'an on April 22 had resulted in some overturned cars and torched buildings, but 4000 infantry soldiers had been sent to Xi'an and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under control by April 23. As Premier, Li Peng would act in place of Zhao during Zhao's absence.

Li Peng was at the train station to send Zhao off at around 4:20 pm, at which time Zhao re-iterated his three-point action plan. Li, now left in charge, was uncomfortable with the burden. In Li Peng's journal entry on April 23, he wrote:

After the briefing session, I discussed matters with Comrade Qiao Shi. We should publish an editorial in the *People's Daily* based on the three points Zhao had directed us to follow before leaving, and we should also send a telegram to local authorities to set the three points as guidelines for dealing with student demonstrations. We should also emphasize that all levels of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should do a good job to persuade the students,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resolutely stop acts of violence and looting.

At 4:20 p.m., I went to the Beijing Railway Station to bid farewell to Zhao Ziyang. He did not seem enthusiastic about my being there. He said, "Aren't we supposed to reduce formalities? You shouldn't have come." I said that it was worth it, "There are rumors about a rift existing between central leaders. Today, I am here to demonstrate our unity." He was not convinced and didn't say anything in reply.

The situation is in constant flux. When Ziyang leaves, this burden falls on my shoulders.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orkers stopped working, peasants stopped farming, students stopped attending classes, and the whole of society was in chaos for ten years. The people suffered a lot and so did the country; such a tragedy must not be repeated. But facing the current chaos, I fear I don't have any solutions either. At this time, Comrade [Yang] Shangkun

suggested that I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 Comrade Xiaoping and that he accompany me.

At 12 o'clock at night, Comrade Li Ximing [Mayor of Beijing] brought in the draft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s statement to clarify the rumor that "the Premier refused to accept a petition from the students."

.....

It is past midnight. I have been quietly pondering and can't help but wonder about two puzzling questions. The first question is, since Zhao Ziyang said that he respected Comrade Deng Xiaoping and that Deng's instructions were always to be implemented without compromise, why did he do the opposite this time?...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y did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petition to me, instead of Zhao Ziyang?^[6]

The diary entry makes clear that even though Li felt uneasy about being left with the burden, before midnight, he had intended to faithfully execute Zhao's three-point action plan. After midnight, however, something seems to have made Li realize that Deng was not supportive of Zhao's plan. At this point, he also grows suspicious that the students had intentionally singled him out.

The next evening, Li Peng's attitude completely changed when he chaired a "PSC brief meeting" (*pengtouhui*). The term *pengtouhui*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informality, yet it was this meeting that decided the fate of the entir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At the meeting were not only the four PSC members remaining in Beijing, but Yang Shangkun, Wan Li, Rui Xingwen, Yan Mingfu, Wen Jiabao, other Politburo members such as Tian Jiyun, Li Ximing, Song Ping, Ding Guangen, and heads of other "relevant departments." Indeed, the list of participants gives it the appearance of a Party mobilization meeting, as it includes heads of education, propaganda and Beijing municipality.

[6] Quotations in this essay from Li Peng's diary are the author's translations of entries from Li's unpublished 《李鹏「六四」日记》 (*Li Peng's June Fourth Diary*), widely available online; unless otherwise noted.

Li's diary entry of April 24 reads:

During the discussion, everyone agreed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was serious. Demonstrations have spread from Beijing to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In fact, certain people are manipulating and inciting trouble. It is an organized and premeditated political struggle aimed at defea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op it. The policy is to first stabilize Beijing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country. ... I proposed three action items to convey the spirit of today's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1. The *People's Daily* would issue a strong editorial; 2.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would jointly send out a notice to all provinces an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3. A meeting would be held to mobilize party,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cadres in Beijing. After the discussion, everyone agreed that a weighty editorial should be sent out first. We also appointed a leading group of three comrades, Qiao Shi, Hu Qili and Li Tieying, to take the front lines in dealing with the demonstrations. It was already 11:30 in the evening when the meeting adjourned.

Li Peng's sudden newfound confidence to make such a determination is perplexing. Professor Wu Guoguang,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points this out in his analysis of Li Peng's diary:

However, there is an important mystery to be solved here. At 4 p.m. on April 23, Zhao Ziyang left Beijing for North Korea. At 8 p.m. on April 24, Li Peng called for a meeting of the PSC to confirm that the current student demonstration was "an organized and premeditated political struggle aimed at defea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op it."

According to Li Peng's narrative, it was "a key meeting" and the people attending it reached "a unanimous consensus." ... That is to say that before Li visited Deng Xiaop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25th, and without waiting for Deng's opinion, Li Peng not only stated his harsh stance towards the demonstrations, but also managed to get the PSC to

collectively and unanimously adopt his view and implement a course for rapid mobilization of a tough response to the demonstrators.

What's puzzling is why Li Peng did not wai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to hear what Deng had to say. On what basis did Li Peng feel assured that Deng Xiaoping would accept this new direction? What power did Li Peng have, that he could change the PSC overnight, from half^[7] of its members agreeing to Zhao Ziyang's stance, to all of the members [except the absent Zhao] accepting Li's point of view, and quickly agreeing to take action based on Li Peng's view?

With these questions in mind, a careful reading of Li Peng's diary reveals an important clue: Li Peng records that at 8:30 p.m. on April 23, Yang Shangkun "encouraged" Li Peng to meet Deng Xiaoping, promising to accompany him there. But did they go to see Deng that very day, or did they wait until the morning of April 25? Li Peng does not say.^[8]

Wu's analysis implies that Li Peng was acting on Deng's orders, which may have been conveyed to him directly by Deng or through Yang Shangkun. In any case,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Li Peng knew before going into the April 24 PSC meeting that Zhao Ziyang's three-point action plan was to be overturn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had been prepared to follow it as recently as the previous night. According to the scholar Wu Wei:

As Li Peng was preparing to chair the key PSC meeting on April 24, Li Peng gave explicit instructions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Office not to inform the PSC political secretary, Bao Tong, who according to the rul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all PSC meetings.^[9]

[7] Zhao Ziyang had the backing of Hu Qili and Qiao Shi, while Li Peng and Yao Yilin were always in opposition to him, though they had all agreed to accept Zhao's 3-point action plan before this point.

[8] 吳國光 Wu Guoguang, 〈政治權力、憲章制度與歷史悲劇：《李鵬「六四」日記》初讀〉 "Political Power,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Historic Tragedy: Reading *Li Peng's June Fourth Diary*" Prepared as a Foreword to *Li Peng's June Fourth Diary* for New Century Press, 2010, but never published.

[9] 吳偉 Wu Wei, 《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 *On Stage and Backstage –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1980s*, New Century Press, 2013.

Bao Tong, Zhao's chief secretary from 1980 to 1986, was seen by PSC members to be Zhao's trusted man. The intentional exclusion of Bao suggests that Li's move against Zhao was solidified before the meeting took place.

What happened next was very public and appeared to be in line with the rules of the CCP, which at that time called for Deng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s on any difficult questions facing the Party. Li Peng and other PSC members reported their decision to Deng Xiaoping at his residence the morning following their meeting, at 10 a.m. on April 25. Deng immediately gave his blessing and launched into a speech. Deng's exact words were recorded by shorthand in the note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by 3 p.m. had been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internally to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t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crucial *People's Daily* editorial of April 26.

Despite Deng's attempt to disguise his role in overturning the decision to handle the demonstrations peacefully that he had agreed to on April 19 at his meeting with Zhao, everyone could see that it was Deng's orders that were ultimately followed. An historic analogy quickly spread to describe his role: *Chuilian tingzheng*, a term that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sitting hidden behind drapes while dictating matters of state to the Emperor Guangxu in the late Qing court.

On April 26, *People's Daily* carried the editorial branding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s "turmoil." Putting a stop to the turmoil was "a serious political struggle for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To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still harboring living memories of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rong words could only mean one thing: the mighty power of the Party would come crushing down, those involved in the demonstrations (which by now had spread to over 300 cities around China) would face dire consequences, and millions of lives would be affected.

The editorial left no room for public illusions about the judgment, making clear it came from no other than Deng Xiaoping, the paramount leader. The

Party's internal but widely circulated document of Deng's remarks at the April 25 morning meeting, issued at 3 p.m. that same afternoon, was leaked to the Hong Kong newspaper *Mingpao*, which reported on its contents.

For officials around the country, the message was clear. Shanghai Party Committee Secretary Jiang Zemin was quick to act, seizing control of the liberal Shanghai newspaper *Shijie jingji daobao* (*World Economic Herald*) and accusing its editors of having gone "too far" in showing sympathy to Hu Yaobang. Jiang's quick response proved to be the masterstroke of his political career, as he would soon be rewarded with the seat of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in place of Zhao.

Yet, facing the serious threat, not everyone responded as the Party expected. Throughout the Mao Era, every one of Mao's wishes instantly materialized as close to his intentions as people could muster. But this was 1989, and demonstrators instead became instantly energized, responding with the largest protest yet. On April 27, tens of thousands students marched towards Tiananmen Square, while another half a million supporters joined in. After breaking through police barriers on their way to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ors and observers alike cheered triumphantly.

This was an unprecedented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mmunist Party's reign, people willfully took action against the wishes of the paramount leader. If this action had been sustained, it would have meant a major shift in China's political equilibrium, lik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Even Deng Xiaoping appeared uncertain how to respond. In Zhao Ziyang's recollections:

Li Peng's decision to disseminate Deng Xiaoping's remarks on April 25 and 26 throughout Beijing and down to local administrative levels resulted in many criticisms of Deng. This really upset Deng and his family. Deng's family accused Li Peng of having abruptly pushed Deng to the front lines while he himself played the good guy. ...

Furthermore, because of the wide dissemination of Deng Xiaoping's remarks, Deng felt that his image among young people had been damaged. Deng Rong [Deng's daughter] told me through Bao Tong that references to Deng loving and protecting youths must be added to the speech [that Zhao was preparing for the May Fourth celebration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I did indeed decide to add to the speech one paragraph dedicated to how much Deng loved and protected youths.

With no further instructions coming from Deng Xiaoping, Li Peng was in a state of panic. First he moved, on the 27th, into Residence 202 in Zhongnanhai, for greater security. One action plan that Li came up with himself was to have the government organize a counter demonstration, in anticipation of more student protests on May Fourth Youth Day. A counter demonstration was attempted, but it was a flop and quickly forgotten, except as a joke.

But it was no joke to Li. The stakes were high for him; his entire political career was on the line. Zhao remembers:

[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Yan Mingfu reported to me that Li Peng had told him that if, upon my return, I did not support the April 26 editorial, Li would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sign.

But when he returned from North Korea on April 30, Zhao Ziyang did not rush to support Li and the April 26 editorial. Zhao had his reasons:

If no measures were taken to ease the tensions caused by the April 26 editorial, students would continue to fear that they were being threatened with retaliation, and tensions would continue unabated.

I also felt that if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could be resolved along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law, through dialogue and an easing of tensions, it could possibly boost China's reform, including political reform.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were to suppress the demonstrations with violence, another Anti-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Campaign would be sure to follow, on an even larger scale than before. Conservatives would make a comeback and reform programs would come to a standstill or even be reversed. Chinese history would go through another period of zigzagging.

Zhao knew that without Deng Xiaoping's support, it didn't matter what strategy he had planned; so on May 1, Zhao called Deng's residence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him and gain his support. Unfortunately, Deng's secretary told him, Deng was not feeling well and was resting with hopes of recovering in time for the visit of Soviet leader Gorbachev on May 16.

For Zhao, troubling signs started to appear. On May 2, Hong Kong newspaper *Mingpao* reported rumors that the official accusations of a "black hand" behind the demonstrations was referring to Zhao Ziyang, and that he would be made to step down. On May 3, Zhao tried again to reach Deng Xiaoping, this time through Yang Shangkun, but Yang politely declined, saying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dissuade Deng.

What Deng was thinking and doing on May 1 remains a mystery. From April 26 to May 10, Deng's whereabouts were unknown to the public. This period included a state visit by Iranian President Ali Khamenei. On May 9, Khamenei became so irate over the fact that Deng Xiaoping had yet to meet with him, he suddenly cancelled all his meetings, leaving Li Peng waiting for two hours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Sino-Iranian relations were in jeopardy until Deng finally reappeared to meet with Ali Khamenei on May 11.

In the absence of an order from the paramount leader, Zhao Ziyang and Li Peng struggled within the PSC over a strategy to persuade the protestors to end the demonstrations. Since they could not agree on a direction, neither was successful.

Zhao attempted to cool down the demonstrators when he delivered a speech on May 4th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In the speech, he recognized the students' motives as patriotic and acknowledg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Party's reform. The speech was a significant toning down of the threatening posture taken in the April 26 editorial, but it was not enough for the students, who had already tasted freedom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demonstrations continued.

Li Peng felt extreme pressure over the issue of the April 26 editorial. If the Party backed down from the editorial's hardline position, his career would be over. Since this sticking point had him in opposition to the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he knew that only one of them would survive. Li Peng lost weight, from 75 to 70.5 kilo,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demonstrations to the night of May 8, when he weighed himself at a swimming pool.^[10]

In the meanwhile,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was effectively turning into the Hyde Park of China. Tens of thousands people gathered each day to enjoy free expression, though protestors were anxious, too. What was the end game? How long would they have to wait to see results? They were in utter darkness as to the answers.

Li Peng heaved his first sigh of relief on May 11, when Deng Xiaoping resurfaced. Li's diary entry that day records:

Wang Ruilin, secretary to comrade Deng Xiaoping, phoned me this morning to convey a message from comrade Xiaoping: Without the message of the April 26 editorial, there could be no easing of the situation; Li Peng should firmly resist the pressure from outside and from within.

The protestors faced their own problems, with their own and the general public's fatigue over the prolonged standoff. A new strategy emerged on May 13 when several hundred student protestors launched a hunger strike, hoping to force the Party to concede to their demands. The emotional sight of young people willing to die for their country won overwhelming public support.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joined the demonstrations, carrying banners of open support from all corners of society.

Once more, the stakes had been raised for the Party. Yet Deng Xiaoping was not going to budge. That same day, Zhao Ziyang finally got to meet with Deng Xiaoping, accompanied by Yang Shangkun. Zhao proposed dialogues,

[10] 《李鵬「六四」日記》(Li Peng's June Fourth Diary)

an NPC meeting and increase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to ease the protests. Zhao did not reveal Deng's reply, but Li Peng wrote about it in his journal:

Comrade Xiaoping said to Zhao: "We've always spoken about corruption, but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serious to counter it. As to improving 'transparency', this needs to be studied. Don't be fooled by others. Illegal student organizations cannot be recognized. I feel very tired now, my mind is not clear anymore; my ears are ringing, and I can't hear what you're saying."

At this point, Zhao must have realized that his political career was at a low point. Not only was Deng Xiaoping not supporting him, Deng was actively opposing him. Without Deng's support, Zhao could not get the Party apparatus on his side. Things continued to worsen as Zhao faced an important matter of state: meeting Gorbachev at the Sino-Soviet summit, the first visit to China by a Soviet head of state since Khrushchev's visit in 1959.

On May 16,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Gorbachev, Zhao stated that Deng was still the paramount leader in China, despite his official retirement at the 13th Party Congress in 1987. Zhao later said that his intention was to highlight the meeting between Deng and Gorbachev as the official symbol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mmunist parties. To his surprise, the public interpreted his words differently: that Deng wa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deciding about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Zhao was outing Deng fueled speculation that the Party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energizing demonstrations to a new high.

On May 17, Gorbachev left Beijing for Shanghai. Deng called for an expanded PSC meeting at his residence to finally put an end to the demonstrations. The imposition of martial law was decided upon, Zhao Ziyang was brushed aside, and Li Peng took charge to implement martial law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military under Yang Shangkun. Mobilization of the army and the Party was broadcast live on May 19, with Zhao refusing to take part.

By then, Deng Xiaoping had already announced to party elders and the PSC that Jiang Zemin would be taking over as General Secretary. The rift between Deng and Zhao was official. Li Peng's journal quotes Deng Xiaoping on May 19:

“This turmoil is a problem that exists within the party. There were two centers of command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Nominally, it appeared to be a split between Li Peng and Zhao Ziyang, but in fact it was between me [Deng Xiaoping] and Zhao Ziyang.”

As martial law was being implemented on May 20, in another surprise for party leaders, tens of thousands of unarmed Beijing residents and demonstrators came out to intercept the troops. They lay down or stood in front of military vehicles, or climbed aboard to talk to the young soldiers, some even offering food and drink.

However, despite the appearance of having been frustrated,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was fully functional. Yang Shangkun had ordered the army to “stand down” for three days while he mobilized more troops to Beijing.

Though almost all CCP leaders sided with Deng Xiaoping, a pledge of loyalty was called for. By May 21, leaders from 22 provinces had sent in their pledges. Various PSC members engaged in private talks with key individuals to secure a record of their support.

According to Li Peng, the CMC approved the plan by the Beijing Military District for troops to enter the city clandestinely.

By 3 a.m. on June 2, there were already 25,000 troops surrounding Tiananmen Square: on the west side inside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on the east side, inside the courtyard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n the north side, behind Tiananmen Gate, and on the south side, 3000 troops were in the Beijing Train Station.

As weapons were transported into the city by troops, some were intercepted and exposed, then displayed to the public. Clashes began on June 3,

as attempts were made to recover the intercepted weapons. *Dongluan* (turmoil) was thus replaced with *baoluan* (riots) in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justifying the use of violence.

On the evening of June 3 and into the early hours of June 4, tanks, armored vehicles and infantry moved into the city, approaching Tiananmen Square from all directions. With nearly a million protestors and supporters still milling around in the streets, the troops opened fire, killing hundreds, perhaps thousands, of unarmed civilians. The full death toll remains unknown to this day.

Known thereafter as the June Fourth (or in English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event would divide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a “before” and “after.” Unli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tained its grip on power, but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of China changed forever.

Questions remain about why Deng Xiaoping abandoned General Secretary Zhao Ziyang, after supporting him throughout a decade of reform. Did something happen before May 11, the day Deng reappeared and asked Li Peng to “resist pressure from within”? Or could it be that something had happened even earlier, by May 1, when Deng refused to meet with Zhao upon Zhao’s return from North Korea?

Jiang Zemin was evidently chosen in haste to be Zhao’s successor as General Secretary. Having see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ushed disposal of Hu, Jiang was naturally concerned that his own transition to power be carried out through a legitimate process. According to Li Peng:

Comrade Jiang Zemin told me repeatedly that he absolutely would not accept the process by which Hu Yaobang was replaced with Zhao Ziyang in early 1987. The way the General Secretary was dismissed and replaced at that time did not follow the rules of the Party, as it should have gotten the approva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With Deng Xiaoping's exact role still unclear, Li Peng has been burdened with the title "Butcher of Beijing." But in his journal, Li presents himself as a loyal Party leader who was simply following the orders of Deng Xiaoping. He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ed Deng's decision, but he apparently did not want to take credit for it.

In his diary entry of April 23, 1989, Li Peng only hints that he was in contact with Deng before the change towards a hardline stance on the demonstrations. However,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15 years later, at the centennial of Deng Xiaoping's birth, Li makes clear his view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rackdown lay with Deng:

As spring turned into summer in 1989, a serious political turmoil occurred in China. With the temperament of a great revolutionary and politician, comrade Deng Xiaoping, together with other veteran comrades, worked tirelessly and in a timely manner to support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take decisive measures and stop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ereby guaranteeing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providing the conditions indispensable to China's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gress.

In hindsight, it was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timings and miscalculations that pushed the complex situation into a downward spiral.

First, Zhao Ziyang hoped to ease the spontaneous public demonstrations after the official Hu memorial; but students got fired up and organized the night before. Zhao then lost seven critical days when he went to North Korea, returning to a situation that he was never able to bring back under his control.

Second, Deng's differences with other influential party elders such as Chen Yun had created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The origins of the 1989 protests lay in the unresolved dispute over the illegitimate deposition of Hu Yaobang two years earlier. When public mourning for Hu's death turned into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s, the Party hesitated in its response, in part because Deng Xiaoping had overturned the 1976 decision to crack down on

people mourning the death of Premier Zhou Enlai. The absurdity of a violent crackdown on people who were mourning a Party leader was exacerbated by Deng's need to conceal his role within the leadership structure. Deng's concerns and the Party's factional divide were unknown at the time to even the majority of Party members.

Third, for reasons unknown, Deng made a hasty decision to replace Zhao in the spring of 1989 after having supported Zhao for a decade. However, Deng had first to carry through with a matter that was then of momentous Party concern: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fter a 30-year split. Before this important event on May 16, he could not replace the General Secretary. During the delay, seeing no clear response from the leaders,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escalated.

Conclusion

The documents presented in this book are the last records of the CCP leadership pertaining to the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First and foremost, they are a record of the internal process by which the Party forced its divided members to accede to a total consensus.

The same process was used in the "Party life meeting" to dismiss Hu Yaobang, but it came in a different format in 1989. What does this difference in format tell us, and why were these meetings even necessary when the decision had clearly already been made?

In the case of Hu Yaobang, the "Party life meeting" came to be seen as evidence of the "illegitimacy" of Hu's removal, at least by those sympathetic to Hu. It consequently planted the seeds for the protests of 1989. Deng Xiaoping did not wan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again when removing Zhao in 1989. Therefore,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Central Committee was held to legitimize an outcome that in fact emerged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eng, Zhao, Li and Ya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1989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Both meetings, the “Party life meeting” and the Plenary Session, were also necessary to seek reassurances of loyalty from senior party cadres, and to properly indoctrinate and reconsolidate the Party after disagreements had emerged at the very top.

It must now be acknowledged that in 1989, the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worked remarkably well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t has been working well ever since.

This kind of process, usually involving purges, is the key mechanism by which a Stalinist party remains in power. Its primary purpose is to ensure that the one-and-only supreme leader remains in charge, often with total disregard for any purported ideology, existing laws or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se procedures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most top secret by the Party.

Thus, not only do these documents reveal “the last secret”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of 1989, they reveal what may well be the ultimate secret of how the Party stays in power to this day.

Wu Yulun is a Chinese-born American writer and an eye witness of the 1989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Editor's Notes on the Documents

The original documents and their source

The main body of this book is a set of documents from two high-leve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etings held in mid-June, 1989. The source is purportedly a high-ranking Party official who had access to them, and had managed to copy and preserve them down through the years.

At the top of the first page of each document is the name of the meeting and the document number. The two meetings were:

- The 6th Meeting of the 6th CCP Beijing Committee (Expanded) (BC)
-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CCP Central Committee (CC)

There are 27 documents making up a total of 209 pages. Documents 1 to 5 are from the BC meeting. Documents 6 to 28 are from the CC meeting, but are missing documents 15, 16, 25, 26, and 27. It is likely that the BC documents 1 to 5 were used in the CC meeting; in other words, that they were duplicated and used as CC documents 1 to 5.

The publisher received these documents through an intermediary with no explanations or instructions included or relayed. The intermediary presented a digital storage device to transfer the files to the publisher's computer. The device was then returned to the intermediary.

The publisher received these documents as digital image scans (in jpg format) and presents them in this book "as is," that is, without any selection, deletion, alteration or manipulation of the text.

Minimal digital work was done to the original image files; only enough to even out disparate tones and crop or realign the margins to fit the book format. Some noise int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scanning/photocopying may also have been removed.

Most of the imperfections in the original image files have not been “repaired”. Pages that show some cropping off of text to the left and right margins appeared this way in the original. No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fill in” missing or truncated characters.

There are two pages noticeably missing from the files given to the publisher: page 9 of Li Ximing’s statement and page 8 of the Li Ximing and Chen Xitong statement. They are left blank in the book layout.

Page headers and book page numbers were added to the top of each page by the publisher to organize the documents into a book format. The original page numbers of each document have been left intact at the bottom of each page, as part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 image.

We have elected to us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 for all text added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his book, for example in the titles, table of contents, headers, and introductory and appended material. The original documents themselves are in simplified Chinese, and since we have printed them in their original image form, they remain in simplified Chinese in this book.

Exam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Close examination reveals that some digital manipulation may have been done to the files after the original documents were scanned into a digital format, specifically to remove the document’s copy number and the stamp marking it “Top Secret” (絕密). They were carefully erased from the front pages of each document, but in several instances, these identifying marks could be seen bleeding through to the following page (the other side of an apparently thin piece of paper). To protect the source, the editors have digitally removed these faint markings as well, since this was clearly the source’s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CCP newspaper, *People's Dail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CCP Central Committee was held in Beijing on June 23 and 24. Participants included:

- 170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 106 alternate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 184 members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ttee
- 29 heads of relevant agencies

Further examination of the list of people whose speeches or written state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se files reveals that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fficial announcement.

Among the files, four were published at a later date in state media. The versions of these four document contained within this book are consistent with these later published versions. They are as follows:

Jiang Zeming's speech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3th CCP Central Committee can be found in the first volume of Selected Works of Jiang Zemin, officially released in June 2006. A comparison shows the text to be the same.

Deng Xiaoping's three speeches dated May 16, May 31 and June 9, and included in the BC documents, were published in October 1993, in the third volume of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While the documents included in this se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shed versions, there are some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arrangement of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 consistent with editing work and perhaps performed during preparations for publica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No content is missing.

In addition to these four files verified by later official releases, Li Peng's "Report on Mistakes of Comrade Zhao Ziyang during the Antiparty Antisocialist Turmoil" (document 2 of the BC meeting) was leaked to supporters of the demonstrations almost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close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Li Peng's report appeared in the Hong Kong publication *Oriental Daily News* on July 16, 1989,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the CIA'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In August 1989, Chinese journalist and activist Wu Moren also printed Li Peng's report in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titled: *Daily Reports on 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April 5 – June 24*. Limited copies of this were printed and privately circulated in New York. However, in the late 1990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World Wide Web, activists placed the text in its entirety online.

The statement by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Wang Fang included in these files was mentioned by *The Washington Post* on August 8, 1989. *The Post's* reporter Marianne Yen, writing about Chinese government attempts to link the purged General Secretary Zhao Ziyang to New York financier George Soros and his China Fund, mentioned the following:

Sources said the accusation against the China Fund is contained in a confidential report by Wang Fang, director of the Public Security Ministry. The report has been circulating at the provincial and army level in China.

Wang Fang's report does contain a reference to an event that occurred in 1990, a puzzling thing to find in a report delivered in 1989. Since the original Chinese leaves room for 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 an investigation was made to determine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document. The line reads as follows:

Becaus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existed amo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of the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they compromised again and again, and were finally forced to accept implementation of a multi-party system, to form [or "forming"] a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1990 after multi-party elections.

This reference is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knowledge available in June 1989. It was in February 1989 that the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nounced an endorsement of the multi-party system, including the promise that multi-party elections would be held in 1990, as they subsequently were.

Furthermore, these documents are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Zhao Ziyang's memoir *Prisoner of the State*, published in 2009. For example, in his memoir, Zhao says: "Chen Yun also did not appear, but provided a written statement containing two lines." Indeed, document 6 is the elder Chen Yun's written statement containing two short lines. Since Zhao Ziyang's recollections regarding these proceedings are pertinent, we have included that section of his memoir in the appendix of this book (in Chinese).

It must be mentioned that five files seem to be missing from the set that we received, given the sequence of document numbering. Also, noticeably absent are statements from then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Qiao Shi and Yao Yilin, further suggesting that this set is not complete.

Nonetheless, based on a careful study of the documents, it is the publisher's belief that the files presented in this book are authentic and can thus be used in a fair assessment of the CCP's internal process in concluding the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
「六四」結論文檔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inal June Fourth Documents**

中共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文件之一

邓小平同志在接见
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989年6月9日,根据记录整理)

同志们辛苦了!(热烈鼓掌)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肃立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

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李鹏同志:“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

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合格。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

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的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本身的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一个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步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

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 12 年完成，再往后 50 年，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点几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 61 年后，一个 15 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980 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

“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60至70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10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1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

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国一直实行的是关闭政策，这种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10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50年代一个学校闹事，政府派了空降部队去占领。美国在60、70年代发生了多次学潮和骚乱，他们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

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10到20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邓小平同志同

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要点

(1989年5月31日,根据记录整理)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经过这次动乱,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动乱平息之后,要作出交代。主要两条:

第一,我们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觉到这是一个改革的有希望的面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否则真正就要永无宁日。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这次事情还没完啊,总的说还没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

会上街啊。肯定的一点，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总之，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的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要反对腐败，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随便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

一个好班子，改革的班子，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

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利用开放,利用劳动力,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其它行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今天找你们来,让大家来考虑一下这个论点对不对。一条是组成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办几个实绩,要惩治腐败,要取信于民,并真正做几件事情,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深化开放。要拿事实给人民,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这是大局。

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人都有缺点,我们在座的三个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帐,各有各的弱点。当然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

毫无疑问,从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

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很长一个时间，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红军中也选了一批工人当政治委员。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个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尽管现在有些人提出打倒我。人民对我们这个集体基本上满意，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领导集体党中央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坚持，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个根本问题。

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年轻的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第四、第五代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起码你们是坚持改革开放，是在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的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派。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上的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

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人都是有缺点的,进来后还可以继续改进。

惩治腐败,要真抓几件事,用事实体现出来,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倒卖,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胡立教的儿子就判了死刑,但这样的事情以前做得少了。

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 责任不同啊! 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

襟开阔。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当前，也放眼一切方面。人是可以变化的，从大局看问题，什么恩怨不能化解？

还有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一点就是我一直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动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你们是要在第一线顶着干工作的，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一点。

等新的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不要相互不服气，自己消耗力量。如果都是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你不谅解我，我不谅解你；你不让点步，我不让点步；应该作的妥协也不作，小的不同就会变成大的冲突。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二位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邓小平同志 同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 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同志谈话要点

(1989年6月16日,根据记录整理)

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现在起要建立起一个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一个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建立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后来加了个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一个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

关键地位。从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任何一个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什么事情总要有个比较，比过来比过去，轮到他了。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我在跟李鹏、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份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下注就下在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国际上好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

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个潮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连什么中美苏大三角也没有。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这个大三角？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心安理得，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确实这次事件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

下面谈谈最近抓什么工作的问题。不能等暴乱完全平息，现在就要一面抓彻底平息暴乱，一面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我们需要急迫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现在百废待兴，要统统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

题的讨论,在这个时候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东西。

第一件事情,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过去想的那么高。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没有电和原材料。而在原材料的分配中,小企业吃了大企业,结果国家损失大。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现在不要纠缠责任问题,一切责任问题过两三年再谈。现在没必要花那么大精力干这些事情。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不能达到百分之七,百分之六也可以。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平均速度是百分之九,实现第二个翻一番,发展速度为百分之六就可以了。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份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对那些浪费电力和原材料的乡镇企业,要坚决关一批,行动要坚决,地方的同志要拿党性来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五十年的发展

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如果没有基础工业,经济发展就没有后劲,就迟早会爆发经济上的动乱,发生经济停顿甚至倒退。对于交通问题要想点办法,不解决不行。还要研究钢材、木材、塑料工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吸收外资,这也就是开放。现在发达国家有好多二手设备,我们要信息灵通,抓到机会就买,改造我们的老企业。对这些问题,我们要聚精会神地搞,要专门研究,专门打听消息,搞得快点。我曾经讲过,经过这次事件,我们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更快一点。这件坏事变成好事的可能性是有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湖南的水稻原来增长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最近有个新发现又可以增长百分之二十,证明潜力还是大的。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开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国务院来做。要做几件事情,一下子把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

多吸引外资,外资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四个坚持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但是对于专政可以少讲,或只做不讲。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惩治腐败,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

惩治腐败,要认真做几件大事,至少抓一二十件,透明度要高。最近我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搞不通,可能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这个问题过去讲过多少次,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党内,在高层。处理这个问题要减少障碍,可以搞个政策,就是在一个期限内自报、退回赃款的,可以不予起诉,从宽处理。限一个期限,给他一个机会,同时也劝说一下,也可以举报。搞一个临时的大政策。我估计这类案子不少。如果把县以上也算起来,就会更多。要认真处理几件。处理这个问题不能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

败。当然，这个口号是他们的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激动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因此，这次事件中反对腐败的口号尽管对他们是个陪衬，我们也应该接受，也应该解决。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我们要搞个政策，使这件事能进行得比较顺利，能有结果。这是一个党内问题，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

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对比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三件事，就是平息暴乱要抓到底。这是个好机会，一下子就把全国的非法组织取缔了，这实在是好事情。处理得好，就会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对于罪大恶极的不能手软。当然还是要分别是非轻重，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杀人还是要有一个限度，还是要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手段还要是多种的，以体现我们的政策。

以上我说的三件事，现在要集中做好。我再说一遍，现在所有的争论都不搞，至少两年不搞。十三大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些话不妥当不说就是了。还有一点，常委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中共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文件之二

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李 鵬

我们这次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是根据6月19日至2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召开的,主要是讨论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的错误的,并相应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这是当前为了进一步平息动乱和稳定全国局势,巩固党的领导、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党与人民的团结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现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就这个问题向全会提出报告,请同志们审议。

(一)

两个月来,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

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也是同赵紫阳同志所采取的错误立场分不开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他对悼念活动中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在首都的许多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标志着首都的动乱局面已经形成,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在西安、长沙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

发展,但他那时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这个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同这种要求相呼应,知识界长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些人,连续在《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举行的座谈会上,大肆鼓吹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赵紫阳同志从未讲过一句要反对或抵制的话,相反地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以后,他不仅不予支持,表示不闻不问,甚至责备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5月3日他在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前,尚昆、依林、锡铭等同志和我一再提出,在他的讲话中针对动乱中提出的纲领,应加上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但都遭到他的拒绝。

第二,从赵紫阳同志4月23日出访朝鲜到5月4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发表谈话,他采取两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对动乱性质的判断和制止动乱的方针,随即把他反对中央方

针的态度公开暴露于群众之中,使本来已开始趋向缓和的态势重新激化起来,使动乱朝着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

赵紫阳同志出国访问后,中央常委于4月24日晚召开碰头会,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动向的汇报。会议认为,当时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首都几十所高等院校已有6万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讲演,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联,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形势十分严峻。会议一致认为,种种事态表明,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决定由北京市委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4月25日,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4月26日,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重要社论。党中央及时将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电告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同志,他当即回电中央:“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由于中央揭露了问题的实质，制止动乱的旗帜鲜明，起到了稳定首都和全国局势的作用。动乱策划者们的嚣张气焰被迫收敛，策略与口号迅速改变。在4月27日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示威中，大量攻击、谩骂的语言骤然消失，打出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标语，并把先前“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口号一下子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口号。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相继同学生对话，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到5月4日游行时，参加人数大为减少，学生情绪大为缓和，学潮组织者当天就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国后，在5月1日举行的常委会议上仍然表示同意4月24日常委的决定，认为前一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只过了两天，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根据常委决定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下午，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行会议各国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公开把中央内部分歧暴露于世。

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在已经出现

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场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正因为这样,他这篇讲话的发表,就成了动乱急剧升级的转折点。那些搞动乱的人从中看到了中央的态度不一致,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找到了后台,于是更加有恃无恐,越闹越凶,越闹越大。

第三,从5月5日赵紫阳同志亚行讲话发表之后到5月17日中央常委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前,他顽固坚持对动乱采取退让政策,同时策动舆论扩大事态,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

由于赵紫阳同志的亚行讲话和中央制止动乱的方针截然不同,动乱策划者们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5月6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他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

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他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在这里竟把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说成是“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篇谈话向新闻界传达以后,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首都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各种攻击、谩骂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大量增加,内容更加恶毒和反动。这个时候,非法学生组织集中提出了两条要求,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社论,承认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二是,承认学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种学生自治组织。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了社会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在当时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常委于16日晚召开紧急

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承认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必然要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学生组织，进而成立其他非法组织，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要实行多党执政，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目的，不达目的，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在如此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他当时还曾提出，向学生承认社论是错误的，可以说社论稿曾发到朝鲜经他批准，由他承担责任。这是他要弄的又一个手腕，理所当然地受到常委多数同志的拒绝。这个时候退让还是不退让，根本不是什么对学潮的态度温和一点还是严厉一点的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制止动乱的问题，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整个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赵紫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关于邓小平同志领导作用的谈话，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的一开头就对戈尔巴乔夫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

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他同戈尔巴乔夫谈话发表后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游行队伍中，“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必须下台”等标语、横幅到处可见，口号声不断。在天安门广场还传出了邓小平已经辞职的谣言，一些人疯狂地放起了鞭炮。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第四，5月17日中央作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之后，他完全置大局于不顾，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采取了公开同党闹分裂的立场。

在5月17日再次召开的中央常委会议上，赵紫阳同志仍然固执己见，坚持退让，多数同志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就会被全部葬送掉。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意见。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对此，赵紫阳同志说他无法执行，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虽然撤回了辞职请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实际上却进行了完全同党相对立的分裂活动。

5月19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的学生。他告诉学生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实际上起了鼓励学生坚持绝食的作用。他还说“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

5月19日晚，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在这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各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不同意。这样，他就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5月20日国务院下达戒严令之前，几乎所有奉命前来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到了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的围堵，未能进入预定地点。大会召开前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单位中，被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是赵紫阳同志的“智囊”的一些人物，纷纷从幕后跳到幕前，四出串联，到天安门广场

和街头巷尾发表煽动性演说，炮制和散发种种传单，掀起了一股反对戒严，打倒杨尚昆、打倒李鹏的反动浪潮。他们还大肆宣传唯有赵紫阳同志是爱护学生、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和主张廉政的，进一步煽起了“还我紫阳”、“保卫紫阳”的鼓噪。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为此，四通公司研究所的一些人，四出活动，上下串连，知识界带头支持学生绝食的几个头面人物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海外制造舆论，给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请假休息的赵紫阳同志未与常委商量，在5月21日个人同意发出电报，要万里同志中止去美国的访问，提前回国。赵紫阳同志与这些人配合如此默契，值得人们深思。

种种情况说明，赵紫阳同志对党采取的分裂行动，对动乱制造者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他们制造种种困难和障碍，严重干扰和破坏戒严命令的执行，干扰和破坏中央制止动乱和稳定局势的部署，终于导致6月3日在首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我们认为，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

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他目前承担的重要工作。我们建议,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中央全会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同时建议对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作出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

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着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对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和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信念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进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在决策上也有过严重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

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到“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严重地泛滥开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竭力鼓吹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瓦解”，可以“不战而胜”，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发展，力图动摇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党内同志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决不可以有丝毫的低估。

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出现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1979年初在这股思潮刚刚冒头的时候，就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如果动摇了四项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动摇了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后，他又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但是，多年来反对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执行，不仅实际措施很少，甚至口上讲得也很少。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有些人越来越猖狂，有的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

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有的公开发表所谓《私有制宣言》。在这场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中,一批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从事政治阴谋活动的人,便成了动乱和暴乱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而长期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之所以成为在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他的错误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当他的错误尚未象后来这样明显暴露的时候,党的十三大推举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党只能在历史的实践检验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他的错误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至在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达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党的风气、社会风气继续恶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降低,党的战斗力大为削

弱。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丢掉了。这里说的教育失误，绝不是像赵紫阳同志一度解释的那样，仅仅是指党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真正解决教育所需的投资和提高教师待遇，而主要是指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严重忽视的问题。赵紫阳同志很少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措施去落实了。1987年1月在他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公然说，今后四个坚持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其他三项可以不提或少提，当时就有同志提出必须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他竟说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党不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领导难道还算得上是共产党的领导，难道还能不蜕化变质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十分痛恨，对社会分配不公愤愤不平，但他却一再说发展商品经济初期腐败现象不可避免，还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创收。这种错误的方针，使党克服腐败和加强廉政建设难以有效地进行。赵紫阳同志借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他在工作中实际上总是想淡化党的作用，不很好依靠党的各级组织进行工作，不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他在经济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误。去年出现的明显通货膨胀,既有去年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多年来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结果。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出现了,如果那时就采取措施,损失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但是,赵紫阳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这一切都说明,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决不是偶然的。

总之,这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有它的必然性。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对他的错误有过批评,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毕竟对他监督不够,在这方面也是有责任的。今天,我们能够揭露并纠正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集体是坚强有力的,是能够经受住任何艰巨复杂斗争的考验的。我们一定要从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党组织首先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对于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三)

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這場暴亂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遲早總會爆發，早爆發比晚爆發要好，現在爆發比將來爆發要好，損失要小得多。這是因為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們在關鍵時刻對平息暴亂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社會主義，他們在這場鬥爭中經受住了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他們不愧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不愧為捍衛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鋼鐵長城。

鄧小平同志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是我們總結過去，思考未來，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的綱領性文件。我們應當以這個講話的精神為指針，系統吸取過去工作的經驗教訓，切實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克服黨和政府嚴重脫離群眾的傾向，加強同廣大人民的密切聯繫，重振革命精神，恢復艱苦奮鬥的傳統，團結人民繼續前進。對此，中央準備進行認真的研究討論，作出相應的部署。這裡，我們先提出以下一些初步的意見。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部分，纠正失误的部分，加强不足的部分，在经过认真的治理整顿之后，把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搞得比过去更稳，更好，甚至更快。

第二、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决不手软；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依法惩处人民深恶痛绝的刑事犯罪分子，坚决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第三、我们一定要从这次学潮、动乱乃至暴乱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并且长期地坚持下去，决不再象过去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那样走过场，决不半途而废。

第四、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切实加以纠正。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克服腐败，惩治官倒，

清理整顿公司等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一定要在近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做出成效，以取信于民。

第五、在经济工作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要真正做到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争取农业有一个好收成，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和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加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六、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特别是依法行使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努力创造安定、团结、民主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七、对于我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海外舆论大肆制造和传播谣言，在国际上主要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们相信，谣言终将被识破，真象终将大白于天下。在这困难的时刻，我们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需要团结一致，顶住外来的一切压力。已经站了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

系。对于某些国家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必要的斗争。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中共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文件之三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19日)

李 锡 铭

我们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完全拥护李鹏同志刚才的讲话。现在,我和希同同志作一个联合发言,讲四点意见。

一、两个月来北京发生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问题出在党内,是长期支持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赵紫阳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几年,社会思想混乱,精神污染严重,各种非法组织活动猖獗,大学的学潮连年不断,最根本的原因,是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得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1986年末和1987年初,针对当时极少数人借学潮之机,大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开展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是,这场教育和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干扰,没有能够持续地开展下去,只搞了三个多月,就半途而废。1987年5月13日,他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上,匆匆忙忙地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失去了公开的市场”。尽管也说了一些要“深入”的话,实际上是把这场教育和斗争停了下来。去年6月,一些人再次借学潮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把这些材料如实地报送中央,向赵紫阳同志提出建议,要大力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尽快改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状况。但是,他对我们的意见不以为然。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他反复强调“不要仅仅归于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泛泛地说四项基本原则”,“不要一般地说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只要把改革的成就、改革所处的阶段、怎样看待改革中的问题等等讲清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赵紫阳同志这样讲,实际上是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去年以来,有几个方面的动向,很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去年上半年,新闻界、理论界、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事体制改革的部门,有些人通过写文章、作报告、办训练班,大搞拥赵活动,

把赵紫阳同志吹得神乎其神，似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是邓小平同志，而是赵紫阳同志。一些港台报纸也紧密配合，遥相呼应，登了不少吹捧赵紫阳同志的文章。二是去年下半年，一些中央部门出的报刊，采取影射的方法，什么“垂帘听政”、“老人政治”、“封建专制”等等，反对小平同志的思想、路线、政策，一直到旁敲侧击地对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三是今年以来，各种狂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非法集会纷纷出现，各种“论坛”、“沙龙”、“研究会”、“座谈会”、“名人名家联谊会”频繁活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搞乱人的思想，毒化政治气氛。他们中间有的人不仅在社会上进行明目张胆的活动，而且打入企业、机关、团体，一直打进中央国家机关和一些领导部门。面对这些反常的现象，赵紫阳同志不闻不问，满不在乎，对某些活动甚至颇为欣赏，事实上起了支持、鼓励和纵容的作用。今年北京的学潮来势这样猛，很快就发展成为政治动乱，接着就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长期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是个根本原因。

这次动乱当中，万人大游行接连不断，两次发生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华门事件，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咒骂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肆无忌惮，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我们向中央作了充分地反

映，急切地希望赵紫阳同志听取汇报，研究对策。但是，赵紫阳同志却抱着一种我们实在无法理解的态度，毫不在意，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发生了上万学生冲大会堂东门的事件，赵紫阳同志在四楼上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却若无其事，转身就离开大会堂打高尔夫球去了。当时在场的同志以及保卫人员对这种举动十分不满，连日本商社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了讽刺挖苦的话。

5月初，赵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拿出了一个月准备在纪念“五四”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征求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我们建议在讲话中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思，希望这样能够对学潮和动乱起一点扼制的作用。但他根本不予理睬。5月10日，中央通知我们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学潮和动乱情况，我们准备了材料，但赵紫阳同志却根本不听，而是大谈什么“透明度”、“司法独立”等问题，还说什么“我们过去往往是原则和行动背道而驰，我们党对我国的宪法就是根本不打算执行的”等等。在这个会上，我们提出新闻界存在某些自由化现象，对这次学潮起了不好的舆论导向作用，他不但不同意这种看法，反而要我们去向这些舆论寻求“共同点”。

近几年，赵紫阳同志一再贬低党的领导作用，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贬低政治工作干部的作用。87年秋在北戴河

会议上讨论十三大报告的草稿，他在谈到如何规定省、市、自治区这一级党委的职能时，提出了一个所谓“介乎”中央和基层之间的奇怪概念，甚至同国民党的省党部作类比，实际上是想取消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作用。后来，对基层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他完全违背小平同志对监督保证作用的论述，自己提出了一个所谓“类似于机关党委”的模糊概念，实际上是抹煞了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承担的重大政治职责。接着，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又莫名其妙地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似乎党在这方面犯了什么根本性的错误。直到今年3月的一次座谈会，他还认为在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委只不过处于“协助”地位，而不承认它是党的首要职责。此外，他还提出了工会要同党“保持距离”的主张，抹煞了工会是党联系广大职工群众的纽带的性质。正是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近几年，“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干部兼职化，党的作用淡化”等谬论甚嚣尘上，党的建设被削弱，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群众工作被削弱，政工干部队伍被削弱；而那些企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却从赵紫阳同志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变本加厉地攻击党的领导，污蔑思想政治工作，丑化政治工作干部，以求达到最终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这些年来赵紫阳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支持和纵容，

是这次学潮演变成为政治动乱,进一步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主要原因。赵紫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邓小平同志4月25日的讲话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赵紫阳同志从中作梗,学潮早就可以平息。

耀邦同志逝世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呼应和策划下,悼念活动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暴烈的学潮。几天工夫,各种大小字报、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而来。他们公开提出要“打倒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4月18日、19日,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发生过的事情。4月22日追悼会后,学潮更是变本加厉。一些人扬言要“联合工农,打倒暴政”。“游行、集会此起彼伏,演讲、传单到处可见。非法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积极插手。短短10天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极少数人利用学生的激情,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和失误,发动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4月24日晚,北京市委向政

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政治局常委批准了我们的意见，要求我们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平息学潮，稳定局势。第二天，小平同志对学潮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性质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动乱。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正确指出了问题的性质，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社论发表后，大家觉得心里有了底，工作有了依据，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采取措施了。市委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沟通思想；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努力争取中间群众；开展各种对话活动，使政府同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缓解的可能；同时，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学潮向社会蔓延。

事实证明，这些工作是取得了成效的。由于4月26日社论的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7日游行时打出的却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等标语口号。同时，学潮的温度也明显下降。他们

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和支持的群众也大为减少，对话的积极性也不那么高了，有的学生说：“要对也对不过政府”。非法的学生组织只不过盼望使自己的组织合法化，以便作长期斗争。“五四”游行之后，学潮的头头们就宣布次日复课，转入校内民主斗争。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显然，这场学潮已经接近尾声。

然而，由于赵紫阳同志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使得已经接近平息的学潮波澜又起。本来，在朝鲜期间，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赞成4月25日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回国之后，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的社论。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对赵紫阳同志的那番讲话感到迷惑不解，无所适从。有的

本頁缺

(This page missing from source)

一种十分困难的境地，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我们想办也办不了。

同我们的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已经复课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5月4日当晚听了赵紫阳同志讲话，就重新宣布罢课。同政府对话的条件，也大大提高了价码，甚至以“政府无诚意”为借口，发动了先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为时7天的大绝食，造成极大的社会震动。在某些舆论部门的煽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全社会的介入，从5月16日至19日，声援学生的群众大游行由几万人扩大到十几万人、几十万人。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幕后策划动乱的人赤膊上阵，走上前台。一些自称“受党中央委派”的人，与非法组织勾结起来大肆活动。一些新闻界的人士也登台亮相，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展了大串联，24个大中城市相继爆发了游行、示威、静坐、绝食，20多万学生进京。戈尔巴乔夫访华等重大国事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国家政治生活失常。就在这时，赵紫阳同志借会见戈尔巴乔夫之机，把邓小平同志推了出来，愈加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一时间，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一些人扬言要用群众暴动的方式来“推翻李伪

政权”、“打倒邓、杨、王、李新四人帮”，甚至扬言要在“三天之内建立新政府”，而且造谣“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已脱离伪政权”，“30多个国家已断绝同伪政权的关系”，“世界各大银行已冻结对中国的贷款”，还有人居然敦促北京市委、市政府同“李伪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一些人扬言要建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北京区政府”，以取代合法的市人代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各种社会渣滓纷纷跳了出来，组成“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要充当反革命夺权的突击队。动乱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同赵紫阳同志这一段的所作所为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赵紫阳同志是党内支持动乱的代表人物。

三、从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赵紫阳同志把自己摆到了党的对立面，出现了许多极不正常的现象，必须搞清楚。

在动乱急剧发展，形势迅速恶化的重要关头，赵紫阳同志在政治局的常委会上，公然主张接受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要求，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定性，而且伪善地说，这件事情可以由他来承担责任。赵紫阳同志这样搞，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是很清楚的，是任何人都欺骗不了的。政治局常委坚决否定了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赵紫阳同志在他的目的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此

要挟中央，这是极端错误的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党内最高的核心机密，为什么那么快就泄露了出去？5月19日，自称“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他们歪曲事实，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在如此露骨的挑动下，动乱更加升级，在连续几天的大游行中，打出了大量的标语口号，一方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呼唤“还我紫阳”，“党无紫阳，国无指望”，“紫阳出来，伸张正义”，“党的总书记，人民需要您”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极端反常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赵紫阳同志在中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谁都知道，赵紫阳同志的身边有一个“智囊团”。这个“智囊团”的有些人，在这次暴乱中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5月19日，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发展中心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四家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和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

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实际上是把戒严的决定暴露了出去。在这个《声明》的指挥下，果然在当天晚上，为了迷惑群众，绝食变成了静坐。同时，军队即将进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如此肆无忌惮地泄漏机密，如果没有很硬的后台，是没有人敢这样干的。

这里必须搞清楚的是，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由政治局常委内部商量决定的。这样的核心机密是通过什么人泄露出去的，不搞清楚能行吗？现在已经抓获的“高自联”的头头供认，5月19日下午4点，的确有人以“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这个消息。难怪在国务院宣布戒严之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有足够的时间，煽动青年学生和不明真象的群众，到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阻止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执行任务。甚至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也险些无法举行。这么高度的机密，就这样被泄露出去，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颇有感受，好几次我们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说的一些话，很快港台报刊就披露出来，是谁给他们通的气？这说明，在我们党的最高层，有内奸，有黑手。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关

键时刻,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都能先我们一步,往往使我们陷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这些问题必须追根寻源,彻底查清,否则将会给我们留下无穷的隐患。

四、几点建议。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确实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最近几年,思想混乱,社会震荡,学潮不断,以致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象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为此,我们对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 1、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旗帜鲜明地、实实在在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国百年实践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我们治国、建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经常性的任务,而不是突击一阵能奏效的;不能形势稍有好转,就把四项基本原则抛到一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而是要渗透到各项工作中去,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起引导作用,对一切错误的东西起抵制作用。一定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体化、经常化、制度化,一定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把宣传舆论阵地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健康顺利地发展。

2、要下最大的决心，用足够的精力，拿出相当的时间，认真做好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既要坚决打击社会上的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又要深入清理内部，决不容许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占据要害部位。在彻底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基础上，建议进行第二次整党，消除在政治上同党相对立的以及不合格的党员，保持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如果不下决心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搞彻底，如果不在党内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整顿，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

3、经过这次动乱和暴乱，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确实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害。现在虽然在政治上控制了局势，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赢得人心。因此，当前要下决心办几件事，首先是在消除腐败、惩治官倒、治理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切切实实办几件深得人心的事。把人心争取过来，把经济搞上去，今后的事情就比较好了。

中共北京市第六屆委員會
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文件之四

陳希同、李錫銘同志的發言

1989年6月20日下午

陳希同同志：北京市在这次学潮、动乱、反革命暴乱当中是首当其冲。本来李锡铭同志已经代表我作了联合发言，我已经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刚才听了紫阳同志这么一讲，我倒是想再说两句。我觉得紫阳同志讲的都是辩解之词，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紫阳同志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好心好意，我完全听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实践的结果证明，按你的方针、你的路线来搞，学潮是压不下来的，是停止不下来的，是越来越扩大的。在4·26社论以前，学潮是升级的。北京市当时罢课的达到了6万人。有1/3的学生卷进来了。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够严重的了。很不利于我们北京市的安定。我们当时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没有安定就没有一切。市委几个人都是巴不得把安定的局面保持下来。但是，不可能。做了许多工作，都无济于事。中间派大

量地倒向人家那一边。我们在第一线工作是十分困难的。那个时候，万里同志在大会堂的115厅找了我们的几个同志，要我们到第一线去。当时我们很火啊，我们说我们天天在第一线，怎么还没到第一线啦？当时的问题是中央态度不明确，中央没有把这场风波的性质旗帜鲜明地弄清楚。所以，我们要争取、团结中间派就十分困难。万里同志听了我们几位常委的意见，他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向中央提吧。于是我们开了一个紧急常委会，开了两个小时。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很快写出一个提纲，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当时是我汇报的，李锡铭同志补充。我们汇报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讲耀邦同志逝世以后，虽然葬礼已经结束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相反，有些人利用耀邦同志逝世这个机会，大搞了一些名堂，欺骗了许多群众，提出了许多政治要求，并且造了很多谣。当时我们说，他们在这个较量当中得了几分。我们分析，这次学潮的出现有四条原因：第一条，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第二条，是国内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动组织同国外反动政治势力相勾结的结果；第三条，是我们在经济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发生了一些失误，如物价问题等等，是矛盾激化的结果；第四条，是我们党存在腐败现象，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结果。我们说了这四条原因。同时，向

中央提了四條建議：第一條，要求中央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當時還沒有提動亂，就是要求中央明確態度，哪怕發表一篇社論，或者哪個領導人出來說一句話，我們要旗幟鮮明地維護安定團結。當時是這麼講的，還沒有說“動亂”這兩個字。因為如果不旗幟鮮明，你怎麼樣也團結不了中間群眾，很多人會跟他們跑。第二條，就是要求中央把輿論工具掌握起來。當時的輿論，大家都明白是個什麼樣的輿論，一天到晚罵共產黨，特別是矛頭指向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把共產黨說得非常臭。我們當時說共產黨是垮不了的，可是人家不那麼看。他們認為共產黨是氣數已終，要壽終正寢了，到了這個程度了。要求把輿論掌握起來，這是我們的第二條建議。當然原來也沒有掌握起來，到現在可能好一點了，但也不完全掌握起來了。第三條，要求中央授權我們放手發動群眾。老是讓人說，我們不說，不抵制，這怎麼行呢？結果讓他們拼命地擴大地盤。當時我們講，好象是在拉偏架，老是要求我們，要克制啊，要寬容啊，而對對方却拼命地鼓勵。在這種狀態下，我們怎麼能把局面扭轉過來？所以，當時要求中央讓我們去放手發動群眾，不要捆住我們的手腳。包括動員農民、工人、機關幹部起來同反對共產黨的這股逆流作鬥爭。這一條後來中央是明確了，同意了。最後一條，是要求在反

对腐败等等这样一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方面，办几件真正得人心的事情。我们向中央的建议就这四条。原因有四条，建议有四条。常委批准我们北京市去搞，我们立即开了区、县、局以上干部会议，随即又将小平同志的讲话进行了传达。是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传达的，没有乱传达。讲了以后，很受下边同志的欢迎，认为中央做得对，市委做得对，所以大家劲头来了。原来处于很困难境地的积极分子，有怨气的积极分子，也精神为之一振，觉得这下我们有希望了，心里有了底了。我们当时看到，原来的局面是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的，在那以后，局面就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了。我们说，事情正在起变化，中间群众在逐渐倒向我们，而且复课的已经相当多了。后来有人说，学生复课是紫阳同志“五四”讲话的结果，有张报纸还说，“这难道是巧合吗？”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时候，锡铭同志今天上午已经讲了，复课的学生已经相当多了，也就是说，学生闹事已经缓和下来了，局面已经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了。但是，紫阳同志五四讲话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局面又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动乱迅速升级，这是事实啊。你讲话以后，由于得到了你的鼓励，人家本来要复课，于是又宣布要长期罢课了。事情就闹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凶。有的同志用《沙

家浜》那唱词来挖苦你，说是“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是说人家并不买你赵紫阳的帐，不给你面子，还是照样闹。这些话我们当时都没有汇报，汇报了也听不进，而且会反感。紫阳同志讲话以后，结果是闹得更厉害，所以大家对你的讲话非常反感，人家根本没有听你的。你刚才讲，你的讲话起了好的效果，不是那个情况。（李锡铭同志：报上吹的，新闻“自由”造出来的。）那是吹的。那叫什么报？是青年报。大家一看都好笑，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紫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些同志说，中央的看法不一致了，我们被“出卖”了。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如实地作了汇报，把下边的东西不加隐瞒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这样做是应该的，不应该隐瞒，那怕难听。但是，紫阳同志当时看来对这句话很恼火。其实，那次会上我并没有把话说完。还有的同志说“把市委卖了”，“市委也装进去了”，“要把市委当替罪羊”等等，这些话我都还没有说。（宋任穷同志：出卖了，还出卖了许多人。）下边的积极分子难受得很，被臭骂的很难听，有的人痛哭流涕。（赵紫阳同志：这个话，希同同志是5月1日讲的。）哪一天时间我记不准了。我说了几次。（宋平同志：叫我去对话嘛，转了几个学校都说这个话，“被出卖了”。）所以紫阳同志讲你的意愿是好的，是想把学潮平

息下来，而且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们也宣传你的观点，但是人家不听啊。你说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天安门他就是不撤，而且还要绝食。一到学潮低落了，学生没有劲了，他又来一支强心针。一会儿是记者出来游行，一会儿是刘晓波出来绝食，一会儿唱歌的侯德建也去了。有的新闻工作者跑到市委东门，大喊大叫要我们站出来，高喊“北京市委欺骗中央，罪责难逃”。我们是处于极端极端困难的地位。当时我们就想，如果他们得胜了，我们怎么办？我向锡铭同志，还有其他几个同志谈了，如果共产党垮了，我们就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这个话都说了，到了这个程度！好多积极分子哭啊，积极分子受围攻啊。就是拼命地让右派来进攻我们，而我们自己却要克制、克制又克制。今天有些事情明白了。当时我们想，什么叫投降主义路线，这就是！我们一切的说法、讲话、措施，都是适应对方的需要，力求合对方的口味，而我们反击却不行，这怎么能团结群众呢？旗帜不鲜明，怎么也团结不了群众。这些都是同你紫阳同志的愿望完全违背的。你是一厢情愿，确实是一厢情愿。这一厢情愿的思想，不仅是你有，还有一些同志，包括我们市里有的同志也是有的。想劝说劝说，答应他一些要求，殊不知人家得寸进尺。有时也想给他个台阶下来。但谈

判了多少次，台阶给了，台阶已成了楼梯了，比慕田峪的台阶还多了，但是也不下，就是不下这个台阶。每次让步都不行。所以，退让的结果，越退让越不行，事情越闹越大。那次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我讲的最后几句话是这么说的：“以斗争求安定则安定存，以退让求安定则安定亡，对方是要和我们拼到底的”。这是原话，将来还可以查文件。“我们决不能够存有任何幻想，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斗争，不仅维持当前暂时的安定局面都不可能，长期的安定更是一种幻想”。这是当时我的结束话。所以从整个过程看起来，你是想用退让的办法，用“缓和”的办法，结果是不能奏效，实践证明你这个不行。相反，5·19讲话以后，李鹏、杨尚昆同志讲话公布以后，我们又精神为之一振。各级干部、积极分子又活跃起来了。大家觉得，这一下好了，中间群众又往我们这边倒了，好多原来不清楚的人变了。所以中央的旗帜不鲜明，那是不行的。旗帜鲜明就要表现在定性的问题上。如果旗帜不鲜明，那是团结不了中间群众的，中间群众不知往哪儿跑，甚至还存在着“李鹏下不下台，邓小平下不下台”等疑问，甚至还听信各种谣言，什么“新政府的名单已经拿出来了”，谁谁怎么样，谁谁怎么样，什么“北京市作了假汇报，要当替罪羊了”等等。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还怎样去团结争取中间

本頁缺

(This page missing from source)

得我們想一想。那個時候，我們黨簡直成了地下黨，我們的政府成了地下政府，我們處處都受限制，連我到人大會堂開會，也得拿着紅十字會的白旗，這丟人丟大了，把我這個市長的臉都丟盡了。我們有個市長助理，也曾被人家勒令停車檢查，他的司機詭稱：“這位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黃先生。”這才讓他走了。反革命氣焰到了何等程度！十分器張。（宋任窮同志：首都到了這個程度了，趙紫陽同志，你想想。）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所以紫陽同志你要考慮後果。（宋任窮同志：實踐的結果是這個樣子。）你不能不考慮，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你剛才講的這些想法，也代表你處理問題的方針，客觀上是起了這麼個壞的效果，因此我覺得紫陽同志應該從主觀上深刻地反思這個問題。我們對你的印象過去並不壞，覺得你是抓改革的，而且有一些好主意。但是你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我們也議論過有問題。你是不是被一些人包圍了？有的人一天到晚給你出馊主意，有沒有這個問題？你的一些指導思想，同西方化的一些玩藝兒合流了。雖然你不覺得，我們却是這樣想的，但當時沒想到會發展到這麼嚴重的程度。特別是你從朝鮮回來，那次不是讓我們匯報嗎？叫李錫銘同志和我兩個參加會議，要聽北京市和國家教委李鐵映同志的匯報。當時，我們是盼你回來的，認為總書記回來了，紫陽同

志回来了，学潮就好办了。当时还希望你提前回国，我们还提了个建议。希望你回来处理这个局面，收拾这个局面，确实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那次会我们还没汇报，大家还没谈问题的时候，紫阳同志就先讲了几句话：“我先表个态：第一，拥护26日社论；第二，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第三，那个三人小组，一个乔石同志，一个启立同志，还有一个铁映同志，我赞成”。我回去给我们的常委传达，有的常委问，紫阳同志回来方针变不变？我说不会变，因为紫阳同志又说了，又表了一次态。没想到过了几天就变了，弄得我们是十分麻烦、被动。我们在首都做工作，没有像这次这样难受，工作这么困难。当然，我们工作有缺点，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努了力的。我们的处境太困难了，扭转不了这个局面。当时很多同志哭了，又不好跟人家说，还要违心地讲中央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

（李锡铭同志：我再说一点。刚才涉及到北京市“欺上瞒下、扩大事态、谎报军情”的问题，这是“高自联”和紫阳同志非常欣赏的那些自称“精英”人大量制造的谣言，我们听了只是付之一笑就是了。今天听阎明复同志谈到，原来是来自紫阳同志，不知道是怎么串通的？我们每次给中央的汇报都有书面的东西，也有会议记录可以复印出来大家审查。

我们送的资料、信息都有，都可以查。我们什么地方谎报军情了？我们什么时候欺上瞒下了？都可以查得清的。我就痛心总书记居然是和这些坏蛋一个鼻孔出气。5月4日那个讲话以前，我们是了解“高自联”的情况的，已经是灰溜溜地回去了，连对话也不想对了，说“我们对不过袁木这个老滑头”，合法化也不争取了，慢慢“夺权”。原来学校做了大量工作，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已经复课了。结果一广播紫阳同志的讲话，首先是北大、师大，当晚就推翻了他们原来的决定，宣布继续罢课，并且是无限期罢课。他们连夜开会，研究、提出对话的各种条件，价码越来越高。一说新闻要自由，要放开，本来放得就够可以了，这一下就更厉害了。我说是笔杆子煽起了反革命暴乱，最后只好用枪杆子压下去。笔杆子厉害啊，这一次可使我们尝到滋味了。赵紫阳同志讲话以后，鲍彤居然直接下命令，让中央电视台连播三天。哪次谁的讲话要连播三天的？鲍彤通知艾知生的。（宋任穷同志：哪一个叫鲍彤要连播三天的？请紫阳同志答复。赵紫阳同志：我不知道这个事，可以查，我不知道连播了几天，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宋任穷同志：可以查出来。那天报纸说是“赵紫阳一讲话就全部复课了”，是这么回事吗？这是有一点新闻的真实性吗？）

中共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文件之五

王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节选)

1989年6月21日

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在4月25日和6月9日所作的两次重要讲话，拥护李鹏同志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报告。

这次开始于学潮，继而形成社会动乱，最后在北京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的事件，实质上是一场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与我们党和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一次公开较量。这次事件从4月15日耀邦同志逝世后开始发动，至6月4日平息下来，前后历时50天，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月15日起至18日，这时的学潮带有自发性质，广大学生确实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而参加的。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本来阴谋在五四期间挑起事端，这时见学潮已起来了，于是立即插手，使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从4月19日起，出现大

量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小字报、标语、传单，并接连发生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等严重事件。这时社会动乱即已形成，直至5月20日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前，是事件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段时间动乱形势日益严峻，并波及到全国许多城市。从5月20日以后是第三阶段。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策划和制造动乱的极少数人网罗和组织一些没改造好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以及各种社会渣滓，并且欺骗和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四处阻截戒严部队，围攻、侮辱军警人员，冲击公安机关，甚至妄图策动戒严部队倒戈。这时，事件的性质就已开始发生变化，由社会动乱转变为反革命暴乱。到6月3日一小撮暴徒大肆杀害执行戒严任务的军警，疯狂地搞打砸抢烧活动，反革命暴乱活动达到了高潮。在这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的决策，一举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取得了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这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的大气候来看，首先要看到国际资产阶级始终没

有放弃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战略。50年代初，美国的杜勒斯提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掌握政权的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身上。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这一宗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勾当。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民主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部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演化，导致或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美国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近几年来，他们竭力支持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一类的政治反对派，培植王炳章、胡平等人在美国搞起来的“中国民联”，支持台港反华反共势力，利用国际人权、国际大赦组织，多方向我施加压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一些人，把体改委下属的或由体改委派入组建的体改所、农村发展中心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成是赵紫阳的智囊，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美国大使馆在这些单位里经常结交的有20多人，从1987至1988年，仅美国

驻华使馆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李森智一人，就与体改委系统的 15 个人来往近 50 次，从来往中收集他们感兴趣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经常以“国际访问者”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中央情报局的李森智在推荐原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研究员娄继伟访美时写到：邀请娄访美“有助于打开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一年内，仅李森智一人就推荐了体改委系统的 12 人访美，成行 11 人。

“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关系也很值得注意。1986 年初，美国人乔治·索罗斯向体改所表示，他愿意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 100 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 6 月，在索罗斯资助下，随团出访的陈一咨在布达佩斯与索罗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向鲍彤汇报了此事。10 月，陈一咨又与索罗斯在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青年经济学会的李湘鲁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一咨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同志打过招呼，紫阳同志也同意。随后索罗斯就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1986年底，李湘魯向美方要錢。1987年1月7日，索羅斯基金會匯來25萬美元。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向我揭發說：1987年1月由美國某基金會直接匯入中國25萬美元，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筆特別經費，它的使用將對中國的開放造成嚴重損害，使中國領袖人物造成難堪的局面”。公安部經過調查向中央作了報告。1988年1月9日趙紫陽同志批示：“此事請安志文同志過問，想辦法結束體改所與美國喬治·索羅斯的關係”。不久，決定將基金會掛靠在“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至今年5月，喬治·索羅斯一共匯來250萬美金，基本上用於四個方面：一是體改委及其下屬機構一些人出訪美國的费用開支，以及接待美方來人的開支；二是進口了50萬美金的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三是撥出25萬美金計劃建立一個政治沙龍性的俱樂部；四是用於一些文化事業。經初步查明，這個基金會至少有四個問題：第一，美方主席喬治·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有美特嫌疑；第二，這個基金會的美方顧問委員會里有四人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第三，體改所與索羅斯實際上沒有脫鉤，索羅斯每年投資100萬美金中，明確撥出10萬給體改所，這筆錢的開支不用經過審批；第四，鮑彤、陳一咨等人仍繼續保持與美國人的聯繫，索羅斯兩次來訪，索的私人代表三次來訪，他們都有接觸。1988

年8月索的私人代表来京时，正值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鲍彤、陈一咨都在北戴河，这个代表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这个代表说他已经跟陈一咨等通了电话，并说，他已知道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央有了意见分歧，中国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现实很不满意等。他本拟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他一周后说事情已办完，提前返回美国。李湘鲁赴美留学后，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已经接管了基金会的情况下，他仍然同索罗斯保持着联系，关心基金会的情况。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既有幕后策划、又有公开煽动活动的体改所等“四所一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使用这个基金会的钱去过美国的。原基金会中方主席陈一咨，在这次动乱中活动尤为突出。据揭发，4月21日，体改所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个写有“耀邦不死，改革万岁”的大气球，就是陈一咨支持搞的。4月24日，陈一咨对人说，这次的主攻目标是解散中顾委。5月19日，在陈一咨主持下，以“三所一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攻击党和政府“违背良知”，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等。5月20日，体改所等“三所一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煽动群众对抗戒严令，提出罢免李鹏。据政法大学讲师陈小平交代，5月23日，陈一咨用小车把他从

广场接走，给了他 25000 元人民币，要他交给“高自联”、“外高联”使用。可见，这些所谓赵紫阳同志的智囊人物，实际上是美国培植起来的。5月23日，乔治·索罗斯给中方主席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理由有两条：一是鉴于中国的局势；二是赵紫阳先生离开了领导岗位。索罗斯在来信中毫不隐讳地说：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今天我对不得不作出的终止协议而深表遗憾。中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策，迫使索罗斯亮出了真相。

从国际大气候来看，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前国际共运的衰落，特别是欧洲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化，使国内极少数妄图推翻共产党的人受到很大鼓舞。近几年，欧洲某些已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迫于各种政治、经济压力，相继失去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如匈牙利在去年5月的党代表会议后，在“加速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旗号下，各种政治组织、政党纷纷成立，并迫切要求参政，采用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等手段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匈党中央领导意见分歧，节节退让，终于被迫决定实行多党制，在1990年多党参加的大选后组成联合政府。在波兰，团结工会闹了近十年，统一工人党中央终于在今年2月

6日至4月5日的“圆桌会议”后，正式承认其合法地位，并接受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主张。尽管波党中央名义上还没放弃党的领导权，但由于决定不再突出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党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已大大削弱，整个政局正朝多党制方向急剧发展。波统一工人党内也出现分裂的迹象。在南斯拉夫、苏联等国也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受到严重威胁。

关于国内的小气候，我认为应该看到，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一股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建国初期，我们同这股反动势力的斗争表现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正如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次指出的那样，阶级斗争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次积极策划、煽动社会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既有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有新生的敌对分子，他们中有五七年的右派，有“文革”中的造反派，还有青年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中的蜕化变质、走上反革命道路的人。我们同这一小撮人的斗争，正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这几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搞

乱了人们的思想。方励之等人在 1987 年虽然受到一些批判，但名气反而越来越大，竟公然以“持不同政见者”身份大肆活动，造谣煽动，制造事端，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他们甚至策划成立反对党，鼓吹在中国实行多党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党内的少数同志，特别是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长期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抓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从而纵容和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展，以致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感到有恃无恐。在这次社会动乱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中央常委多数同志及时分析了形势，明确指出这次事件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中央常委作出了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部署。常委的决定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完全支持，根据常委决定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号召。此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为制止动乱做了大量工作，局势曾几度出现缓和的迹象。然而，由于赵紫阳同志从动乱初期回避事件的严重性质，坚持采取迁就、妥协、退让的方针，直至公开与中央决策唱反调，并策动舆论

进行支持动乱的错误导向，从而使事态愈演愈烈，形势急剧恶化。在5月17日斗争处于十分紧要的关头，中央常委召开会议的时候，赵紫阳同志仍然置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于不顾，而从个人利益和政治目的出发，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直至发展为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和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完全丧失了党的立场和共产党员应有的政治品质。这次事件发展如此严重，给党和国家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赵紫阳同志是难辞其咎的。因此我完全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撤销赵紫阳现任职务的意见。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六

陳 云 同 志 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1 9 8 9 年 6 月 2 1 日

- 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
- 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七

李先念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1日上午

我完全拥护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同意李鹏同志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同意其他同志对赵紫阳所犯错误的严肃批评。我讲几点意见：

一、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挑起的动乱，在首都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而且引发了若干城市的动乱和骚乱。其范围之广、性质之严重，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毫无疑问是由国内外反动势力挑起和制造的。也应该看到，动乱之所以能够发生，同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有关，同这种错误所造成的困难和它所引起的群众的严重不满有关。赵紫阳同志是这场动乱的祸根。事情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其根源也在赵紫阳同志，在于他明里暗里鼓励和支持动乱，在于他在党内

制造分裂，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多数人，企图造成只有他才能出来收拾局面的形势，通过动乱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主要由邓小平同志提出、党中央集体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十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近几年来，赵紫阳同志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歪曲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在指导思想和工作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对此他不仅不作自我批评，反而在关键时刻，利用主要由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不满，借助动乱，来分裂党、反对党。

三、当前我们的失误和困难以及群众的不满，突出表现在财政连年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分配不公等方面。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在赵紫阳同志。

他不注意重大比例关系的协调，不注意农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赞赏和鼓励“赤字无害论”、“通货膨胀有益论”，使宏观失控，造成长时期的经济过热，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失衡。

他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事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生

产上，而过份热心地提倡私营经济的盲目发展，又不作必要的管理，结果扶植了一大批“大倒”、“小倒”，让一批投机倒把、行贿受贿、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的人大发横财。从北京的情况看，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这次动乱的积极参与者或支持者。

四、目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之风，特别是上上下下、党内党外存在着某些腐败现象。产生这些问题，不能都算在赵紫阳同志的头上。但是他负有主要责任。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提出要两手抓，提出要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陈云同志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对从严治党、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以后，更是撒手不管。他不仅不抓党的建设，不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不讲艰苦奋斗，不抓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处处想方设法来削弱。他提倡“淡化党风”，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他借口克服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提出要“改造党”，把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党的组织搞得灰溜溜的，实际上取消了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他的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使我们的党逐渐向资产阶级政党的方向蜕化。

赵紫阳同志甚至为产生腐败的所谓“必然性”寻找理论根据，似乎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产生腐败”。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他不是根据群众的意见，采取措施制止少数干部子女参与倒买倒卖，反而强调在经商问题上人人平等，不要歧视干部子女。

五、赵紫阳同志是不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九八七年初批评胡耀邦同志他很积极，但是在他当上总书记以后，不但没有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下去，反而压制、打击执行中央方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许多同志，同时把很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保护起来。他虽然口头上说“两个基本点”，实际上从来不反自由化，直到这次纪念“五四”讲话，好几位同志提出应该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他拒不接受。这两年，在他的保护、纵容和支持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种自由化观点充斥一些报纸、杂志。象《世界经济导报》这样的报纸，就一直受到赵紫阳同志的支持和保护。很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但没有收敛，而且空前活跃。其中一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动立场、并积极进行政治阴谋活动的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治反对派，成为赵紫阳同志的依靠力量。他们中

有不少人平时给赵紫阳同志充当“高参”，这次动乱中，则积极出谋划策，到处煽风点火，有的成为这场动乱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六、赵紫阳同志的严重错误以及所造成的混乱，党内很多同志早有察觉，是有很大意见的，他自己心里也有数。这次动乱发生后，有人就分析过赵紫阳同志的处境和他所能作出的选择。他们认为：赵紫阳一是把物价搞乱了，他在这方面的形象不好；二是政治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他的形象也不好；三是廉政上他的形象也不好。他们认为，赵紫阳别无选择，只有和邓小平保持距离，收买“人心”，才能保住自己。这倒很可以说明他在这场动乱中的反常表现。这场动乱中，从学校的大字报、天安门的标语口号到大街小巷的各种传单，明目张胆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党政军领导人，特别是把矛头集中对准邓小平同志。事情的性质是如此的明显，但赵紫阳同志就是不承认是动乱，反而加以鼓励和支持，他采取的究竟是什么策略，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七、去年九月，赵紫阳同志会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里德曼，两人就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等

问题进行了长谈，被海外学者称为“历史性的会见”。接着海外报刊就透出一种舆论，就是“倒邓保赵”。一些资产阶级的文人、政客，围绕这个题目写了不少文章，诬蔑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邓小平退休。他们认为“今日中国经改的问题所在，就是赵紫阳不拥有独裁的权力”，“赵紫阳独裁的障碍是邓小平”。连香港的一些人士也看出了这些人的用心，说“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而老邓则有不少正统的东西”。香港人士还认为，这是“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在国内则有严家其同温元凯的对话广为散播，提出所谓“防止用非程序性的方式更换领导人”。这些现象同赵紫阳同志在这场动乱中的反常表现有没有关系呢？

八、这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愧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不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工人阶级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基础。

我们还应该坚信，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次

动乱中，即使有些人有过激的言行，总的来说，他们的愿望是善良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合理的，决不能把他们统统当作坏人。对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确属受到误伤的群众，需要认真地妥善地加以处理。当然，对那些极少数煽动、策划、组织暴乱的人和暴徒，那就应当依法严惩。

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发展战略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些今后仍然要坚定地贯彻执行。但是，在具体工作中确有一些失误。这次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它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说明我们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等方面，都有许多经验需要认真总结。现在，我仅就重振党的威信，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在全党特别是在中高级干部中，认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分清是非，认清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年当中，切实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为了适应这个任务，对于思想

舆论领域多年来存在的严重问题，还要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整顿。

第二，下决心彻底清除腐败现象。首先从高级干部做起，从我们这些老家伙做起。对于群众强烈不满的以权谋私行为和种种奢侈糜费现象，要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我们的干部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确有少数领导干部子女参与倒买倒卖。对此，要吸收党外人士、群众代表参加清查，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违法的必须依法处理，决不姑息。为了我们的党和国家，所有老同志都要下这个决心，带这个头。

第三，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首先是加强党内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决定。

同志们，现在真正是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是该痛下决心的时候了。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和做法，克服缺点错误，全党团结一致，并团结全国人民，振奋精神，共同奋斗。多难可以兴邦，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

的，我們千千萬萬共產黨員為之奮鬥終生的、無數革命先
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社會主義事業，是大有希望的。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八

彭真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1日上午

同志们：

赵紫阳同志在这次动乱中的行动，表明他违背党章和宪法，丧失了党的总书记应有的立场。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我赞成。我再就有关的问题提出点意见。

严酷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实质是妄图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这些年来，阶级斗争的意识淡漠了。实际上，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颠覆我们国家的活动。这次暴乱，是他们长期活动蓄意制造的结果，教训是沉痛的。

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早在五十年代，杜勒斯就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一个杜勒斯死了，活着的杜勒斯们一直在千方百计推行这战略。就国内讲，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还存在。因此，阶级斗争还将在一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我千万不能麻痹、松懈。

这类事件今后还有可能再来。我们要提高警惕，尽防止。即使来了，也要尽可能减少它的危害。我看关键我们的工作，在人民群众觉悟、积极性的提高，其中最本的是我们党的状况，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状况。必须先整顿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认真纠正错误倾向，清除腐败现象。

我们是执政党。党的状况如何，同国家和人民的命息息相关。但是，多年以来，我们党没有系统地、深地、全面地整顿思想、组织和作风了。特别这些年来，赵紫阳同志的纵容、支持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力滥，加上改革开放中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时候，许多坏的影响也进来了。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倾向不

发展，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已经引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敌人打不倒我们，三座大山都被推翻了，还有什么敌人能打倒我们？但是，如果党不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整顿，错误倾向不纠正，腐败现象不消除，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建设搞得不好，就可能再出乱子。因此，我建议：

一、切实整顿我们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痛下决心坚决纠正错误倾向、清除腐败现象。

怎么整党？我看应当按照党章，针对党内的主要问题，提出下述简明扼要、容易掌握、便于相互督促检查的具体要求。

（一）扎扎实实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团结统一就没有巩固的基础。放任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腐蚀，党和国家就又可能出大的乱子，甚至变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长期坚持下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样的根本是非面前，任何共产党员都不

应有丝毫的含糊。

这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对精神文明建设忽视了。而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却肆无忌惮地抓舆论，抓意识形态，拼命毒化人们的灵魂，把很多人的思想搞乱了。结果闹得四项基本原则好象不时兴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阶级、工人农民等等都不大讲了，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直有点象犯了忌讳，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倒吃香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说成僵化、保守，反对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极为荒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不断改革、发展、完善的。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岂不等于是说改革、开放就是背弃四项基本原则吗？不知道这类人到底想搞什么样的“改革、开放”。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有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

代人艰苦奋斗。要人民艰苦奋斗，党员必须带头，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

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当了“官”，就把人民放到脑后去了，甚至不是当人民的公仆，而是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成了老爷。对人民漠不关心，对工作不负责任，遇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受多大损失都不心疼，哪里象个共产党员？更有甚者，有些人一切向钱看，为了几个臭钱，违法乱纪，腐化堕落，把共产主义理想、道德、人格统统扔掉了。他们藉权谋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等，简直成了吃剥削饭的寄生虫。在我们党内，这样的人当然为数不多，但是危害极大，影响极坏，必须彻底清理。违反党纪国法的，必须按党纪国法处理，不能再含含糊糊不了了之，甚至包庇纵容。

（三）增强党性，消除派性。派性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危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腐蚀党的肌体。拉帮结伙的人必然营私，必然任人唯亲，必然破坏党的原则和纪律。帮派团伙往往是腐败的窝子。搞帮派的人没有原

则，互相吹捧、包庇，不讲是非，在他们中间“吹、拍、骗”一类歪风邪气必然或多或少地风行起来，危害之烈足以断送党和人民的事业。全党上下必须同心同德，一致清除派性。

(四) 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任何共产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过组织生活。过组织生活，要联系实际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人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常识都没有，却在那里大搞“突破”，谁知道他们要“突”到哪里去！有了错误怎么办？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党内需要批评自我批评，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谈政治，不谈理想，不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当面你好我好，背后意见一堆，党怎么能团结？怎么能加强战斗力？错误的东西不及时纠正，问题越积越多越大，早晚要出乱子。这样的训还少吗？我看，同志之间还是老老实实，以党章和宪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正错误。至于对违法乱纪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必须严肃处理，决不能姑息纵容。不能把“从严治党”变成空话。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改革和历史性的根本任务。经过10年努力，我们已经有了—部好宪法，还制定—批基本法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已经有法可依。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敷衍了事。党的总书记竟在这方面发生了问题，经验教训够深刻了。在我们的国家，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积极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解决问题。任何人无权违法胡闹。

(—) 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靠法制？一定要靠法制。宪法是这么规定的，党章也是这么规定的。这是总结建国以来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人人都必须守法，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使国家长治久安，比较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一项根本保证。11亿人的大国，没有法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各行其是，那怎么行？岂不要天下大乱？

(二) 搞法制，基础是宪法。宪法确定了国家的根本

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依据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明确地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体现了改革开放的原则。它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民讨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以宪法为准则，一切大是大非就会一清二楚。例如这次北京是不是发生了动乱，用宪法作标准来判断，就不会成为问题。我们要用宪法统一思想和行动。一个时期以来，极少数顽固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同国外敌对势力内外呼应，鼓噪修改宪法，妄图搞掉四项基本原则，毁掉我们立国的基石；妄图改变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行美国式的三权鼎立的制度，妄图把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和稳定，并为此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样才能有国家的稳定，才能保障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全体人民实行民主，

极少数的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少。人民内部有些人违法犯罪，当然也要依法惩处。这次由动乱发展到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的事实证明，国家的专政职能不但不能丢掉，而且不能削弱。宪法规定，“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的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对于极少数煽动、制造动乱、暴乱的人，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实行专政。当然，目前这场斗争相当复杂，主要是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我们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注意区分搞反革命暴乱的首要分子与胁从、盲从分子。对于那些受到煽动、不明真相、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学生、教师和其他群众，还是要采取民主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也是我们国家的政体。4700万共产党员如何团结起来、组织起来？11亿人民如何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只能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基础是民主。我们国家的民主基础是很广泛的，敌人只是极少数。在党内，在人民内部，应该也必须实行充分的、真实的、高度的民主。讨论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谁对听谁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报喜不报忧，不听不同意见。讨论的结果，如果意见还不完全一致，怎么办？少数服从多数。只有这样，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坚持，全党才能一致，人民才能一致，错误倾向、腐败现象也就容易克服，极少数坏人想再制造动乱也就比较难了，闹起来也会比较好解决。发扬民主，有没有根本指导原则，有没有标准？有。党内是党章，国家是宪法。党内不按党章办事，国家不按宪法办事，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化、无政府主义就有了市场，它们的所谓“民主”只会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极少数人煽动、制造动乱，破坏党，危害国家，损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的一个基本原则。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

須予以追究”。不管是谁，不论党内、党外，不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论教师、学生，不论领导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犯了法都要负法律责任。

总之，谁也不能凌驾于党章、宪法之上，赵紫阳同志当然也不能例外。听说昨天他在发言时，对于同志们会上揭发的严重的错误拒不检讨，这就很不好了。我希望他还是回到党的立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立场上来，对照党章、宪法，实事求是地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否则，是不会有光明前途的。

以上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九

鄧穎超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摘要)

1989年6月19日上午

我講三點意見：

第一、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的幾次重要講話。小平同志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是綱領性的，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的，而且還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認真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實現他的講話，真正在我們的事業中起指導作用，還需要很好的結合實際，才會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發揮它的重要意義。

第二、對趙紫陽同志所犯的錯誤，我完全贊成李鵬同志代表四位中央常委作的報告。

趙紫陽同志所犯的嚴重錯誤，是違反了黨的紀律，破

坏了党的团结，分裂党。在关键时刻，他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以此威胁党，使党中央不能及时、有效的制止这场动乱，他的所作所为，助长了这次动乱，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这样大的损失，我十分痛心。

我认为李鹏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根据赵紫阳同志的种种错误，我完全拥护中央常委对他作出的组织处理的建议。我认为，还应当给予恰当的党纪处分，对其进行审查。

第三、认真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既要坚决打击打砸抢烧杀的犯罪分子，又要深入清理内部。

为了使国内外进一步认清这次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要采取各种形式做好宣传工作。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十

徐向前同志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1989年6月20日上午

我完全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央常委所作的重要講話，完全擁護黨中央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決策。

五月二十二日，先念同志和丁關根同志受小平同志委託，向我通報了趙紫陽同志的問題和中央關於人事問題的考慮。我當時表示，贊同小平同志的意見，支持小平同志及中央常委同志的決策。

事實已經證明，近一個多月來的動亂，最後發展成為反革命暴亂，是國內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的結果，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結果。完全是有意識、有預謀的。其規模之大，來勢之猛，都是罕見的。他們的根本目的，就是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

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完全附庸于西方大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他不听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劝告，擅自发表与中央决议不一致的言论，并将党中央内部的不同意见暴露在群众之中，对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毫无原则地迎合一些错误的东西，我看他是想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有迹象表明，他倚重的那几个研究所是插了手的，中央有必要严肃查处。赵紫阳同志担任两届总理，听不进一些老同志的意见，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净出花点子。他不恰当地夸大“市场经济”和“个体经济”的作用，说穿了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赵紫阳同志的思想路线也很不对头。他作为总书记，长期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改造政治工作为名，削弱政治思想工作。我看有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倒是很欣赏的。

赵紫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我完全拥护撤销他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

這場動亂發展為反革命暴亂，對我們黨來說，教訓是深刻的。固然有少數人別有用心，肆意挑動，但也確實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失誤，利用了廣大群眾對各種腐敗現象的不滿情緒。對廣大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來說，要求懲治官倒、清除腐敗的願望是好的。因此，在政策上，一定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縮小打擊面，團結群眾的大多數。

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經受了動亂以及反革命暴亂的嚴峻考驗，證明我們的黨是堅強的、有力量的。我們的軍隊無愧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

沒有對歷史的溫習，就沒有對現實的剖析，沒有對現實的剖析，就沒有對未來的探索。希望黨中央對這次動亂乃至反革命暴亂的經驗教訓進行認真地總結，對建國四十年來的經驗教訓進行認真地總結。希望中央新的領導班子有一個新的面貌，在改革開放和懲治官倒、清除腐敗方面作出令人信服的成绩，以取信於民。希望在全黨開展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把四個堅持當作行動的指南，落到實處。我相信，中央新的領導班子一定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託和

希望，一定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十一

聶榮臻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1日

看了李鵬同志的報告，使我对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錯誤和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所犯的其它錯誤有了一個更深刻地了解。特別是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惡果是極其嚴重而不可原諒的。他辜負了黨和人民的重托。我完全同意提請中央全會撤銷他的中央總書記、政治局常委、委員和中央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我也完全同意對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成員作必要的調整。

回顧十年來，我們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成績，人民生活有了明顯提高。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方面卻越來越不得力。小平同志最早發現這個問題，

曾反复多次提出批评警告，但胡、赵两届总书记不但没有认真抓，反而同情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以致酿成一九八六年的学潮，胡耀邦同志只好引咎辞职。赵紫阳同志继任后，不仅没有接受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以致又酿成这场更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几乎不可收拾。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打了败仗，其教训是沉痛的。赵紫阳同志不仅是投降，还杀了回马枪，暴露出他的政治阴谋和野心，这就更令人愤慨！

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影响很大。一些人鄙视祖国，崇洋媚外，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标榜无政府主义，要个人绝对自由，整天骂党骂政府；反党反社会主义者洋洋自得，寡廉鲜耻之徒大发横财。影响到党内，一些党员不遵守党的纪律，不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不维护党的利益；一些党组织不领导党员学习贯彻党的决议、指示，不发挥组织作用，没有凝聚力。甚至党报不做党的喉舌，却成了自由化的宣传工具。如此等等，乌烟瘴气，散沙一盘。这虽不是普遍现象，但都是产生动乱、暴乱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现在，反革命暴乱平息了，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远

未肃清，今后思想战线上的争夺战还很艰苦。我们要下决心打一场持久战，准备几代人打它几十年！当前就是要有效地教育党员和群众牢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我们立国治国之本，传家之宝。群众反映，非常怀念五十年代的共产党。那时全党目标一致，一心为公，与群众共甘苦，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那时社会风气纯正，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现在就是要总结五十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彻底整顿党风，团结群众，重振民族精神，宣扬爱国主义思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群众行动变成巨大的建设力量，排除万难，去争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从当前这场斗争来看，我们还须要竭力宣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近年来许多人，甚至党的总书记都不提专政的问题，整个社会专政的概念淡化了。因为一切向“钱”看，也就看不清在我们社会里还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以及其它各种犯罪分子，更看不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大量的反动宣传。他们不认为这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非常和平麻痹，丧失警惕。其实这些敌人

和自由化的积极鼓吹者就与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明勾暗结，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变天，复辟他们乐园。这场反革命暴乱足以教育人们擦亮眼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须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告诫全党，人民民主专政对敌对势力就要施展专政的威力，就是压迫工具，是暴力，不是“仁慈”的东西。而对人民则施展民主的一面，要保护人民，教育人民，为人民服务。建国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凡是人民民主专政好的时期，国家就安定团结，事业兴旺，反之就动乱遭殃。

专政的机器是军队、警察和法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首先是加强军队的建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政权更须要枪杆子来巩固和保护。这本是我们政治常识的事。但近年来，在国际形势缓和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专政意识淡薄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许多同志误认为军队不重要了，所以打骂军人、军地关系紧张的事件屡有发生。同时，我们军队有些同志也不安心部队工作，想解甲归田，到地方去显显身手。这是非常错误的。我想经过这次血的教训，这些同志的头脑大概清醒了，枪杆子不能丢！在这次平息暴乱后，一些群众虽对我军产生一些误

解，或有某些糊涂观念，相信不要太久，用我军的实际行动会把这些误解和糊涂观念冲洗干净的。现在许多谣言中伤戮穿后，群众对我军的理解自然加深，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又在闪闪发光，一场热烈拥军的活动正在各地兴起。越是人民热爱我们，我们越要更加热爱人民。今后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更加努力学习锻炼，努力建设我军，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军地、军政关系，全军官兵团结奋斗，紧握手中枪，时刻警惕着国内外敌人的动态，用实际行动继续证明着我们不愧为英雄的人民子弟兵，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捍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最后，我完全同意李鹏同志根据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精神，对改进党和政府工作所做的初步安排。我衷心地希望趁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健在的有利时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重振革命精神，恢复艰苦奋斗的传统，总结经验，思考未来，把我们的建设事业切实搞上去，为祖国增光，为社会主义增光！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十二

王震同志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0日上午

(一) 完全同意小平同志五月九日讲话重新强调提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

(二) 同意李鹏同志的报告。同意对赵紫阳同志的问题继续审查。

(三) 要接受处理胡耀邦同志问题的教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缺乏一贯性，耀邦留在政治局，病故后还要国葬，搞自由化的人闹“平反”，成为动乱的导火线。暴发一场阶级斗争。

赵的问题，性质比胡严重得多。

(四) 赵紫阳同志违背中央的路线，又收罗、保护、重用一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搞成什么所、

什么会。这些赵的“智囊团”，就象林彪的小舰队一样。他们干的事，就是制造舆论，秘密组织、串通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煽动群众，目的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这些人，要除恶务尽，一定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后患无穷。要按照法律，处理反革命暴乱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唯一出路，就是劳动改造，创业赎罪。

（五）要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爱国心。

（六）万里同志讲，不能一风吹。如果意思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不能一风吹，我很赞成。如果意思是，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

[89.6] 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十三

薄一波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1日上午

由于病了九个月，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虽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因为我感到事情不简单。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得很及时，很重要。我首先拥护小平同志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的重要讲话，拥护李鹏同志的报告，完全同意报告中对赵紫阳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结论意见，也赞同这几天会上同志们对赵紫阳同志错误的批评发言。由于身体原因，这些我就不再重复讲了，只是很简单地讲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点，这次平息暴乱，象李鹏同志报告里讲的，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解放军和各方面的同心协力的努力下，暴乱初步平息了。但是暴乱还没有彻底平息，事情还不算已经解决。我觉得形势应该这样估计。那些暴乱

分子，特别是他们的后台，那些煽动、策划、组织和指挥的人，许多都隐蔽起来了。他们并没有停止活动，而是在暗角里搞更精心的策划，伺机准备反扑。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穷追到底，必须下定决心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都挖出来，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只有这样做了，才可以说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严重问题和隐患，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或者比较彻底的解决。我以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且想得愈长一些愈好、愈主动，愈有利于取得这场十分艰巨复杂斗争的全胜。另一方面，要在平息暴乱的斗争中，十分重视和抓紧继续深入了解情况，务必把他们的阴谋组织、策划暴乱的过程，以及重大事件和核心人物等等，彻底摸清楚。只有情况明了，才能决心大，才能做到彻底解决问题。

第二点，必须两手抓。小平同志在几次讲话中都非常之强调这一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点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国建国之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从今以后，一定要大力宣传和真正做到把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到党、政、军、民、学的各项工作中去。四项基本原则跟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等各项工作不是两张皮，每项工作

都应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总的指导下进行。这样工作才能搞得更好，搞得顺利，才会不走偏方向。

必须使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团结在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旗帜下面。必须使这些原则深深扎在每个党员和全国人民心中。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所以能够独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十年来我们国家的声誉所以能够大大提高，人民群众所以积极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我们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任何时候也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过去毛主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仍然要在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要实行专政。专政就有专政的工具，这不是口头上说说，或者摆到那个地方看看的，而是要去用的。比如对反革命暴乱分子，就要采取专政手段。对他们坚决实行专政，绝不能心慈手软。还有，共产党的领导，永远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中国。这是公认的。我们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绝不能丝毫放弃领导责任。

第三点，这次会议和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要统一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政策上来。政治上必须是非分明，把事情的本质弄清楚。还必须有组织保证，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团结一致、坚强有力的好的领导班子。这次十三届四中全会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召开的，一定要把它开好，也一定能够开好。它的意义不亚于党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我不是说内容性质问题一样，而是说都是在关键性的时刻，解决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的。是不是这样，请同志们深思。

第四点，我想，这次全会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能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支持。但可能不会一下子就全部做到，还要继续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小平同志说，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集体是毛刘周朱任，后来是毛刘周朱陈邓。第二代的领导集体是三中全会建立起来的，核心是小平同志，还有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小平同志历史地叙述和分析了这个过程。现在是第三代。我同意李鹏同志讲的今后几项重要工作，要认真抓起来，把它做好。但做

好这些很不容易。中央常委一定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中央常委也要树立起核心，但仅仅中央的领导集体，我们今天在坐的同志动员起来还不够，从中央部门到省、地、县、乡、村，各级领导班子，都要一齐动员起来，支持中央的工作。在胡耀邦同志的问题上检讨过一次，今天在赵紫阳同志的问题上又检讨了一次，难道还能够再来一次吗？我觉得，历史不会再允许这么做了，没有那个可能了。一定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把工作做好。也请同志们深思。

就讲这么几点，言不尽意。有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89.6]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之十四

宋任穷同志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0日上午

我完全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乔石、启立、依林同志和他本人所作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赵紫阳同志在担任国务院总理、代总书记和总书记期间，在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发表过许多好的意见，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经济工作方面，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他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方针。我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和其他同志面前都讲过他的好话。我认为，中顾委对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整体，对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一直是真心诚意地支持的。

(一)

自从紫阳同志任总书记以后，我们感到他有变化，或者说有很大的变化。中顾委不少同志对他有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比较尖锐，如作为党的总书记很少过问党的建设，不重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并涉及到他重用哪些人的问题等。我们通过正常渠道向他反映，但他不大听得进去，有时显得不耐烦。对中顾委有些同志提的比较尖锐的意见送也不是，不送也不是，这就使得中顾委的工作很难做，一波同志是常务副主任，我观察到他也感到为难，似乎中顾委在那里碍手碍脚。这样，中顾委只有少讲话，保留发言权。

党章第二十二條規定：“在中央政治局認為必要的時候，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也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有一次，我見到喬石同志，對他說，根據黨章規定，可否半年甚至一年請中顧委常委的同志列席一次政治局會議。（耀邦同志任總書記期間，每次政治局會議都請中顧委常委列席，這種做法也未必妥當）喬石同志後來告訴我，他提了多次，接着便搖搖頭，意思是未被採納。十

二大制定的党章是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的，十三大又通过了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可以说，党章的每一条都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都必须严格执行。紫阳同志是个很精明的人，不会不注意到党章中“必要的时候”这个提法，为什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不请中顾委常委列席一次政治局会议呢？难道这么长的时间里就没有一次“必要的时候”吗？紫阳同志对这种违反党章的做法作何解释呢？

一九八八年九月，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会前中顾委的老同志其中包括好几位中顾委常委建议紫阳同志在讲话中对前一段经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多承担一点责任，多作一点自我批评，便于各部门各地区的同志更好工作，同时也会提高中央的威信。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出自善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了。紫阳同志讲话的原稿中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中曾经提到的“见事迟，抓得晚”也不提了。我建议除恢复这个提法外，再多讲几句自我批评的话。以后修改文件时，紫阳同志只加上这六个字，没有接受中顾委同志的建议，不愿多作一点自我批评。

提交十三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初稿中用的是“改造”。许多同志特别是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干部不同意这样提。他们说，对其他工作都用“改进”、“改善”、“改革”，为什么偏偏对思想政治工作要用“改造”？中央的同志征求王震、一波和我的意见，我们三个人也都认为不用“改造”的提法为好。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是《通知》中有了这样一句话：“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改造’、‘改革’”，目的都是为了更有力、更有效地得到加强。”我同紫阳同志讲，这是他有意要在《通知》中保留一个“改造”，以此说明用“改造”的提法并没有错。以上几个例子，说明紫阳同志是很难听得进不同意见的。

中顾委的老同志反映了解情况少。为了使大家多知道一些情况，我们除了向中央请求增发一部分文件外，今年还请王蒙、李铁映、阎明复、吴学谦、乔石同志作关于文化、教育、统战、外交和政法等方面的报告。我们用这种办法，沟通同中央的联系，以便中顾委能够更好地支持中央的工作。

中顾委的老同志在学习讨论中或者通过调查研究经

向中央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一波同志和我商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选择其中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以《送阅件》的形式，不定期地向中央反映，供中央参考。截止五月底，已报送39期。其中37、38、39期都是就讨论动乱问题的发言所整理的，我想紫阳同志都看到了吧。

我举上述两项，主要是想说明，尽管紫阳同志对中顾委采取了与党章不相符的态度，不重视中顾委老同志提的意见和建议，中顾委的同志们对于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还是尽力支持的。

(二)

紫阳同志在制止动乱的问题上，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紫阳同志访朝回国后，便否定他曾经表示“完全同意”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和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于五月四日会见亚行会议代表时，未同其他政治局常委同志商量，发表了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讲话。我们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允许的，经过一段时间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也是允许的，这些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并且允许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任何一

个党员，包括党的总书记，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服从和执行集体作出的决议。紫阳同志的这个谈话，第一次把中央内部的分歧暴露在群众面前，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许多同志包括学生干部茫然不知所措。极少数人便趁机再次进行煽动，使得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经过各方面大量的工作即将平息的局面又迅速恶化，并进一步波及到外地。这一段时间，我在兰州、银川、包头。起初，这几个城市都比较平静，紫阳同志这次谈话后，在北京动乱的影响下，这些地方也开始闹起来。由于紫阳同志的特殊身份，又由于他通过中央新闻媒介在全国亮了相，在全国造成影响，实际上紫阳同志起到了方励之等人所起不了的作用。

在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达到高潮的关键时刻，紫阳同志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中，有意选择前五分钟向全国电视转播这个时间，把小平同志推了出来。此后，社会上出现大量攻击小平同志的口号和谣言，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小平同志。造成如此严重的政治后果，紫阳同志要负重大的责任。紫阳同志的这种做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形成了尖锐

的意见分歧，表决结果为三比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不论自己的思想通还是不通，组织上必须服从。但是，紫阳同志违反了原则，经一再劝说，仍拒绝主持和参加五月十九日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他拒绝到会的行动，把中央领导核心内部的分歧完全暴露在群众面前。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赵紫阳同志强调要“风雨同舟，同舟共济”。可是，赵紫阳同志在我们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为什么不同中央常委这个舟，不同中央政治局这个舟，不同中央委员会这个舟，不同党这个舟？作为党的总书记，由于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常委会所采纳，就可以不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并以这种行动公开中央内部的分歧，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大家知道，毛主席曾经被开除过党籍，他不能当党代表，只能当师长，我们叫他毛师长。当时，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在组织上还是服从了这个错误的决定。现在的情况正相反，实践证明中央决定是正确的。紫阳同志的主张是错误的，而紫阳同志却采取了与当年毛主席完全不同的态

度。紫阳同志是一位有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于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却在党和国家的处境很困难的关键时刻，居然完全不顾党的利益，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紫阳同志的这个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三)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总结现在，看到未来。这样做，都是为着更好地建设未来。问题很多，我在这里提三点建议：

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个问题，前两任总书记都没有解决好。要全党统一认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党的威信得到进一步提高。我们是执政党，只有把党搞好，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有希望。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青少年的思想工作。杜勒斯在四十年前讲过，把在中国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现在，一部分青年人的思想政治状况令人担忧，我们决不能让杜勒斯的话应验。在这次动

中，紫阳同志似乎是很关心、爱护青年的样子。而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强调改革、开放，很少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很少讲革命的优良传统，很少讲艰苦奋斗，很少讲抵制资本主义思想，这就必然对青年产生消极的影响，不能引导他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成长。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关心和爱护青年的。今后，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只是发通知，通过决议，而要有行动，有措施，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来搞。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青少年是一定能够培养好的。对青少年的教育，重要的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我们的行动。

三、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建设要有制度上的保证，要从中央做起。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进行一些调整。我完全相信，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一定能在这方面做出好的榜样。在党内，要健全生活会制度，加强党内民主，加强铁的纪律，坚持集体领导。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十七

楊尚昆同志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1989年6月21日

我完全同意李鵬同志在政治局擴大會上的報告。我完全同意對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所犯錯誤作出的組織處理，及對他的問題繼續審查的決定。

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動亂所犯錯誤的事實經過和造成的嚴重後果，我在五月二十二日同人大幾位副委員長的座談中，在五月二十四日的軍委緊急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已經作了充分地說明。這些講話都作為內部材料印发了。由於時間關係，我不重複讲了。

從學潮到動亂，又發展成暴亂，原因很多。主要是長期忽視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黨的組織作用渙散的結果。鑑於兩屆總書記都在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上犯了嚴重錯誤，特別是這一次，在生死存亡的緊急時

刻，不得已作组织调整，造成了极大损失，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回想起来，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常委并没有形成核心。赵紫阳同志是知道其他几位常委有许多意见的，他只召开了一次生活会，对大家提的意见，他听不进去，也不作认真地自我批评。反而对其他同志远而处之，自己独断专行，使中央常委工作，实际处于只有具体分工，而没有集体领导的状态，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的最高组织原则。赵紫阳同志同党的集体越走越远，与他这方面的错误是分不开的。

我希望新的中央常委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善于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和帮助，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使党的领导集体始终保持团结、统一和稳定。只有这样，全党才会更加坚强，国家就会更加安定，改革开放就会搞得更好。

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对于今后的工作都提出了许多意见，新的中央领导应切实抓紧落实。

[89.6]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之十八

万里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6月20日上午

我完全同意李鹏同志代表几位常委作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这个报告只讲了赵紫阳同志在动乱当中所犯的 error，他的其它错误还相当多，以后还要大家帮助紫阳同志清理，便于他改正，便于他提高。这只是他错误的重要的一部分。我完全同意撤销赵紫阳同志的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至于他担负的国家军委副主席，我们准备在最近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依法予以撤销。

刚才学谦同志讲了关于我去不去访美、是否提前回国的一些事情，我在这里再简单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情况。我于五月中旬出访加拿大、美国，出访前，动乱就已发生，出访后动乱有了大的发展。所以沿途对方就同我谈两大问

题，一个是中苏会谈，一个是北京的动乱。中苏会谈有一个通报口径，动乱的问题，我带着人民日报26日社论。我是按照这些口径来答复的，至于对方满意不满意，我就不管了。我向对方说明我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争取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对内需要有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符合这些，就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我就这个口径。5月19日北京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和尚昆同志讲话，紫阳同志没有参加，这在国外引起了种种议论和猜测。我当时得不到国内的正式信息，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大会赵紫阳同志不参加？我感觉到这是个大事情。因为我还要代表总书记赵紫阳问候人家，这就使我很为难了。在多伦多我发表了一篇讲话，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宣布在局部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宪法的。随后就有一些华人、华侨、留学生向我示威。在这时接到一个电报，就是人大常委党组经赵紫阳同志同意发来的，要我立即中止访问，马上从多伦多回国。当时我想，我已到美国的门口，不去访美对中美关系不利啊。我估计到这个电报里面可能有问题，就准备马上给中央发个电报再请示一下，这封电报还

没有发出，李鹏、乔石、依林同志就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给我发来了电报，说为照顾中美关系，还必须继续访问美国。我当然服从这个电报了。中央的这个电报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刚刚结束对我国的访问，美国领导人很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和中苏会谈的情况。到美国的当天，奎尔副总统和贝克国务卿就分别同我会见和会谈，第二天，众院两党领袖同我在早餐会上见面，下午布什总统同我会见，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很关心我们国内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国内发生动乱的背景、政府依法实行戒严的必要性和我国将继续奉行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完成了访美的主要任务后，我感觉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继续访问很困难了，因为在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我就遇到两大批向我们示威的人，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在我将去访问的几个地方，当地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都已准备好了要举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美国已经没有工作条件了。加之这以后的日程主要就是接受博士学位和参观游览，于是我就下决心，就说身体不好，需要回国休息，先给美方打了个招呼。美方表示谅解和同意。这样我就回来了。因为对国内情况不明，我决定到上海停几天，一方面休息一

下，一方面了解了解国内的情况。这时候李鹏同志发来了中央代我拟写的书面谈话稿，我做了些修改后发表了，听说发表后平息了一些风波。我以上说的主要是我在国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当时国内的复杂情况我是在回国后才知道的。方才吴学谦同志讲到这个问题，我也在这里把情况向大家做个汇报。

第三个问题，我希望紫阳同志这一次能够在认真考虑自己错误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我认为紫阳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很不够的。在当总书记以后，他的个人主义、权欲思想恶性膨胀，恶性发展。几位同志所举的例子，李鹏同志所举的例子，都是普通党员应该遵守的规矩。我再举一个例子。去年十二月，紫阳同志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我开始认为他大概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所以及时召开一次生活会。既然是生活会，当然主要应该对紫阳同志这一段工作提出建议，提出意见，提出批评。不料他讲了一篇开场白，根本不是要求大家如何对他进行批评。后来李鹏同志很委婉地把几个重大问题都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江泽民同志讲了一下，田纪云同志讲了一下。原来我也准备讲一讲，尚昆同志大概也要讲一讲，因为时间

不够，就散会了。我认为，召开生活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应该把当总书记以来这一段工作检查一下，由大家来提提意见，批评帮助一下。这是加强民主集中制，自己也吸取别人意见，改进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很赞成开这个会。但我没估计到，李鹏同志和其他同志提了意见之后，紫阳同志却一句话不吭，连一句欢迎的话都没有。他不光不吭，更坏的是，他接着就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李鹏同志和其他同志对他的意见。汇报之后，他一回来就接着又召开所有参加政治局生活会的人，大讲一通小平同志怎么支持他。我特别不同意的是，他居然向小平同志汇报了新权威主义，而且说小平同志同意。你们听清了没有？是不是这样的？（乔石同志：是这样的。）是这样吧？说小平同志同意，是吧。（乔石同志：他说，我赞成。）他传达的。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用小平同志来压制民主吗？压制大家对他的意见吗？这样一种做法，在党内我还没有碰到过。我在党内五十几年，没有碰到过这种作法。李鹏同志，是小平同志找你呀还是你找小平同志？（李鹏同志：我找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支持了李鹏同志，也对李鹏同志有所表扬。但李鹏同志回来以后，先问紫阳同志传达不传

达。紫阳同志怎么说呢？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不召集会议传达，只对李鹏同志说，你给个别常委谈谈吧。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子做的。从这一件事情上，加上他亚行的谈话，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他对小平同志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自己有领袖欲？是不是真心拥护小平同志？不是值得大家深思吗？希望紫阳同志从个人的德性上，党性上，认真反省反省这个问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党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权欲、领袖欲，作为一个主要领导人，如果有了这个东西，危害极大，对党的危害极大。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建议，今后的常委主要负责同志，将来是江泽民同志了，如何认真地始终不渝地把小平同志的三次有重要意义的讲话贯彻到底，毫不打折扣。三次讲话，一次是接见部队，已经普遍传达了。一次是找李鹏同志、姚依林同志的谈话，谈得非常恳切。最后一次，接见我们几位同志，谈得又非常深刻，不光谈了当前的问题，还谈了今后的问题，以至几十年的问题，最后还和我们几个照了像。他说我是正式交待，交待给你们这第三代

导。语重心长啊，我是非常感动的。如何按照实际情
，在我们的工作中，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小平同志这三次
要讲话。三次重要讲话实际上是一个精神，就是新的领
班子，今后的政治局，今后的常委怎么样抓好工作的问
，先抓什么，后抓什么，都讲得非常具体。大家将来都
学习。特别要强调的是，坚决贯彻群众路线，执行民主
中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改革开放中、在一切工作
政治局的同志各方面都要带头，通过我们的工作，把
事变成好事，使得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
更快，使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进一步发展。因为
司关系，我就只讲这些吧。还有些意见以后再讲。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十九

江澤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0日下午

我完全同意李鵬同志代表喬石、依林、啟立和他本人所作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完全同意昨天以來幾位老同志的發言。

近兩個月來，為了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的決策和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完全擁護。

這次會議的主題，李鵬同志在報告中已指出，主要是討論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並相應作出組織處理。今天要求發言的同志很多，時間有限，我只就在上海接觸到的一些事情講點意見。

小平同志六月九日的重要講話非常精辟地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事態的發展，已經

证明了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正因为有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健在，正因为我们有一支英勇的人民子弟兵，我们党才能很快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否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对这点感受是很深的。

去年年底以来，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在上海有所嗅觉。但当时我们没有提到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高度来认识。上海有一个《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这个刊物的错误，由来已久。耀邦同志逝世后，它出了一个第439期，借悼念为名，大肆宣扬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反自由化翻案，把矛头对准党中央。这及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并果断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市委委托汪道涵同志（导报名誉理事长）找钦本立同志谈话。钦直言不讳地承认，出这一期报纸的目的，就是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公开检讨。汪当即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当时的印象是，钦似乎有恃无恐。市委没有迁就、退让，而是停止了钦本立的党组成员、总编辑职务，派进了整顿工作组。结果，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吹捧钦本立，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什么“遗憾”。四月二十六日，市委召开一万

四千名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学习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我在讲话中说，用国外舆论来压制中国人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时全场鼓掌，说明我们的党是有力量的。

对《世界经济导报》的上述处理，是一场维护党的宣传纪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市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也很希望得到紫阳同志的支持。但是，紫阳同志的态度，使我们很失望。五月十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我找到紫阳同志，向他谈起钦本立的处理问题。当场，紫阳同志冒很大的火，推说他不管此事。我坚持要谈，约好第二天谈。第二天的谈话的气氛虽然缓和一点，但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我印象很深的是：紫阳同志说，我不给你们压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有人问起我，我就说不知道。在谈话过程中，紫阳同志提出让钦本立作个检讨，先恢复他的职务，然后再做处理，我说，这样他们就会高呼胜利了。我还指出，现在枪杆子在我们党的手里，笔杆子可不都在我们党的手里，如果让钦本立复职，很可能导致新闻战线的全线崩溃。当时，我心里想，作为总书记怎么能说出那种话呢。下级向上级请示工作，总应该以诚相待嘛，不能采取资产阶级政客的态度。

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发生，在我们国内一个深刻的根源

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从七九年 to 八九年，小平同志多次提到要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但是，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事实上没有得到贯彻落实。耀邦同志犯了支持自由化的错误，批评他，紫阳同志是来劲的。但批过后，紫阳同志在支持自由化的道路上滑得更远。他以批僵化为名，使自由化思潮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在这方面，紫阳同志作为总书记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通过这次学潮，要很好的反思一下我们的学校教育问题。我们究竟是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还是掘墓人。小平同志讲十年最大失误在教育，这应当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这决不是增加一些经费的问题，关键应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紫阳同志曾经批评耀邦同志不抓党的建设，但他对党的建设，更是没有抓好。一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在许多同志的要求下，不得不讲了一些话。紫阳同志当过多年的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为什么对抓党的建设不感兴趣呢，这是引人深思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占领阵地。这个道理，我觉得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下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观察处理问题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在这一点上，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最近《参考要闻》登了一条消息：当记者问到1969年里根在任加利福尼亚州长时镇压加州大学学生示威一事时，里根表示这同中国的镇压完全不同，当时示威的是左翼学生，而且他有情报证明共产党在那次示威中扮演了角色。你看，在美国，左派学生造反，政府就派兵镇压，美国政府的资产阶级立场何等强硬。在我国，制造和策动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就有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迹象表明美国及港台是有人插了手的，中国政府采取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方针，有什么不对呢？紫阳同志不赞成和反对中央正确的方针，难道不应当从自己站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来思考一下自己的问题吗？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二十

宋平同志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1989年6月20日

(一)

我完全擁護李鵬同志代表政治局四位常委所作的報告，擁護小平同志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擁護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處理這次全國性動亂和平息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的正確決策。

最近兩個月來發生的事件，是一場惊心动魄的嚴重鬥爭。雖然他們的口號不斷變化，鬥爭方式不斷翻新，但其真實的目的在于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共和國。在嚴峻的形勢下，中央如果不採取斷然措施平息暴亂，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和改革開放的成果將會斷送，幾千萬先烈犧牲奮鬥得來的成果將要毀於一

旦。

在这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常委的多数同志，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对复杂的局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特别应当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同志，包括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王震等同志，再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若不然，将困难得多，后果难以设想。

(二)

我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在报告中关于赵紫阳同志错误性质和他在这场动乱所负责任的分析。赵紫阳同志采取的错误立场和方针，起了纵容和支持动乱的恶劣作用，使事态愈演愈烈，发展成反革命暴乱。

赵紫阳同志为什么会采取这么一种错误的政治立场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对这场动乱的性质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五月六日上午，赵紫阳同志在同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这次学潮，“表层上是反贪污、反官倒，要民主。实际上，不少研究生，担心经济上的收缩会导致政治上的改革停顿，甚至走回头路。我看，

深层的原因是这个”。这个谈话，说明了紫阳同志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态度。按照他的这个观点，这次学潮不仅不是什么动乱，而是一次支持改革的民主运动。因此，他坚持要从《人民日报》4·26社论的立场上倒退就毫不奇怪了。

这里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所谓中国要“走回头路”是怎么回事？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为了落实这一方针，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不少切实的步骤，包括压缩基建投资，控制消费，紧缩信贷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物价涨势趋缓的效果。有些人就喊叫了，说中国要走“回头路”了。他们到处开会，写文章，发表谈话，谎造中国要倒退，赵紫阳地位不稳的舆论，在海内外广为流传，香港报刊甚至鼓噪“倒邓保赵”。曾参与鲍彤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严家其，去年十二月就在报上发表《关于时局的对话》，煽动说：“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改革成果面临断送，面临复旧势力卷土重来。”大谈什么不容许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中国不容出现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滞。”从这篇谈话不难看出，这些人在关心什么？为什么一个时

期以来，严家其这些人又是签名，又是演讲，又是发呼吁，那么积极地策划和煽动这次动乱；也不难看出，严家其等人的这些观点，同赵紫阳同志讲的“担心”有着什么联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赵紫阳同志是在用反倒退的名义搞分裂，借用群众运动的压力实现一个政治目的。

(三)

赵紫阳同志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放纵、支持，致使这些人占据了大量的舆论阵地，到处传播自由化观点。其中有的人成了这场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赵紫阳同志接替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并没有吸取胡耀邦同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教训，相反还有发展。他虽然在十三大报告中，讲了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实际上他并不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1987年5月就说过：“我还是说这个话，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是根本不应发生的，是可以避免的问题。这完全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失误造成的。现在我们态度一明

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的这种态度，使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和纵容，而那些站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前列的同志遭了殃。近一年多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更猛的势头泛滥，终于导致了这次严重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果真象他说的那么容易解决吗？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上有同志说，这是一根棍子，不要提。小平同志讲了话，决议还是写上了。最近，小平同志说，现在越来越看这是个要害。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一些人崇拜资产阶级民主，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发表《私有制宣言》，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一些青年学生不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不多，爱国主义也不多了。他们最爱听《美国之音》，说什么信什么，对自己国家的一切都看不起。这种思想在这次学潮中充分地表露出来。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千方百计逼迫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垄断资本的统治轨道。匈牙利、波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次中国学潮中，美国多方插手，“美国之音”天天造谣、煽动，唯恐中国不乱。对我们

平息暴乱，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华浪潮，企图压我们就范。但是，中国共产党不信邪，不吃他这一套，坚决顶住了这股潮流，旗帜鲜明地干我们自己的事业。中国就是顶住这股逆流的中流砥柱。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只能蜕变为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中国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小平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它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这也是这次反革命暴乱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千万不能忘记。

(四)

这次反革命暴乱的发生，也是长期以来忽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

赵紫阳同志在国务院工作时就不重视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主持中央工作后仍然不重视，使党的工作不断削弱，下面的同志意见很多，特别是企业和高等院校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有的说，“下级看上级，全党看中央，中央看紫阳”。我们也多次向他反映。后来他也抓了几次，但很勉强。请他在全国党员教育会议上讲话，开始不想

讲，后来勉强答应了，会上开头就说，叫他讲话是“打鸭子上架”。

紫阳同志做工作，不大依靠党的组织。这次学潮，主要发生在北京，北京市委处在第一线，工作非常艰苦。听锡铭同志说，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根本不找不问他们。他只找自己熟悉的一些智囊人物，也不同常委其他同志商量，就作出重大决断，发表了在亚行会上的讲话，使高等院校的党团组织、按中央精神做工作的积极分子陷于迷惘，感到“被出卖了”，使整个事态严重恶化，成为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领导人，智囊是需要的，但要慎重选择，要选那些忠诚党的事业，有实践经验，有真才实学的人，也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今年三月召开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有的政协委员就公开提出要科学决策，慎选智囊人物的意见，提醒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能轻信那些马克思主义修养很差，专业知识不坚实，又不甚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套用西方理论提出的浅薄主张。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

党的工作要加强，要改进，但我不赞成赵紫阳同志在纪念“五·四”大会上“改造党”的提法。以前提出“改

造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引起一场混乱，又提出“改造党”，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建议他修改一下，但是听不进去。

(五)

两点建议：

第一，党和国家的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而不能掌握在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或者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姑息迁就的人手中。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始终坚持“两手抓”。需要指出，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混为一谈，也不能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改革开放混为一谈，以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妨碍改革开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是教条主义的、僵化的，也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第二，这次动乱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证明我们党脱离群众的问题相当严重，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我们应当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真正使全党振奋起来，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恢复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提高

黨員的素質，增強黨的戰鬥力。要堅決反對腐敗、官倒，切切實實做些得民心的事情。要下決心對我們各級黨的組織，從思想上到組織上進行一次認真的整頓，清除黨內的腐敗分子和反黨分子，純潔黨的隊伍，真正把我們黨建設好。這樣，壞事就一定會變成好事。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二十一

李瑞環同志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0日下午

作一個簡短的發言。

一、我完全同意李鵬同志的報告。我認為，這個報告充分體現了小平同志最近重要講話的精神，也完全符合反對動亂、平息暴亂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我相信，這個報告對於進一步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取得這場鬥爭的徹底勝利，必將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這個時期，我一直在天津工作，對動亂過程中上邊的一些情況不太了解。但我們在下邊確有這樣一個感覺，中央對於處理這次動亂的意見不一致，有分歧。特別是趙紫陽同志5月4日亞行談話之後，這種感覺就更加明顯。本來在4月26號人民日報社論之後，我們各級領導、廣大共產黨員和各類骨幹精神為之一振，覺得有了武器、有了底氣，工作馬上就活躍

起来，并很快地见到了效果，学生闹事的劲头趋于缓和。但5月4号紫阳同志亚行讲话之后，骤然发生了变化，学生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而广大基层的同志，党委的同志，党员和学生中的骨干，普遍感到不知所措，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天津大学的领导找我说，中央两种声音，我们无所适从；现在有人装好人，把我们装进去了，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和江泽民同志通过电话，说上边调子不一样，下边怎么办？老江说，我们现在成了“独立大队”了。这段时间，我们在下边工作真是有苦难言。亲身感受到在重大关头赵紫阳同志搞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这件事情不管紫阳同志怎么说、怎么看，这是客观事实。

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深深感到，这几年紫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确确实实是削弱了党的工作，涣散了党的组织，压制了政工干部，否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我实在地讲，下边许许多多的基层干部谈到这个问题，十分之焦虑，有的十分恼火。有些人指名道姓地讲，“不是讲思想政治工作要改造吗？叫赵紫阳给我改造一下看看”。关于紫阳同志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重视党的

建设的问题，我曾经多次向紫阳同志提过意见。会上我也发表过几次看法，在座有些同志也可能还记得。例如，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讲了六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叫要加强政治观念，注意从政治上看问题；第二是要发挥政治优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后来，政治局会议讨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决定，就在这个屋子，很多人今天还在啊。决定中有个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原文是“改造和加强”。我先提第一个意见，建议把“加强”搁在前面，我讲现在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是个要不要的问题，其次才是怎么办的问题。第二，我讲“改造”这两个字是不合适的，这样就否认了党的政治工作的传统，伤害了广大的政工干部。紫阳同志当时很不冷静，说你李瑞环多次给政工干部说好话，老实讲我不以为然。当时会上空气非常紧张。这既表现了紫阳同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忽视，思想深处的毛病，也表现了非常的霸道。类似这种否认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党的组织的作法，党的基层干部很反感。有的同志给我讲过这样的话，过去说有些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总觉得没有那么容易，现在眼看着党组织一天一天散下来，政治工作一天

一天弱下来。真是用那个“淡化”，淡来淡去淡得快没有影了。这件事情，在全党里面，特别是在基层、在政工干部、在老党员中，是有公愤的。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各种各样的不良风气，“一切向钱看”，不讲理想、不讲道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承认，是这几年削弱党的领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所造成的恶果。

三、紫阳同志民主作风很差。我记得，先念同志从天津路过，我到车站看他。我说我年轻时受的是党的正统教育，在我脑子里想，越往上边越按党的规矩办事。可是，参加政治局工作以后，紫阳同志根本不让人讲话。我实在地讲，两年来，政治局会议正经八北地让大家讲讲意见有几次？每次来京一般是开半天的会，老江我们都有感觉，一开会，一大摞文件，一大篇讲话，讲完了十一点多，还讨论什么？5月10号政治局开会，有的同志认为应该讨论平息动乱问题，这是面临的最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但是，议题只安排了中苏关系。会前大家议论纷纷，我说会上也不会不提。我猜，会上可能先谈别的，谈的差不多，到十一点钟，紫阳同志该开讲学生问题，讲完了到点，你

说没讨论吗也讨论了，说讨论了，你也没有时间说话就走人。我猜的时间不太准，十一点十分紫阳同志开讲。他先讲，我向同志们通报一下8号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情况，讲了所谓后来传的那几条意见，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问题。通报以后，李鹏同志说，你这个话常委并没有讨论，我们还没发表意见，这是你的意见。我才想到，原来开常委会赵紫阳同志也是这样。紫阳同志很难听取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我讲一件事，在座很多同志都是见证人。全国人代会讨论《企业法》，里面有一个民兵和共青团的事。天津警备区的同志提出在《企业法》里应写上民兵两个字。我说不提民兵，军队就不好到工厂抓民兵建设。我就找军队的同志，军队的同志说，我们跟你一样的看法。我好象给尚昆同志也说过这个民兵的事。还有，团中央的同志也找我，说《企业法》得有个共青团的字样，党政工团嘛。我想这个也有理，写上共青团三个字，也好嘛，企业里百分之七十的是青年嘛。这两个意见我在人大主席团会上提过，我说怎么就不可以添上呢？党政工团，添个“青年团”三字怕什么？结果这两个意见都没接受。有人告诉我，紫阳同志说就这样子了。我说怎么可以一个人这么权威呢！

再有，紫阳同志自我批评精神很差，不承担责任，文过饰非，毛病太大。比如，前几年紫阳同志一直认为我把问题看得严重，消极面看得过大。这是紫阳同志对我的印象，也说过这样的话。去年出现的经济问题，毫无疑问是几年来积下的问题，绝不只是去年的事。实实在在地讲，好几年前就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紫阳同志应该有个自我批评。在今年人代会开完以后，留下省市市长、省市委书记开会，李鹏同志和依林同志讲话。我就想，这回紫阳同志总是要作点自我批评，这是一次好机会，李鹏同志在人代会上讲了，小平同志给外国人讲了，紫阳同志好说话了。但整个过程中他没有作自我批评，把整个问题归结为两条。一条在时间上是去年；第二条归结为宣传。我觉得，这是不全面的，实在是太不公道。所以，我觉得他民主作风很差。下边普遍感觉他没有对这几年的失误承担责任。

四、当前反对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要取得彻底胜利还有一段过程。我们一定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反对动乱和平息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时我也建议，从这件事情，中央特别是政治局，要认真地总结前段工作的经验。总结坚持四项基本原

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坚持改革开放的经验。我总觉得，在我们党内，关于是不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没有真正地扎根。必须逐步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这样一个自觉的精神，就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切重大的行为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要强调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要明确，我们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当其他国家的附庸。我认为，这几年紫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很大的偏差。他的新词、新话特多，记不住，弄不懂，老是变来变去一个、变来变去一个。而不是共产党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民族习惯历史文化相结合产生一整套的语言和表述的方式。毛主席所概括出来的、我们党长期历史所形成的一套东西，必须坚持。当然要结合新的情况有所发展。这个发展必须在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而不是随意瞎变。这次动乱毫无疑问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我们的失误，使我们的事业前进得更稳、更好、更快。现在，全国人民看着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次事件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改正错误，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能够真正提高一步。

我认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我就作这个简短的发言，完了。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二十二

胡啟立同志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0日下午

我表個態，講三點意見。

（一）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發表的重要講話。這個講話高屋建瓴、精辟透徹，深刻分析了這場反革命暴亂產生的原因、性質和中央採取措施的正确性。小平同志的講話不僅對當前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奪取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而且指明了今後國家改革和建設的前進方向。這是小平同志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對黨的事業作出的新的偉大貢獻。我要繼續學習，深入領會。

（二）李鵬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報告，指出了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錯誤，並提出了相應的組織處理意見。這是為了進一步平息動亂，穩定局勢，

健全党的领导所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李鹏同志的报告代表了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紫阳同志很少作自我批评，我也有同感，我觉得他有时还诿过于人。例如关于通货膨胀，提款抢购问题。谁都知道通货膨胀早在紫阳同志担任总理时就开始形成。但他在今年四月十九日会见美国驻华大使洛德时，却把提款抢购归咎于“因为物价改革还在酝酿时，报纸上就宣传了出去”。紫阳同志这个说法在新闻界了解此事的同志中引起很大反感。大家说，报纸上宣传物价改革，太集中，有缺点，应改正。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提款抢购就是宣传造成的。我举这个例子是希望紫阳同志冷静地想一想，自己究竟是怎样对待功过与批评的。

（三）我自己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也有错误和问题，主要表现是：

1，在五月十七日常委会讨论立即调集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问题时，我说“在几十万群众上街游行的情况下，调动部队，实施戒严，太危险了。”我虽不赞成赵紫阳同志提出的全面撤销 4.26 社论的意见，但却主张让一步，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样

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如平息不了，再采取强硬手段不迟。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在表决时，我表示组织服从，保留意见。会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照常出席了十九日晚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我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

现在，通过学习小平同志六月九日的重要讲话，对照自己当时的思想，深感自己的认识差距很大。我对这场动乱的性质、原因、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总希望让一让，退一步，求得和平解决。担心宣布戒严后矛盾激化，担心出现流血事件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现在看来，我对如何对待群众想的的多，对混在群众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凶残性、疯狂性以及他们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附庸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阴险目的认识不透，估计不足。这反映我的政治水平低，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头脑不清醒，没有经受住考验。作为党的干部，我要继续学习小平同志讲话，进一步提高觉悟，提高认识。

2，在这场动乱中，有一段时间由于我未能掌握正确

的舆论导向，使一些新闻单位迷失方向，也给地方维护安定团结的工作形成了很大压力，增加了困难。

在学潮初期，新闻报导尽管也出了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抓的还是比较紧的。五月六日，赵紫阳同志找我和杏文同志谈话，他说“新闻报导前一段时间控制严了一些，后一段时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十二日，我按照紫阳同志的批示，向首都各大新闻单位主编传达了上的讲话。十三日报纸上发表了我同新闻界对话的消息，突出了“新闻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的本意是想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的领导，但由于我对已经发生的严重动乱形势估计不足，当时，各新闻单位党、政负责人均已受到极大压力、新闻界的思想相当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传达了赵紫阳五月六日谈话精神，又强调新闻改革，实际上是向新闻界烧了一把火，于是出现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一时间给人以错觉，似乎中央也同意各界上街游行，支援学生，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近年来，我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主观上是注意的，也采取

一些措施和步驟。問題是：在對外開放和社會經濟條件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下，如何把四項原則的宣傳教育真落到实处，有效地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衝擊、發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一直沒有找到有效的途徑，在這動亂的關鍵時刻又未能正確把握輿論導向。對此，我深自己的工作沒有作好，有負黨的委託，願接受黨組織的評、審查和處理。

我完全擁護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成員進行必要整。並堅決支持新的領導班子的工作。我相信新的領導心一定能系統吸取過去工作的經驗教訓，更好地貫徹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團結全黨，服一切困難，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推向前進！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二十三

芮杏文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1989年6月21日

我完全拥护小平同志六月九日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以老一辈革命家的远见卓识，科学、精辟地指出了首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和根源，以及党中央采取的措施的正确性，同时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总结了过去，展望了未来，是个指导性的纲领性的讲话。我坚决拥护，并以此来武装思想，统一认识，明辨是非。

我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并代表乔石、启立、依林同志所作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同志在这场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对他作出必要的组织处理，并对党中央的人事作相应调整、是完全正确的，我衷心拥护。

现在我就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和我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紫阳同志身为党的总书记，在党和国家危急的关键时刻，不听中央多数常委和小平同志等老同志的帮助、规劝，一意孤行，把党内矛盾暴露在外，甚至甩手不干，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使局势急剧恶化，增加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害。

紫阳同志这方面的错误事实，李鹏、尚昆、乔石、依林同志已在五月二十二日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这次会上李鹏同志的报告又作了详细的阐述。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

紫阳同志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我觉得同他这几年个人主义的发展膨胀有关系，没有摆正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小平同志的关系。尽管在一中全会上他提出，并经全会通过，一些重大问题要请教小平同志，并用全会的名义请求小平同志接受这个意见。我记得，他还有一些其他场合说过，他对小平同志说，他只是一个秘书长。但是这次在危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却拒不听从小平同志的

意見和中央多數常委的意見。在黨內意見嚴重分歧的緊急關頭，幸好小平同志等老同志和其他常委及時採取果斷措施，維護了黨的團結和統一，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

二、五月二十日前的一段時間內，輿論嚴重失控，出現了錯誤導向。這和紫陽同志五月六日的一次談話有直接關係。這次談話是他找啟立同志和我去的。他既沒有要我們匯報情況，也沒有征求我們的意見，直接就當時的新聞輿論工作提出了意見。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個焦點。”還說：“這一段時間內，新聞報道實際上已有了很大突破，可以據此總結一些經驗。……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在同一次談話中，紫陽同志還在談到這次學潮的原因和性質時說：“表層上是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實際上，不少研究生，擔心經濟上收縮會導致政治上的改革停頓，甚至走回頭路。我看，深層的原因是這個。”

按照紫陽同志的批示，這個談話五月十二日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會上作了傳達。在當時首都各新聞單位一千多人簽名，並派代表遊行請願，要求新聞自由，放寬控制，

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紫阳同志的这次谈话，就给新闻单位负责人松了绑，使新闻宣传决了口，舆论失控越来越严重，直至完全失控，对动乱的升级和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启立同志主持了这次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让我在会上传达了紫阳同志的这次谈话。我是负有责任的，我觉得很痛心。

三、李鹏同志在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紫阳同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在工作的接触中多有同感。记得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他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是两种倾向都要反对，长期来讲，从根本来讲，修正僵化是长期的，因为改革开放是长期的。……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对自由化的问题也不能低估，要随时加以注意……就是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成为突出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但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模糊长期总的方向。”这就清楚地看出，他在指导思想，没有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长期、一项的重要任务来抓。小平同志说：“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

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这是对紫阳同志上述错误思想的有力批评。

今年初，我和启立同志向他汇报思想战线的严重形势时，说到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现在很活跃，说什么二十世纪的两大遗产，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失败，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什么发扬“五·四”精神，在当前中国就是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等等，而且通过讲演、沙龙、论坛等方式散布这种思想，加之西方情报机关的渗透蛊惑，受东欧出现的一些问题的“鼓励”，这些人跃跃欲试，很有闹事的苗头，现在他们主要是以要求新闻自由和民间办报为突破口，再逐渐发展成为搞反对党。这时，紫阳同志也说过，看来他们搞个反对党，可以有一个小班底了。事后，他也找过中联部专门谈东欧的情况，又成立了一个“社情小组”。但是，在自由化思潮已经泛滥到如此严重程度的情况下，这样一些措施显然是极为不够的。没有一个坚决、得力的总体部署和措施，实际上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我作为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也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四月十五日晚，我和启立同志一起去紫阳同志那里汇报，提出一些人可能借耀邦同志逝世的机会闹事，并提出了三种可能和三种对策，特别是第三种可能，就是出现政治性游行、集会，提出为耀邦同志平反、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等。建议党内发个通知，提请各地注意。他当时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可以口头上给上海打个招呼。

四、我同意李鹏同志报告中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对紫阳同志的批评。我在接触中感觉到，紫阳同志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水过鸭背不透毛”，不“改造”是不行的，对思想政治工作中“左”的影响看得太多、太重，对党的优良传统看得太少、太轻，所以一再强调要“改造”，认为“不改造就不能加强。”但是广大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思想。在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起草过程中，我们在说明“改造”的内容和必要性时，煞费苦心，颇费周折，后来按照启立同志在大庆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说法写了。但是在政治局讨论文件草稿时，很多同志还是不同意“改造”的提法。记得尚昆同志当时就提出，不同意紫阳同志把“改造”思想政治工作与毛主席“改造我

们的学习”相类比。李瑞环同志也不同意“改造”的提法，还认为草稿中论述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份量不够。紫阳同志在会上又颇为激动地作了许多解释。在党的工作会议期间，我征求了仲勋、任穷、任重等老同志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改造”的提法不妥，提出用“改进”的提法好，这个意见最后才被紫阳同志接受。

五、紫阳同志在文艺思想上，我觉得也存在一些错误的指导思想。他说：“我有个基本的主张，根据多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少管、少介入，既不要轻易表扬什么，支持什么，也不要轻易批评什么。这样的方针才能持久。真正要管的话，管大的。什么具体作品，具体剧目，具体电影都要少介入，具体人的问题也要少介入。……只要基本上在政治上不反党，不是为了颠覆我们政权的，其他事不要管，什么这个作品怎么样，那个作品怎么样，根本不管这个事。”

小平同志在四届文代会的祝辞中曾说过：“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个人理解，小平同志这个说法的出发点，是党对文艺工作要按照文艺

创作规律来管，不要乱管，不要乱干涉。而紫阳同志的基本思想的实质是少管、不管。这和小平同志的思想是不一致的。

由于紫阳同志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在起草文艺工作的中央文件中，一些文艺家曾一度提出党不要干预、不要介入文艺。文艺创作中出现的自由化思潮，以及黄色低级作品的泛滥，与紫阳同志这种思想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

关于今后的工作问题，我完全赞成李鹏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内容。我想就两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要有一个总体的、长远的考虑，既要有战术性的，又要有战略性的。所谓战略性的，就是要采取一些根本性的措施，从长远看，最为重要的是培养人，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在新闻队伍的建设方面，我曾经找一些同志座谈过，大家反映这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编辑、记者，新闻观点和新闻理论基本上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戒严刚开始时，新华社这个党的传统比较多的新闻单位，仍还有一千多人上街游行。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和

訓，而且要總結國際上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東歐的一
：經驗教訓很值得重視。我曾經請中聯部的同志整理了這
方面的一些情況，並報給了中央常委和參加常委會的老同
志。

2、這樣嚴重的錯誤，出在黨的總書記身上，教訓太
深刻了，危害和影響太大了。因此，如何在黨的最高領導
層杜絕和防范這種問題的產生，是我們黨應該深刻研究的。
立乘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健在，認真解決好這個問題。
這是關係到我們黨、我們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

在這次制止動亂中發生輿論導向的錯誤，我是負有責
任的，教訓是沉痛的，我將認真總結和吸取教訓。

[89.6]十三屆四中全会文件之二十四

閻明復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擴大會議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0日下午

首先，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九日歷史性的講話，完全擁護李鵬同志所作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李鵬同志的報告實事求是，符合實際。

過去，趙紫陽同志很少找我，但是這次在他訪朝回來後，找過我幾次。現在就我接觸到的談兩點情況。

一、五月二日下午，趙紫陽同志應費孝通、雷潔琮、孫起孟三位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要求會見了他們，聽取了他們對學潮和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意見。之後，他把我留下來說，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是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向小平同志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地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

键在于怎么说服小平同志，只要他说一句“看来当时把问题看得过重了一些”，这样就可以在常委中统一思想，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说他从朝鲜回来后，提出要到小平同志那里去谈一谈，小平同志还没有找他。他要我把他的这个看法转告杨尚昆同志，最好尚昆同志能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5月4日至12日我生病住院这段时间同赵紫阳同志没有接触）。当我向杨主席转告赵紫阳同志的话后，主席当即表示，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不能改变的。

二、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赵紫阳同志要我去他家。见面后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席十九日晚的干部大会？他讲他生病了，心脏供血不足，还找了医生来家输氧，等等。他说，学潮这样拖下去，旷日持久，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他要我去向尚昆同志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我问他要不要说是他的意见，他说不要说。当时我不知道十七日常委会的情况，也不知道他在这次会上公然反对中央作出的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我去见了杨主席说，刚才赵紫阳同志找我去，叫我向你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杨主席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召开

人大常委会的。当天下午我向赵紫阳同志转告了杨主席的意见。

在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发展为反革命暴乱的铁的事实面前，特别是认真学习了小平同志九日的讲话，李鹏同志昨天的报告，回过头来反思，我认识到赵紫阳同志五月十二日对我讲的话的实质。要小平同志讲一句“看来当时对问题看得过重了一些”，其实质就是要小平同志承认错误，承认定性定错了；要“在常委中统一思想”，就是要李鹏同志、尚昆同志和其他捍卫人民日报26日社论立场的同志去承认错误，然后就转弯子转到肯定这次学潮。由此必然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赵紫阳同志五月二十一日要我去向尚昆同志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时候，也正是动乱制造者们千方百计力图迫使人大常委会提前召开的时候。他们毫不隐讳地叫嚣要以召开人大常委会来达到撤销国务院发布的戒严令，进而推翻以李鹏同志为首的政府的目的。赵紫阳同志在这个时候也提出这样的建议，他的意图就很清楚了。

我认为，从五月初到五月十七日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也就是从赵紫阳同志由朝鲜回来并主持中央工作，到

中央常委多数同志在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下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之前，由于赵紫阳同志坚持错误立场，使得中央的领导核心在动乱愈演愈烈威胁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险恶形势下，实际上处于严重分歧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境地，眼睁睁地失掉了一次又一次制止动乱的时机，以致事态最终发展到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事实证明，赵紫阳同志确实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第二，五月二十日以来，老一辈革命家彭真同志、尚昆同志以及李鹏同志、乔石同志和其他关心爱护我的同志，都先后找我谈话，提醒我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一定要分清大是大非，站稳立场，进行认真的反思。

结合学习小平同志九日的讲话、李鹏同志昨天的报告，我初步检查：

一、十三大以来，赵紫阳同志很少找我谈什么，只是在各种会议上见面。为什么五月初赵紫阳同志不自己直接去找尚昆同志而要我代他去传话？这里且不去分析原因何在。对于我来讲，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为什么接受赵紫阳同志交办的事，而没有当即认清他要我做的事情的严重危

害性呢？五月二日，他所谓的只要小平同志讲一句“当时把问题看得过重了一些”，也就是要小平同志承认错误，也就是要肯定学潮，这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我当时是没有想的。五月二十一日赵紫阳同志找我，是在十九日他没有参加当晚的干部大会之后，这是我亲眼所见，特别是他不让我讲召开人大常委会的建议是他的意见，我只是感到奇怪，而没有进一步给自己问一个“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回顾起来，问题在于这两个月来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我的思想认识经历了一个四·二六社论前后比较清醒到五月二日以后认识严重模糊、矛盾重重的曲折过程。五月十九日以后，特别是听了传达小平同志重要讲话，才又重新有了比较清醒认识。

四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四月二十五日小平同志指示和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精神，我在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中是认真及时传达了的，而且针对党外的不同反映同部里其他同志一起做了工作。但是，四月二十七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后，党外人士纷纷对学生给以肯定的评价，类似的想法从不同渠道大量涌来，使我对学潮产生了模糊认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赵紫阳同志的所谓定性定

错了，加深了我的错误认识，使我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矛盾。但是，后来在同非法组织的学生代表对话中，他们明确提出要中央否定“动乱”的定性，承认他们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并进而要求肯定他们组织的合法性，还要求为方励之等人平反，这些使我意识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前景不堪设想，波兰化、匈牙利化，甚至更危险的局面，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也使我对赵紫阳同志的改变定性的主张发生怀疑。但是，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没完没了地闹下去，宣布戒严后部队又到不了位，怎样办呀，赵紫阳同志作为总书记又同中央发生分歧这种局面怎么办？特别是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对话时的心情更为矛盾。每次向李鹏同志请示时，他都提醒：明复，26日社论不能退。而我又明确地知道赵紫阳同志的态度。那些天真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不知所措。尽管如此，我在四·二六社论问题上始终没有后退。

二、关于同非法学生组织对话。

五月十三日到十八日，我先后四次同学生代表对话，其中一次中央的同志只是我自己。其中包括同非法学生组织代表谈了两次，并单独到过天安门广场去劝学生结束绝

食，对此，前些时候我一直认为这些对话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经过政治局常委决定或批准的，问题不大，没认识自己的错误，甚至以为在对话中捍卫了26日社论，捍卫了小平同志，只是回想了自己在对话中的某些说词，认为过于软弱。特别是16日下午去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只一味要求他们停止绝食返回学校，而且还讲了一些错话。学习了九日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李鹏同志的报告，使我清醒认识到同非法的学生组织对话，实际上助长了他们的气焰，无异于助纣为虐（共同社的评论，见参阅文件之一第七页），实际上只有利于动乱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逼迫党和政府承认非法组织，这样做，严重地挫伤在各学校坚持党的正确方针、坚持斗争的校领导、广大团干部、学生会干部的坚定性、积极性，使他们无所适从。

三、经过这场反革命暴乱，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小平同志，及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暴乱，没有杨主席、没有李鹏等常委多数同志坚持小平同志的正确判断和决策并坚决予以贯彻，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几千万先烈的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毁于一旦。小平同志又一次挽救了我们

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一定遵循小平同志关于冷静地考虑过去、考虑未来的教导，认真地总结经验，认真地检查和反思。

[89.6] 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之二十八

王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 擴大會議上的書面發言

1989年6月21日

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我完全同意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的精神。

我完全贊同小平同志和黨中央對這場動亂、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即他們“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國內外反動勢力表現出極大的瘋狂性，反動氣焰極為囂張。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很清楚。他們要“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楊尚昆”等，是他們實現上述目的的重要步驟。

这两个月来，北京发生动乱，步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并波及到全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忧心如焚。

现在好了，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下，在广大工人阶级和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粉碎首都反革命暴乱的决定性胜利。这将载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辉煌史册。

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处于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一胜利，最主要和根本的条件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毛泽东主席那个领导班子的不少人还健在。他们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立场，久经考验，历尽艰险，经验丰富，功勋卓著，有崇高的威望。这场风波刚一露头，小平同志就很敏锐、明确地指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性质、实质和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立即坚定鲜明地同小平同志一起，号召在为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集体领导下，经过建军时代、抗日战争、打败蒋介石和抗美援朝等历次革命：

的老党员、老战士，团结全党和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坚决支持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一线同志的工作。得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的坚定支持，坚决、迅速地粉碎了一次政变，又一次保卫了中国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挽救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毛泽东主席曾评价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代表全党、全军和各族人民，将小平同志请回主持中央的工作。实践证明，毛泽东主席对小平同志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小平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始终待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我们党、国家、民族立下的不朽功勋，将永载史册。

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暴乱，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所决定的。

“国际的大气候”就是指国际上帝国主义势力、反动分子推行他们的“和平演变”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化”政策，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背叛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这是当在全世界的反动逆流。

十月革命后，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新生的苏

維埃政权，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支援蒋介石打内战，继尔有侵朝战争、侵越战争。讨不到便宜，就着重采取“和平演变”的一手。今年一月，我看到一个材料，印象很深。最近查了查，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则消息，说美国外交专家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一项“大胆的、富有远见的政策”，把“苏联集团国家”“并入西方”，使欧洲“恢复到一九一八年以前的状态”。那时布什正在竞选总统，他也宣布，东欧对他说来是“充满机会的地区”。对待中国，他们也照此办理。近几年来，国外、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越搞越凶：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我国内部的敌对势力等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不仅有海外、国外电台造谣、煽动来配合，他们还直接出钱，甚至直接与非法组织、暴乱分子联系，参加策划。

在这个国际大气候中间，有了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必须指出，小平同志等中央大多数同志，始终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但是由于胡耀邦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搞这种活动的分子采取

所謂“寬容、寬鬆、寬厚”的態度，特別是趙紫陽同志當總書記以後，網羅、重用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分子，組成“智囊團”即可稱之為象林彪那樣的大小艦隊，壓制、打擊一大批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同志，使十年來時起時伏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以至發展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他們控制一大批輿論工具，到處搞政治性沙龍、演講和集會，甚至鑽進黨和國家的核心部門，占居重要崗位，上下勾連，內外串通，長期以來進行思想的、輿論的、組織的準備和精心策劃，自以為時機成熟，就求助帝國主義和海外反動勢力，就蒙蔽欺騙青年學生，發動利用社會上的流氓政治團伙和地主官僚、封建軍閥反動階級殘余及社會渣滓，企圖以動亂直至暴亂，打倒中國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陰謀篡奪黨、國家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其結果，也只能復辟一個喪失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完全依附於西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權。

說到趙紫陽同志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輿論準備，我想專門講一講電視片《河殤》。這是他們輿論準備的重要步驟之一。

《河殤》的要害，是所謂“新紀元”。

《河殤》里有两个“新纪元”。巴黎公社不是新纪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是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新纪元，马、恩、列、斯、毛以及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都不是新纪元，只有一六四九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一九八七年赵紫阳同志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

赵紫阳同志这个“新纪元”，到底是什么样的“新纪元”？

这是用“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这是削弱以至取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以至“改造”党，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大树特树赵紫阳同志“新权威主义”的“新纪元”。

这是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和破坏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力量庇护下来、扶植和集聚起来的“新纪元”

赵紫阳同志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错误，已经产生严重后果。几年来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分配不公，社会治安混乱，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地脱离群众，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搞散了，早已在

中国绝迹的贩毒、吸毒、卖淫、走私、绑票、买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等丑恶现象重新泛滥，严重败坏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总祸根就是赵紫阳同志。到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残余势力和社会渣滓纷纷出笼。他们打砸抢烧杀，破坏国家财产，残无人性地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把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和首都北京，搞得乌云滚滚。这是他们“新纪元”的一次大暴露。

这是一个使社会主义新中国倒退、人民受难的，黑暗、污浊、血腥的“新纪元”！

他们的目的，是要实现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只能使中国丧失民族独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在去年春节，赵紫阳同志就肯定“以夷制华”的说法，并且说，不要怕人家说“丧权辱国”。几年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一批所谓“文化精英”，已经陆续跑到美国，由美国人出钱，天天在那里骂我们。参与策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方励之，不是要当“世界公民”吗？他要求外国人抽走资金，让中国经济崩溃，最近又躲进了美国驻华使馆。《世界经济导报》的头头，几乎每个星期到美国领事馆请示汇报。在天安门绝食的刘晓波，早就宣

待中国人种不好。最近，他们感到形势紧张，还有不少人办好了出国签证。他们不是天天标榜“爱国”吗？现在到哪里“爱国”去了！

他们恶毒咒骂全世界炎黄子孙公认的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和代表，中国的“长城”、“黄河”和“龙”，恶毒污蔑伟大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光辉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宣传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几千年的文明，全世界都承认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鸦片战争以来一代一代人反对国外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革命斗争，都被它说得一无是处。他们不提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不提辛亥革命，特别是把我党领导的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恶毒攻击为“动乱”，对我国四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中包括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彻底否定，对我党领导的土改、镇反三大改造、反右以及后来的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彻底否定。《河殇》挖空心思，咒骂生我养我的祖国，说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黄面孔，吃黄米，喝黄水，身上沾着黄土，住黄土的窑洞，什么都不行。“黄种人的文明”衰落了，“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黄河“孕育不了新的文化”，总之，中国人连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都不配有。

相反，却竭力宣扬“蓝色文明”是“新曙光”，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些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不是彻头彻尾的崇洋卖国是什么！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国人民反对亲美、崇美、恐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这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几年已经被《河殇》编导之流糟塌得不象样子了。他们大吹“蓝色文明”，鼓吹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到这次动乱和暴乱期间，他们又在天安门广场用高音喇叭转播“美国之音”，直到拉出一个什么“女神”。他们用那套乱七八糟的东西毒害我们的青少年，败坏民族精神，是不能容忍的！

去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河殇》。赵紫阳同志和我说，他没有看。但是他已把这部片子推荐给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值得一看。没有看，怎么会推荐，怎么能说值得一看？他还让有关单位复制五百套录相带，广为发送。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希望能组织文章，讲点道理，批评《河殇》。但是他们垄断了舆论阵地，实际上禁

止批。

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想开辟“新纪元”的野心家，还是一个善于耍弄政治权术的阴谋家。赵紫阳同志不仅把党内分歧搞到社会上，而且搞到全世界，并通过他身边的人及其直接掌管的机构，向非法组织和海内外反动势力、报刊泄露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蒙蔽、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直接策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几千万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毁于一旦，我们共产党人和广大工人阶级及各界人民群众便会人头落地。因此，我们党与赵紫阳同志的这场斗争，是一场政变和反政变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我们党和赵紫阳同志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最近发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充分说明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

今后怎么办？我完全拥护小平同志提出的，按照我们

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作为一个老战士，我对党中央的工作提几点建议。

当前，首要的是尽快彻底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要采取坚决措施，稳、准、狠地镇压一切暴乱分子，特别是动乱和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除恶务尽，一个不许漏网。听说不少人跑了，凡跑了的，务必捉拿归案。在政法战线上工作的同志担负着繁重的任务，殷切希望大家圆满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对捉拿归案的，我建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有些人不改，戴上帽子劳改、劳教。小平同志多次说过，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问题是扩大化了。这次我们的方针是，一个不放过，一个不扩大。否则，不足以显示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不采取这一坚决措施，一遇机会，这些人必然会对党、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百倍疯狂的报复，后患无穷。

第二，坚定地坚持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

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前几天,我与文化界的一位老同志谈话。他说:我们拥护小平同志,不是因为他官大,是因为他正确。七九年,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我们从心里拥护,坚决贯彻执行。以后,小平同志又提出批《苦恋》、清理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我们都认为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我们也都坚决贯彻执行。但是当时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却不执行,把我们这些执行的同志整得很苦。最近,小平同志又郑重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有的同志劝我写文章,我心有余悸,怕将来有的同志再不执行,我们再挨整。这位老同志的话值得深思。最近又听说,有些单位表彰了一批在反对动乱和暴乱中作出贡献的同志,受到表彰的一些同志说,你们千万不要表扬我,什么时候翻过来,我的日子该难过了。这些同志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所以,我殷切希望新组成的中央领导班子,一定要注意,决不能再出现小平同志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缺乏一贯性”的问题。否则,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会重演。

第三，堅定不移地貫徹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總方針，保證發展戰略“三步曲”的圓滿實現。

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總方針，大大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給各族人民帶來好處，使我們偉大的國家和人民的生活發生巨大變化。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深入人心，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只有實行改革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吸收海外、國外資金，才能加快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們應當認識到，小平同志所講的改革開放，與趙紫陽同志所講的改革開放，有本質的不同。小平同志講的改革開放，是要堅持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投資方向是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趙紫陽同志的改革開放，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提倡高消費，滋生浪費和腐敗現象。趙紫陽同志決不是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執行者，而是歪曲者和破壞者。我們對這點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必須幹淨徹底地剝去趙紫陽同志所謂“改革派”的外衣。必須真正遵照小平同志“兩手抓”的方針，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嚴厲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堅持和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奮發圖

强的革命精神，贯彻执行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平息这场动乱和暴乱，解决了赵紫阳同志的问题，就排除了一种大干扰、大阻力，应该也必须把改革开放的工作做得更好。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怕外国人不来投资，我说不怕。外国资本家是要赚钱的，他们决不会放过中国这个世界上这个大市场，他们见你国家稳定，能赚到钱，决不会不来。我相信，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总方针，一定会在新班子领导下取得更大的成果。

第四，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这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意义。

思想建设，就是要在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使大家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形势、分析问题、做好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党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坚决反对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学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实施共产主义的宇宙观的

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應該也一定會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這次鬥爭，對各級黨組織、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極為嚴峻的考驗。大家認真想一想，考驗得怎麼樣，及格不及格。我看，不少地方存在組織不純的問題。要採取嚴格措施，純潔組織，使黨的各級組織真正發揮戰鬥堡壘作用。

還有作風建設。要在新的情況下，恢復和堅持黨的實事求是、密切聯繫群眾和批評、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這幾年來，假話、空話、追求時髦的話泛濫成災。領導幹部不深入工廠、農村，不深入基層，老老實實傾聽工人、農民、工程技術專家教師教授、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切實進行調查研究的少了。這種狀況必須改變。還有人民群眾切齒痛恨的貪污腐化分子，一定要拿出得力措施，堅決實行法律制裁。

第五，切實加強宣傳輿論工作。

實踐證明，我們的軍隊合格，完全可以信賴，但很大一部分輿論宣傳陣地，被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掌握或受到他們的嚴重影響。新聞界、理論界、文藝界邪氣壓倒正氣。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這“三界”中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是具體組織、策劃和指揮的骨幹。

对这“三界”必须彻底整顿。他们这些人，把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制度，骂我们中华民族，作为时髦，甚至无耻地投靠海外、国外敌对势力。吴祖光、王若水、刘宾雁、戈扬、北岛、阮铭、邵燕祥等都聚集在美国骂我们，骂小平同志。这些人自命“精英”，其实是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投机分子和民族败类。对这些人，党员要按照党章立即开除党籍，有些要依法通缉惩办。整顿“三界”，首要的是整顿新闻界。现在有的报刊仍然在和中央唱对台戏要坚决调整不合格的领导。新调换的不合格，随时撤换。宣传舆论工具，一定要掌握在贯彻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手中。

第六，坚决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充分调动各界人士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次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不愧是安定团结和发展生产、实现四化的主力军。我们要继续紧紧依靠他们，办好社会主义的大企业。我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仅占极少数。他们决不是知识分子的代表，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我們在今後的工作中，要繼續尊重、依靠和發揮廣大知識分子的作用，給他們施展才華創造最好的條件。多難興邦，壞事可以變好事。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各界人士，通過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一定會更加信賴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一定會更加同心同德，為振興中華，實現社會主義四化而努力奮鬥。

我十二、三歲參加革命，受到老工人、革命知識分子的教育，而後加入共產黨，到今天快七十年了。我親眼看到千萬名忠誠的共產黨人和革命戰士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大無畏地英勇壯烈地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我自己算是這些奮鬥者中的一個倖存者。我一生在人民群众的革命鬥爭中，立志作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我對中華民族，對我們的黨，對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我有深厚的感情。我今年八十一歲了，做不了很多事情了，但我誠懇地希望，堅定地相信，中國共產黨的旗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旗幟，一定會在中國大地上永遠高舉、永遠飄揚！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江泽民

同志们：

这次中央全会推选我担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我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又缺乏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深感担子很重，力不从心。现在全会已经作出决定，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同志们的期望。

我们党已经制定和形成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和一系列基本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最近再次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们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坚实的基础。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

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小平同志几次讲话都表示了对新的中央领导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依靠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同时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一般日常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但遇到很重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形成的崇高威望，是党的宝贵财富，对我们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仍然十分重要。

这次全会开得很成功，不仅正确处理了赵紫阳同志的问题，而且初步总结了教训，讨论和研究了不少重要问题。

最近，小平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以及其他几位老同志的讲话，对于今后党的各项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交四中全会的报告的第二部分对于当前的工作，已经做了初步的部署，我完全同意。在他们讲话的启发下，讲一些想

法，作为我在全会的发言。我初到中央，了解情况不多，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当前第一位政治任务。回想起这场反革命暴乱，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断，如果没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的献身，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对于策划、组织、指挥动乱和暴乱的阴谋分子，参与暴乱的反革命暴徒，务必坚决打击，依法惩处，决不能心慈手软。对于不同程度卷入动乱和暴乱的人，要多做争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对于不明真相而有过某些错误言行的青年学生和群众，要帮助他们总结教训，提高认识。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需要尽快着手制定一系列具体政策。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妥善处理。总之，要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

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要深入思考两个问题：这场动乱和暴乱发生、蔓延的主要教训在哪里；怎样彻底消除动乱产生的思想、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保证党和国家

的长治久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确定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积极稳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经济发展中，要十分重视发挥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还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当前，经济工作的迫切任务，是遵循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继续抓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国务院已经制定和将要制定的各项措施，各级党委都要坚决支持和保证贯彻执行。全党同志都要为挽回动乱和暴乱造成的损失，贡献全部力量。

在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同时，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搞好搞活大中型国营企业。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和基础。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

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面貌，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要继续更有效地进行改革开放，把这个工作搞得更快更好。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指导者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赵紫阳同志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紧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几年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一切向钱看”，追求高消费，追求眼前实惠而放弃远大理想，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民族整体利益，鄙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崇洋媚外等思想倾向滋长了，浅薄、庸俗甚至腐化、堕落的不良风气发生了，建国初期就早已绝迹的种种丑恶现象再度出现了。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问题，并从中引出深刻的教训。

加强教育，我想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等等。广大青年拥护改革开放，但是他们中不少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了解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幻想在一夜之间把西方的物质文明搬到中国土地上，比较容易接受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他们生长在祖国的土地上，理应在这块土地扎下深根，理应从我们的工人、农民、战士的身上吸取精神营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宣传工作在批评“两个凡是”、促进思想解放方面，在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后来几年中，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纷至沓来，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当严重。赵紫阳同志打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同志，保护、信用、提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由来已久，一些舆论阵地已经不在党和人民手里。有关部门一定要采取坚决措施进行整顿。

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知识分子队伍。他们活跃在生产、国防、科研、教育、卫生、宣传、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真正是民族的精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极少数以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出名的所谓“精英”。他们已经自己撕去“爱国”、“民主”的外衣。几年来，他们被捧得很高，不仅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而且形成了一种哗言惑众的很坏的学风。他们不能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败类。

民主和法制建设要抓紧进行。许多群众和青年学生希

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他们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工作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但是,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决不能“引进”西方资产阶级那套所谓“民主”、“自由”的制度。全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了它们在中国的破产,这次动乱也充分说明,想那样做,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这次学潮的事实还表明,一些青年学生和群众对民主缺乏正确认识,法制观念相当淡薄。有的人所要的“民主”,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状态,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对民主的反动和破坏。他们所主张的极端民主化,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活动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但是党的性质不能变,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能变。

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

于党员的素质。要结合建设、改革的实际和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在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党纲党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

这次动乱中所以有那么多人被阴谋分子煽动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严重腐败现象。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必须在近期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再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制定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使党风有根本好转，恢复和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同志们，我们是在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这次中央全会的。这次全会，将以党的胜利载入史册。但是必须看到，要挽回赵紫阳同志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解决赵紫阳同志留给我们的重重难题，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保证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民族独立不致丧失，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圆满实现，任重而道远。我们决心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的精神，排除任何干扰，克服一切困难，以百倍的努力进行工作。

附 錄

Appendix

附錄一： 趙紫陽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

1989年6月23日

這次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將對我的問題做出組織處理，我歡迎同志們對我進行批評。這些年來我的工作有不少缺點、錯誤、失誤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負了黨、人民和同志們的期望。現在我想僅就我所犯錯誤的一些事實做些說明和進行自我批評。

（一）一些事實及我當時的思想

我先說學潮和動亂以來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當時的思想情況。

4月中旬以來，學生遊行發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態盡快平息下來。我講過，對於學生不按法律規定申請，就上街示威，我們歷來是不贊成的，對罷課絕食更不贊成。我一再呼籲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還講過，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遊行，學校領導人和黨組織還是應當積極進行說服和勸阻工作，儘可能引導學生通過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達意見。我的這個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

但是，我也看見這次學潮有兩個很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學生提出要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這些要求跟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是一致的，我們不能拒絕。二是參加遊行的人和支持他們的人非常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這種情況下，我當時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態，必須首先着眼於多數，把多數人的主流肯定下來。廣大學生要求改革、反對腐敗的熱情是可貴的，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時還要接受群眾的合理意見，採取積極的整改措施。這

樣使多數人的情緒緩和下來，使多數群眾理解、支持黨和政府的做法，然後對少數壞人的問題才好解決。

與當時這個想法聯繫，我還覺得4月26日社論有個問題，就是沒有肯定多數人的主流，而是從整體上做了一個多數人難以接受的籠統的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極少數人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混水摸魚，肯定是有的。但是幾十萬人的行為，只用少數的人操縱是很難完全解釋得通的。學生們認為4月26日社論給他們戴上一頂帽子，情緒變得激烈起來。因此，我曾主張對社論做些改變，鬆一鬆口。我的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會議上講過，只在這個範圍內同少數中央領導同志交換過意見。我當時考慮，我的這個想法對不對是一個問題，在黨的會議上不可以提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我的這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是可以在常委會上提出來的，提一提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當然後來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講話的口氣、提法實際上也逐步在變，也都講了一些肯定廣大學生愛國熱情的話。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把這些話寫在4月26日的社論裏，而不是做一個整體的敵我矛盾的定性，多數人們可能不會那麼激怒，再加上我們的其它工作，事態可能不致鬧得那麼大。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總之，我是想把廣大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很多同情者的行為，與極少數人的企圖利用學潮混水摸魚、製造事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行為嚴格區別開來，避免把整個學潮籠統地作一個敵我矛盾性質的定性（「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着重採取疏導的方針，避免激化矛盾，盡快平息事態。我的不同意見的主要之點就是在這個地方。

另外說明一下，我沒有反對過用「動亂」這個詞。我認為動亂只是指學潮規模和對社會秩序的影響程度而言，並不說明性質，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敵對的。我在五月十七日常委會已講過這點。

（二）做的對和不對的地方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對，那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麼分歧，至少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成千上萬的學生聚在天安門廣場，大家的心情確相當緊張和焦慮，我當時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絕大多數人是出於對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對我們工作不滿，想借題發揮，少數人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想故意把事情鬧大。我說，黨中央在治喪，學生們也要悼念，我們不好不允許他們悼念。因此，我主張，除對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應當採取緩和手段。我記得當時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在追悼會前，唯一的一件事是4月19日夜，李鵬同志給我打電話，說學生在衝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我說喬石同志在第一綫，準備了各種預案，他會隨機處置的。隨後我打電話告訴了喬石同志。我記憶中就是這麼一次。其它沒有聽到常委中間有什麼不同意見。

二、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

（1）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活動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復課。

（2）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

（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衝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

李鵬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後聽說，李鵬同志將這三條意見報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4月23日下午，我離京訪問朝鮮，李鵬同志在車站送行時問我還有什麼意見，我說就是那三條。

三、4月24日到30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我是在4月26日凌晨在朝鮮看到小平同志談話和常委會議紀要電傳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並未電傳過去）。我當即覆電表示「我

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我理解，小平同志決策的總精神是要穩定，不要動亂。這一點，對我們國家太重要了！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應當竭盡全力來做到這一點。

四、我在5月3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閱。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在我記憶中只有兩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對精神污染的意見。我當時考慮，稿子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有了較充分的闡述，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對四個堅持。因為意思是一樣的，不加也可以。另外，從技術上考慮，整個稿子是正面講紀念「五四」的，兩位同志的意見插到那裏都覺得文字上不太順，因此就沒有吸收。我們歷來討論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個人的每個意見完全吸收進去。

五、我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當時沒有覺得這有什麼矛盾。因為在我訪朝尚未回國之前，李鵬同志批准發的《人民日報》的第二篇社論（4月29日），調子已經緩和了。後來在國務院授權舉行的對話會上，發言人也明確表示第一篇社論（4月26日）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反覆肯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學生是好的。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決的。我5月4日的講話，特別注意到了這些情況，與上面的調子大體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話（如反對動亂的問題）我在5月3日的講話中已經講了不少，覺得可以不重覆了。我這次講話的新內容只有兩點：一是我分析了群眾對黨和政府又滿意又不滿意的狀況。我仍然認為這種分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的氣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我想今後遇到這些問題，仍然應該爭取在這軌道上去解決。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

可以。後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過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就在第二天（5月5日），李鵬同志會見亞銀年會代表的講話，也沒有經過常委討論，其調子也和我講的差不多。

儘管有以上這些情況，但我的這篇講話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測，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慮到這些情況，當時可以不講這篇話。

六、關於5月8日的常委會和5月10日的政治局會，4月27日的大遊行後，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4月26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難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許會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靜下來以後，也許比較容易取得統一意見。因此，我在這兩次會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報告清理公司的情況，公佈高級幹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80歲（或75歲）以下領導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萬里同志考慮得比我周到，他建議由人大成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訂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等。我的這些建議，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議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後還準備再討論，並沒有正式做出決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彙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於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後，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更明確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

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於這次作了公開報導。我從朝鮮回來後，聽說小平同志4月25日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廣泛傳達後，社會上引起很多議論，說「常委向小平同志彙報不符合組織原則」，還有一些更難聽的話。我覺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說明。

在戈爾巴喬夫來訪的前兩天，我與工人和工會幹部座談對話時，會上也有人提出這類問題。當時我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作了說明，效果很好。他們說，我們過去不了解，現在知道了就好了（喬石、胡啟立、閻明復等同志均在場）。在此之前，陳希同同志就針對人們有關「垂帘聽政」的錯誤議論，向大專院校工作的同志們做了解釋，說明了黨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有關決定的情況，效果也是好的。陳希同同志在4月28日的常委會上還彙報過這個情況。因此，我就考慮，如果通過公開報導，把這一情況讓群眾知道，對減少議論可能會有幫助。我當時向戈爾巴喬夫通報的內容是：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一個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我有意識的沒有講可以召集會議，和由他拍板的話）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作出的決策。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像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願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於5月16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4月26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5月4日我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個社論的一些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當時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同戈爾巴喬夫會晤的事，我們不便打擾，就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小平同志處工作的同志，也以個別交換意見的方式分別在幾位常委

同志中談過，想把這個彎子慢慢地轉過來。但是到了5月13日，幾百名學生宣佈絕食，其中一個主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我認為，社論主要是根據4月2日常委會精神寫的，小平同志的話是聽了李鵬同志主持的常委會的彙報後說的。小平同志的一貫態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體做出的決定，他歷來都是支持的。所以，責任應該由我們承擔起來。我在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表示，我已從朝鮮打回電報贊成小平同志的決策，所以我對4月26日社論也應該負責。當時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請常委考慮，不要求作出決定，同時時間已晚，沒有談下去。

九、5月17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5月4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4月26日社論的定性，並作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的嚴重後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的擔心的。會後，我再三考慮，很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衝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後，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並說常委內部還能夠繼續共事的。我反覆考慮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覺得他的話是正確的。在當前的局勢下，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5月18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並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講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

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時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於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三天後，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後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5月19日學生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黨內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鵬同志去廣場勸說絕食學生的呼籲像雪片一樣的傳來，人民群眾也對我們遲遲不出來做工作強烈不滿。有些同志說，周總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眾中去了，我覺得我們如果不再出來，將無論如何無法向人民交代。儘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後，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麼呢？在我們看望之後，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並於當晚9時，宣佈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看完學生回來後，我已覺得自己的病情加劇。

十一、關於我沒有出席5月19日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佈的。我的請假信是到開會通知之前發出的。請假信在先，接到開會通知在後。我開始時是眩暈、頭痛、站立不穩，入夜後心臟病發作。實情就是這樣，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後，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不知道了。

從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採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衝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後遺症，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廂情願」，不那麼現實。即使當時對「4·26」社論的

定性作了鬆動，也不一定就能緩解矛盾，可能又節外生枝，提出新的難題，最後矛盾激化，仍然無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來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想法，當然就成為多餘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願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三）經濟工作中的問題

對於經濟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及其責任問題，小平同志講過，李鵬同志也講過。

我的態度是，從我到國務院工作後，直到十三屆三中全會之前，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應該主要由我來負責。一九八九年李鵬同志的向人代會的報告，在政治局會議討論之前，曾專門送給我徵求意見。由於報告初稿中講到失誤原因時，連續用了幾個「多年來」，我建議對過去幾年來的問題、要採取分析的態度。如預算內的基本建規模，85年已經得到了控制，沒有控制住的是計劃外部分籠統地說改革急於求成，也不符合實際情況。李鵬同志聽後說，那就集中講88年的問題，作為本屆政府的年度工作報告，可以不講過去幾年的問題。我聽後未表異議。有的同志批評我不讓李鵬同志在報告中講過去幾年的失誤，把過去幾年的失誤推到李鵬同志的頭上，我要說明，沒有這回事，我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1987年以前，我國的經濟狀況總的是好的，是充滿活力的。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幾年來，經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的缺點和失誤，作為在第一綫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我對這些失誤應當負責。基本建設規模壓，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對計劃外基建和過快增長的消費基金，一直還沒有找到有效的控制辦法。農業問題，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過，但是直到去年農業會議之前，我們長時間沒有採取比較得力的措施。這些失誤，責任在我。

1988年以前，我國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當然也積累了一些可能加劇通貨膨脹的因素。去年發生明顯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是，由於對前年情況估計過於樂觀，在物價已經開始不穩定的情況下，又準備加快物價改革步伐，並公開宣傳物價改革，宣傳開放物價，引起人們的恐慌，造成了群眾對物價上漲的強烈心理預期。這個問題，凡是搞商品經濟的國家都非常重視，而我們當時不大懂得。人們對漲價的心理預期過高，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存款利息，解決儲蓄保值問題，因而就發生了搶購，尤其嚴重的是造成了儲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銀行的錢少了，被迫多發票子。着重講清1988年發生的這些事情，是為了正確分析出現問題的原因，並沒有任何推卸責任的意思。因為1988年的這個失誤，也應當由我來負主要責任。

這裏順便說一下，李鵬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報告中，批評我不加分析，不講條件地鼓吹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自己「創收」。這與事實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專門打電話給江澤民同志，要上海糾正黨政機關建立公司搞「創收」的問題。報告中還批評我「一再宣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腐敗現象「不可避免」。我不記得在哪裏講過這樣的話。自從我去年初在廣東提出「黨政機關的廉潔」以來，我開始認識到制止腐敗，解決廉潔問題的重要。從那時以後，我對防止腐敗和廉政問題講過不少次話。我講過，從許多國家的經驗看，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初期，容易發生腐敗現象。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當而且可以把腐敗現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經濟要繁榮、黨政機關要廉潔」。當然，如何防止腐敗，保持廉潔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過，還開過一些座談會，也總結過一些地區的經驗，但至今還沒有能夠找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敗現象的辦法，如果要講責任，也要由我來負。

（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同志們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對我提出很多批評和意見。我想就此對大家講一講我的思想狀況。

開放以來，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企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識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師、青年學生中間確實有所滋長。這次學潮問題鬧得這麼大，同這個思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抓得不夠有力，收效不大，放鬆了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這些問題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責任。

我經常在考慮這個問題，覺得很不簡單，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對這種思潮，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加強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我過去也是經常強調的，特別是今年以來，我在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形勢教育，加強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講過一些話。我還根據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精神，提出要堅持兩手抓，即一手抓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手抓加強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工作，當然，總的來說，還抓得很不夠，特別是很不落實，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樣，一手硬，一手軟。對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這期間，我感到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進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聽到一些反映，只用原來的辦法進行教育，效果往往不顯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這方面想得較多，但是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同時我還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夠的，要在人們思想上解決社會主義優越，還是資本主義優越的問題，歸根結底，還得靠人們從自己的實踐中切實感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就必須把我們的改革搞好，把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很快地發展起來。1987年4月以後，小平同志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長期鬥爭，也是一個長期的教育過程，不能搞運動，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以實踐去說服那些懷疑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我非常贊成小平同志的這些觀點。

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這兩方面互相影響。現在看來，除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發展外，社會主義在政治體制上，在民主問題上也必需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在實踐中，我愈來愈感到，政

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了，應該大體上同步進行。如果太滯後，經濟體制改革就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而且會產生各種社會、政治矛盾。我原來曾想，只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搞好，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會滿意，社會就會安定，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完全這樣。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後，政治參與意識、民主意識都會增強，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設跟不上，社會仍然不會安定。去年12月，我在軍隊的會議上說過，許多國家的情況都說明，經濟的發展常常不能自動地帶來人們的滿足、滿意和社會的安定。我覺得，這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需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思想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設必需跟上。

在實際工作中，我還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國際上確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們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權的旗號，應當注意到這中間複雜情況），人們的民主觀念已經普遍增強，許多社會問題完全用原來的辦法很難解決了。在我國，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多黨制，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但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一黨領導才能增強生命力。因此我想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完善並改進選舉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範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准的遊行，等等。總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夠享受到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增強對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優越性才能更加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就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制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適應民主，意見紛紜，表面上是「亂」。但

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範圍內的正常的小「麻煩」，就可以避免大亂。國家才能長治久安。這中間還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要把正當的民主要求，行使正當的民主權力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區分開來。我們不允許打着民主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也不妨礙發展民主。這就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劃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終這也要在法制的軌道上來解決，把兩者很好地統一起來。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制國家。而且，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去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遲早要走上這一條路。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因為我看到，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難控制。我想，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的去搞民主建設。這樣就可以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發展一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即使這樣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盪，但這絕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發生危機，在我們黨經過一番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更加適應新時代要求以後，將會以嶄新面貌，朝氣蓬勃地率領全國人民前進，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着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個想法，影響着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裏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

（五）對「支持動亂」和「分裂黨」兩項指責的保留意見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我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責，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

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底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校繼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並沒有引起學潮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後動亂的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後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於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領導人之間，在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如李鵬同志報告中指責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責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辭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因病請假而未能出席5月19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另外，把一些單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這些單位有人上街遊行演說，似乎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存在什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我在國務院工作時，有時就一些經濟理論

問題找人座談。參加座談的人常常來自許多單位，有時也有這些單位的人。此外我和這些單位沒有其它什麼聯繫。這些單位更不直接由我來管，他們有自己的隸屬關係。把他們統統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背上包袱。

既然黨章規定黨員有對自己的處理意見進行申辯的權利，（《黨章》第一章第四條中規定「在黨組織討論決定對黨員的黨紀處分或作出鑒定時，本人有權參加和進行申辯，……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我今天就着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附錄二：趙紫陽親述參加 1989年6月19-21日政治局擴大會^{〔1〕}

6月19日至21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首先由李鵬代表四個常委作了定調子的報告，指責我犯了「分裂黨」和「支持動亂」^{〔2〕}的嚴重錯誤，建議撤銷我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職務，並說對我還要繼續審查。接着參加會的人紛紛發言，對我展開批判。在會上發言語言最惡劣、充滿污衊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兩句話，說我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我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由於對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10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佔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20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

〔1〕 本文原載《改革歷程》，59-64頁。

〔2〕 「支持動亂、分裂黨」是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給趙紫陽的定性。會後的公報中說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六四」事件）中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

佈散會。我當即離開會場。除我之外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他們事先打了招呼，對我的發言不滿意，對我的態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消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撤消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消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但我發言時鄧小平、陳雲不在場，所以估計他們又報告了鄧和陳。

對於是不是保留我的中央委員這樣的事情我本來就不在乎，反正就是那麼一回事。但《黨章》明文規定，黨員對處分不服，可以提出申訴。《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3]也明確規定，「黨員對黨組織關於他本人或其他人的處理」，「有權提出聲明、申訴、控告和辯護，不許對申訴人或控告人進行打擊報復」。由於我進行了申辯，就加重了對我的處理，這是完全違反《黨章》和黨的規定的。

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大家的發言，對我的處理還保留中央委員，而現在拿出的草案就統統撤掉了，沒有說明原來的報告為什麼現在變了，這是極不正常的。我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一個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4]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帥^[5]等等，我發一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稿時我不僅沒投贊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

[3] 1980年2月29日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是中共黨內結束毛澤東時代領袖利用個人權力以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清洗黨內異己的關鍵性文件。

[4] 在中共詞彙中，「三中全會」一詞，不僅指1978年12月18-22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且包括了11月10日起召開的、為它作準備的、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實際上，是這個準備會議決定了中央全會的方向。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在中共歷史上應是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5] 聶榮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對撤消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聲明後，在場的人，包括鄧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也早有精神準備。

這次政治局會議表決對我組織處理違反《黨章》黨規的事，還不止這些。

首先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經過什麼程序決定的？政治局事先並沒有召開會議討論，常委會沒有我和啓立參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裏說過，最近政治局沒有開過會議。所以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怎麼定的，誰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黨章》明確規定，政治局會議是由總書記主持，對我還沒有經過合法程序撤消職務，就剝奪我主持政治局會議的資格，而由李鵬主持，這也是不合法的。尤其滑稽的是，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這一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參加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怎麼可以參加表決呢？大概是爲了壯大聲勢吧！當時李先念說，這是李鵬給大家的權利（因爲李鵬是會議主持人），這完全是以勢壓人，哪裏還管什麼《黨章》黨規？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6】}影響的一些老人，當然不會把這當作一回事。我現在把這些情況說出來，不知將來黨史如何記載這件事？

6月23到24日召開中央全會，來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我所作的政治和組織結論。會議通知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組會（我被分配在華北小組），在小組會上聽取了幾位同志對我的批評，我也簡單表了一個態。我說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爲會上的發言）已交全會

【6】「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是中文的歇後語。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交談時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實際上毛的意思是沒有人間的法律也沒有任何天定的行爲準則可以限制他。這次談話是毛澤東自己承認凌駕於法律甚至任何道德標準之上的直接證據。

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面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志。當時王忍之^[7]也在這個小組，他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可是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陳希同、李鐵映^[8]聯名批判我發言的發言，反倒在我的發言以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怪事：到會的人先看到批判我發言的發言，我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者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的發言。

會上還印發了一個所謂「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辦名義發的，收集了國內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國內外反動力量要顛覆中國共產黨和打倒鄧小平的預謀者，並且完全無中生有地說，我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動亂的學生們裏應外合，通風報信，泄露戒嚴的軍事秘密。很明顯，發這樣一個背景材料，是要在全會上製造一種輿論，我確實是一個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會中有些發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顛倒黑白，無限上綱，斷章取義，充滿誣衊不實之詞。用的也是文革的語言。我當時感到，如果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字樣，人們真會以為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東西。

按照《黨章》的規定，撤消一位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當時的領導人顯然沒有這個把握。以無記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因此他們不敢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面前，有些人不贊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但是需要指出，無論是總書記也好，還是政治局委員、常委也好，過去都是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他們的這種舉手表決，

[7] 王忍之（1933-）：江蘇無錫人。1982年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1987-1992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8] 李鐵映（1936-）：湖南長沙人。1987-199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1993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是很不正常的。當時在那種氣氛下，在那種壓力下，而且已經對同我有牽連的人和事追查，這種情況下舉手表決，人們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嗎？

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臺。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臺，或者即使下臺也是一種體面的下臺，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臺。我反覆考慮，寧願下臺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裏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麼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軌行爲。像我這樣不管怎麼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臺是肯定的，最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像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

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他們對我仍然採用早已被批判和拋棄了的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批倒批臭和混淆兩類矛盾、隨便限制人身自由那一套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本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在黨的十二大通過了新《黨章》，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都對避免文革的錯誤不再發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六四」後對待我的問題上完全無視這些規定，公然踐踏這些規定，把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附錄三：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 全體會議公報

1989年6月24日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出席這次全會的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央委員106人。列席會議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84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68人，有關方面負責同志29人。

全會之前，中央政治局於6月19日至32日舉行了擴大會議，為四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必要的準備。

全會分析了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指出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中，黨中央的決策和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全會高度評價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場鬥爭中發揮的重大作用，高度評價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作出的巨大貢獻。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紫陽同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錯誤的性質和造成的後果

是極為嚴重的。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鑒於趙紫陽同志的上述嚴重錯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

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決定增補李瑞環、丁關根同志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啟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復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全會高度評價鄧小平同志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重要講話，一致認為，這個講話是我們回顧過去，思考未來，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的綱領性文件。全會強調，要繼續堅決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堅決執行黨的十三大確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必須毫不動搖、始終一貫地加以堅持；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必須堅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貫徹執行，絕不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當前，要特別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徹底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進一步穩定全國局勢；二是繼續搞好治理整頓，更好地堅持改革開放，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三是認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努力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的教育，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強黨的建設，大力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堅決懲治腐敗，切實做好幾件人民普遍關心的事情，決不辜負人民對黨的期望。

這次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它不僅對於當前進一步穩定全國局勢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對於今後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全會重申，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變，我國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關係，對維護世界和平繼續作出貢獻。全會相信，我國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正義鬥爭必將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理解，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必將得到繼續發展。

全會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心同德，艱苦奮鬥，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困難，滿懷信心地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人名錄

薄一波（1908 - 2007）*Bo Yibo*

山西定襄人。1979 - 1982 任國務院副總理。1982 - 1987 年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當時主任是鄧小平）。是當時黨內極具影響的元老之一。

陳希同（1930 - 2013）*Chen Xitong*

四川安嶽人。時任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1989 年“六四”事件中以中共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六四”鎮壓之後，代表國務院發表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1992 - 1995 年任北京市委書記。1998 年因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 16 年。

陳雲（1905 - 1995）*Chen Yun*

江蘇青浦人。陳雲是當時地位和影響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元老。1978 - 1987 是中共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87 年後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主張實事求是，但不主張改革現行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當中，陳雲在經濟上接受“市場調節”但堅持計劃經濟，提出所謂“鳥籠經濟”理論，成為這一時期黨內反對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代表人物。陳雲的經濟思想同他認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是吻合的。

鄧力群（1915 - 2015）*Deng Liqun*

湖南省桂東縣人；時任中共第十二屆中央處書記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及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鄧小平（1904 - 1997）*Deng Xiaoping*

四川廣安人。1977 - 1987 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1 年至 1990 年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是當時在中國擁有最高權力的中共元老（所謂“黨的第二代核心”）。鄧小平在經濟方面，是改革的強有力的支持者，為

趙紫陽等黨內改革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在政治方面，他堅守一黨專制的底綫，是改革年代歷次“反自由化”的發動者；從 1979 年鎮壓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到 1989 年的“六四”鎮壓，都是他親自作出的決策。鄧小平個人的傾向對毛澤東身後的中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具有深遠影響。

鄧穎超 (1904 - 1992) *Deng Yingchao*

河南省光山縣人，出生於廣西南寧。時任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1980 年代「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她的丈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

胡啓立 (1929 -) *Hu Qili*

陝西榆林人。1985 - 1987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 - 1989 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89 年“六四”事件中胡啓立不支持武力鎮壓學生，因而被免去政治局常委職務，保留中央委員。

胡耀邦 (1915 - 1989) *Hu Yaobang*

湖南瀏陽人。1980 - 1987 年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胡耀邦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主持“平反冤假錯案”，開拓了改革開放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在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眼中，胡耀邦政治上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和事過於寬容。在失去元老支持後，胡實際上已經無法工作；1987 年 1 月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引發了幾乎有全體北京大學生參加，並且得到全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廣泛支持的大學潮，持續了整整 50 天，最後在六月四日遭受鄧小平調集的幾十萬軍隊血腥鎮壓。

江澤民 (1926 -) *Jiang Zemin*

江蘇揚州人。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9 年“六四”事件以後，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物色中選，接替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

李鵬 (1928 -) *Li Peng*

李碩勳之子。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學蘇聯，電力工程人員，文革後任水電部副部長。1983 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 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87 年任政治局常委；1988 - 1998 年任國務院總理。李在政治

上聽從黨內保守元老；經濟上聽從姚依林。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李鵬力主並促成了武力鎮壓。

李瑞環 (1934 -) *Li Ruihuan*

1982 - 1989年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先念 (1909 - 1992) *Li Xiannian*

湖北黃安人。1954 - 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文革前是陳雲的助手之一，文革中陳雲靠邊站，就由他繼續負責財政、貿易和經濟方面的工作。1977 - 198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8年後任全國政協主席；是當時黨內有影響的元老之一。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反對進行改革。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力主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李錫銘 (1926 - 2008) *Li Ximing*

河北束鹿人。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對促成武力鎮壓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93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聶榮臻 (1899 - 1992) *Nie Rongzhen*

四川江津人。元帥。曾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科委主任；長期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

彭真 (1902 - 1997) *Peng Zhen*

山西曲沃人。中共元老。長期擔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文革中下臺。1979年復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3 - 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喬石 (1924 - 2015) *Qiao Shi*

浙江定海人。1985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政法委員會書記。1986年，兼任國務院副總理。1987年任十三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中態度中立。

芮杏文（1927 - 2005）*Rui Xingwen*

江蘇漣水人。1985 - 1987 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 - 1989 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宋平（1917 - ）*Song Ping*

山東莒縣人。1981 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後昇主任，任國務委員；1987 年任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 年“六四”事件以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宋平昇任政治局常委，同時進入政治局常委的還有江澤民和李瑞環，填補了趙紫陽、胡啓立的空缺。

宋任窮（1909 - 2005）*Song Renqiong*

湖南瀏陽人。1978 - 1983 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副主任。

萬里（1916 - 2015）*Wan Li*

山東東平人。1977 年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推行包產到戶政策取得極大成功。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支持者和領導者。1980 - 1988 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委主任。1988 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王芳（1920 - 2009）*Wang Fang*

山東新泰人。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武警部隊第一政治委員。

王震（1908 - 1993）*Wang Zhen*

湖南省瀏陽人。1982 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 年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8 - 1993 任國家副主席；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黨內有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 年“六四”事件中，王震主張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

閻明復（1931 - ）*Yan Mingfu*

1985 - 1990 年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1987 - 1989 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因在“六四”事件中不支持武力鎮壓被撤職。

楊尚昆（1907 - 1998）*Yang Shangkun*

重慶潼南人。1982 - 1987 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

秘書長。198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當時中共黨內極具影響力的元老之一。1989年學潮中，楊尚昆開始支持趙紫陽的方針，最後轉而選擇擁護鄧小平的武力鎮壓決策。

姚依林 (1917 - 1994) *Yao Yilin*

安徽貴池人。文革前長期做貿易工作，是陳雲和李先念的部下。1979年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後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87年任政治局常委。1989年“六四”事件中，姚依林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主張並促成了武力鎮壓學生。

趙紫陽 (1919 - 2005) *Zhao Ziyang*

河南省滑縣人；1980年代「改革開放」主要領導人之一。1980年代先後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六四」事件後被軟禁16年後過世。

Who Was Who

Bo Yibo (1908–2007)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arty elders. Bo was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from 1982 to 1987.

Chen Xitong (1930–2013)

was mayor of Beijing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anneling the course of events toward the crackdown on protesters in 1989. Chen's report, published in June that year, was the only official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 in the military assault. Chen was expelled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in 1997 and sentenced in 1998 to sixteen years in prison on bribery and corruption charges.

Chen Yun (1905–1995)

was, after Deng Xiaop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Party elders. Chen won praise for the quick and successful stabilization of China's war-torn economy and for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based on the Soviet economic model in the early 1950s. His practical approach was swept aside by Mao Zedong's desire for a speedy transition to a socialist economy. Chen's political comeback in the post-Mao era was marked by his insistence on planned economics in the era of reform. From 1982 to 1987, Chen w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From 1987 to 1992, he was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Advisory Commission.

Deng Liqun (1915–2015)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from 1982 to 1987. An ardent Mao loyalist, Deng became the voice of the conservatives in the reform era and could count on the support of Chen Yun, Li Xiannian, and other Party elders.

Deng Xiaoping (1904–1997)

was China's undisputed leader during the years of transition after Mao, from 1981

to 1997. He support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earned him enormous prestige and strengthened his power base. Politically, Deng insisted on continuing one-party rule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rackdown on political dissent in 1979 (the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as well as the violent response to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Deng w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from 1977 to 1987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from 1981 to 1990.

Deng Yingchao (1904–1992)

was Chairman of the Sixth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Her husband was Zhou Enlai,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u Qili (1929–)

was the mayor and Party secretary of Tianjin from 1980 to 1982, and then went to Beijing where he became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Office and a member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In 1987, he was made a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In 1989, Hu opposed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ers and was ousted from his positions.

Hu Yaobang (1915–1989)

was Chairman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1980 to 1987. He reversed the internal Party purges of the Mao years, which earned him respect from Party memb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Viewed by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Party elders as being too tolerant of the liberal trend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1980s, Hu was forced to resign as General Secretary in 1987. His sudden death on April 15, 1989, triggered the student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Jiang Zemin (1926–)

w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nd the Communist Party’s secretary of Shanghai. Jiang was promoted to replace Zhao Ziyang as the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after the Tiananmen military crackdown in 1989.

Li Peng (1928–)

was a Power Industry Minister and a Vice Premier before becoming Premier in 1987 as part of the shuffle that resulted from the ouster of Hu Yaobang. In 1989,

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Li promoted the decision for a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making him one of the principal characters influencing that course of events.

Li Ruihuan (1934–)

was the Communist Party's secretary of Tianjin. Li became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in 1987 and a member of its Standing Committee in June 1989. Li's membership o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 vacancies left by Zhao Ziyang and Hu Qili. He was moderately pro-reform.

Li Xiannian (1909–1992)

was Vice Premier in charge of economic affairs from 1954 to 1980, and was involved in directing the Mao-style state-controlled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ost-Mao era, Li viewed many reform policies as having reversed or implicitly criticizing his past work. He served 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from 1977 to 1987, as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83 to 1988, and as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rom 1988 to 1992. Li remained a powerful conservative influence and attempted to block the reversals of Mao's policies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renas.

Li Ximing (1926–2008)

was the Communist Party's secretary of Beijing. In 1989, Li actively promoted the hard-line approach to the student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93, Li became a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ie Rongzhen (1899–1992)

was one of ten marshals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e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General Staff Department of the PLA from 1950 to 1954 and as director of the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from 1958 to 1970. Nie was credited for his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and military space programs.

Peng Zhen (1902–1997)

was an influential Party elder who was 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rom 1983 to 1988.

Qiao Shi (1924–)

w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in charge of the security apparatus. Qiao became

Vice Premier in 1986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in 1987. In 1989, though he originally agreed with Zhao's moderate approach to the student movement, Qiao abstained from taking a side at the moment that a decision was made.

Rui Xingwen (1927–2005)

was the Communist Party's secretary of Shanghai from 1985 to 1987. Rui was a secretary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iat from 1987 to 1989 and was an ardent supporter of reform. Rui was removed from his official post for taking a stand sympathetic to the student protesters in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Song Ping (1917–)

wa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from 1972 to 1987 and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from 1987 to 1989. After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he ascended to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long with Li Ruihuan, to fill the spots left vacant by Zhao Ziyang and Hu Qili.

Song Renqiong (1909–2005)

was an influential Party elder. He was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from 1978 to 1983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from 1982 to 1985.

Wan Li (1916–)

was the Communist Party's first secretary of Anhui Province in 1977. He was known for his early successes with rural land contracts in Anhui. Together with Zhao, who had similar achievements in Sichuan, Wan was instrumental in dismantling Mao's people's communes. Wan was a Vice Premier from 1983 to 1988 and a major supporter of reform. He becam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1988.

Wang Fang (1920–2009)

was Minister of Public Security and First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Armed Police.

Wang Zhen (1908–1993)

became China's Vice President in 1988. He was a powerful Party elder who often tried to resist reform. In 1989, Wang actively promoted the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demonstrators.

Yan Mingfu (1931–)

was Director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rom 1985 to 1990. He was removed from his official post for not actively supporting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in 1989.

Yang Shangkun (1907–1998)

was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from 1982 to 1987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He becam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88. Yang played a key role in 1989 by submitting to Deng Xiaoping's decision to pursue a military crackdown o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Yang was instrumental in mobilizing the army to carry out the order.

Yao Yilin (1917–1994)

was Vice Premier from 1979 to 1993 and director of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from 1980 to 1983. Often siding with conservative elders such as Chen Yun, Yao ascended to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in 1987. As one of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Yao actively supported the military crackdown in Tiananmen in 1989.

Zhao Ziyang (1919-2005)

was a leader of “reform and opening”. First meeting with economic success in the provinces of Guangdong and Sichuan, in the 1980s, Zhao served as Vice Chairman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Vice Chairma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posed in 1989 after refusing to impose martial law to end the demonstrations, Zhao lived under house arrest for 16 years.

